

封面摄影：石门坎石房子 马学文 摄

目 录 MULU

特稿

- 01 在云的那一边 / 刘群峰
07 走过石门坎 / 陇 华
12 李国钧——最早的石门坎历史浚源者 / 李寿祥
22 遥望石门坎的天空 / 肖 林
29 也说石门 / 桂龙香

历史

- 32 威宁往事 / 唐福德

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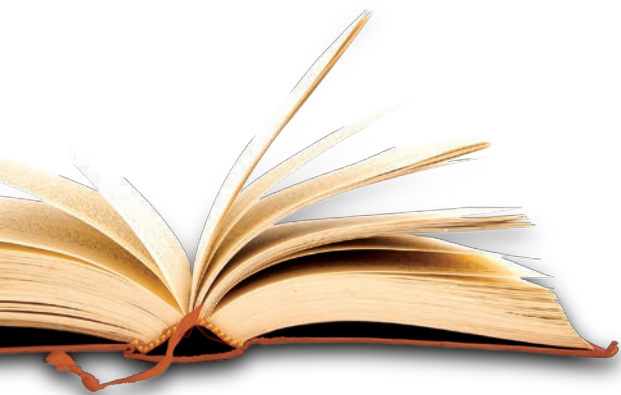
- 49 世上到处都是山 / 曹 永
56 搬家 / 申开玲
65 石门诗章 / 姚 辉 / 南 鸥 / 哑 木 / 郁 人
67 曹臻一的诗 / 曹臻一
70 潘梅的诗 / 潘 梅

地理

- 73 高原银杏 / 肖良宪
77 灼甫草场游记 / 金 超

民俗

- 81 绽放在生活里的爱情花朵 / 罗 勇
89 打亲 / 闻志源
93 回族开斋节 / 刘仕明



顾 问：肖发君 陈 波 刘青松 禄 俊

编委会主任：杨云娥

副 主 任：杨华忠

编 委：桂龙香 程 俊 闵亚宁 蔡逸秋
夏 敏

主 编：桂龙香

执行主编：蔡逸秋



上世纪背水的石门坎妇女（杨光勋 摄）

在云的那一边

——威宁石门坎散记

□ 刘群峰



在刚刚参加工作的那些年，曾对着墙上的一张威宁地图，你瞥到西北偏北的一个地方——云炉。一位同事向你描述着它的边远，他说，那个地方的人家全住在岩头上，吃水要到山脚去用坛子背上来。冬天大雪大凌之时，若要出去方便一下，得用铁铲撮上一铲煤灰，一路撒着走。但不能全撒光了，还得留着半铲备用，否则你就回不来了。

你笑了，你想这话可能有点夸张，但这云炉肯定是相当难在的地方了。

你之所以要往那里看，是因为那时云炉是紧挨着石门乡的一个小乡，后来也并入石门乡——也就是被许多媒体和书刊称作“中国石门坎”的那个乡了。

因为见了报纸上登的文章，你动了心，也想找个机会去石门坎看看，但一晃却又过了六七年，此时你都调离威宁了，才总算寻得一次去石门坎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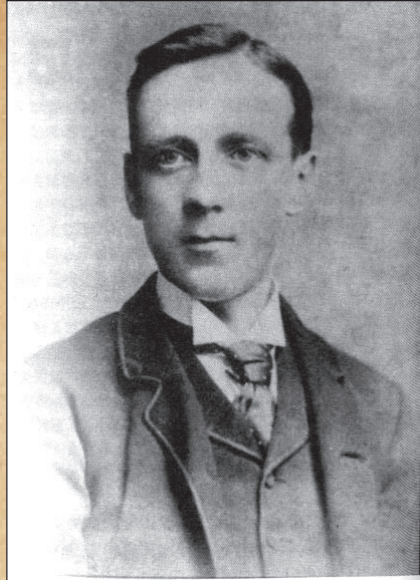
石门坎离威宁有一百四十多公里，是这个县最远的一个乡镇。况且当时那路实在太烂，简直就是乱石遍布，坑坑洼洼。那辆送你去的车子，有时像青蛙一样蹦起来，像是要治疗一位体内有结石的患者，将你颠簸得身体直差就要散架。

你惊奇于当年的那位夹着一本《圣经》的老外，为何要无比偏执地来到这样的荒山野岭，并最终让人们见证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奇迹。这一切，始终像谜一般地诱惑着你。

那天在那么一个典型的山旮旯里，你见到了那幢尚保存完好的石房子，见到了那英式的壁炉，那种带有异域风情的东西，与眼下的穷乡僻壤结合在一块，似有一种荒诞不经的感觉。然而正是在那里闪烁着照亮灵魂的火光，并开启了一条神圣的救赎之路。

背后是高高的薄刀岭，对面是云南地界那起伏不尽的野鹰梁子，以及山谷里虽然看不见，但你知道它的存在的洛泽河，这一切均透出一种巨大的、令人压抑的苍凉感。你难以想见当年那“海外天国”的模样，难以想见喧嚣的足球场，难以想见浪漫的手风琴和草莓，难以想见那邮差送来的信封上只写有“中国石门坎”就能收到的邮件了。

在青松林间，你看到两个空穴和一堆被推倒的残碑，那是柏格里和高致华的长眠之地了。用蕨菜在石碑上搓弄半天，总算依稀看见“若时雨降，勃然苗兴”的字样。你记起在城里采访那位从石门坎走出去的老教师时，见他笔记本上写



青年时期柏格里



上世纪石门坎的冬天

下的“房子破烂恨洋人”的句子，让你有些哭笑不得，你深深地明白了“扭曲”二字的含义。

在你们就要上车回城时，你看到几位苗族妇女忙着抱孩子来看“嘀嘀”时，你的心情异常沉重。原来你乘坐的那个东西，对他们而言也很稀奇，虽然那只是一辆俗称“反帮皮鞋”的北京吉普。车灯给那些黄土带去瞬间的鲜亮，随之又是久远的落寞和沉寂。当你们的车子沿弯弯曲曲的山路爬上高坡时，你看到了浓重的大雾，正从山谷里向坡上漫延开来，不久就将那叫做石门坎的地方淹没了。

那石门坎的故事，在这种情景中，如梦似幻，直有不真实的感觉。

三

那时有关石门坎的东西仍是

凤毛麟角。你还是在了一本叫《毕节文物》的小册子上，读到了石门坎的《溯源碑》，那些令人震撼又悲怆的文字：“我们苗族实实际际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原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变成了野人，住在高山上和森林里，国家政府没有谁关心我们。”

你也曾听过“苗山水仲”一说，知道那个民族是蚩尤的后代。进入乌蒙山区的这一支是大花苗。在他们的服饰上，绣有那个民族的迁徙史，包括长江与黄河的图案。有意思的是，多年后柏格里在石门坎率众从大花苗的传统服饰纹样中获得了灵感，创造了“老苗文”，并声称苗族祖先遗失的文字现在已找到，这套文字就是从苗族衣裙图案中重新恢复出来。

那些年你常去毕节师专看望

妹妹，并认识了那位叫做东人达的老师。似乎不管你们玩什么，他都在忙。你也好奇地瞄过几眼他手里正敲着的笔记本电脑，虽然较为低档，但当时也算是稀奇之物了。妹妹说，东老师正在翻译一本什么书。

后来他调走了，给你寄来了一本书，那谜底才终于揭晓，原来他在研究柏格里，他与他的女儿联手翻译的那本书，就叫《在未知的中国》。你试图从“未知的中国”里，去读懂那“未知的柏格里”。

四

接下来你使用“汉书下酒”似的心情品读了那本书。让你惊奇的是，原以为那不过是一个较为刻板的传教士，谁知他更像一位充满生活情趣的探险家。有时还难免会产生一种冲动，就是想



上世纪在石门坎的足球赛



英国牧师柏格里（左） 高志华（右）墓 唐福德 摄

能穿越时空，与柏格里结伴而行，去亲历那一切，那该会多有意思！你相信，若有机会跟那位学过半年汉语的老外学上半年的英文，那你也会知道大不列颠的一些东西，就像他也懂得我们国学中的“格物致理”，于是所取的中国名字就叫“柏格理”。

当然，在长江三峡翻船遇险差点葬身鱼腹的事，还会让你后怕，因为若是那样，其后就不会再有石门坎的经典传奇。大凉山的奇遇也让你咂舌，那位彝族土司居然会异想天开，想招纳一位洋女婿，若是那样，其后在某个土司庄园，就会看见一些金发碧眼的孩子在玩耍。而掌管威宁的土目也爽直得可爱，居然也没有看破老外只要一张牛皮大小地盘后面的蹊跷，若是心存疑虑，那么石门坎仍会是一个在地图上都难以找到的小地名，绝不会成为一个闻名中外的去处。

上个世纪初的石门坎，走着走着，便能险遇老虎。这在柏格里的日记中有过记述。现在遥想那虎啸石门的雄姿，只能请画家们来挥毫泼墨一通，让其挂于墙上了。

五

就是过去了一百多年，石门坎那东西方交汇、外来与本土相融的特殊文化现象，仍是一个人们难以迈过的坎。时至今日，不少人在有机会去威宁时，都会将石门坎列为必去的地方，也不管你是否有为难状，因为这种安排毕竟是山高路远，费劲耗时，常常被弄得人困马乏。

柏格里在云南昭通呆了十余年，但收效甚微，几令他万念俱灰，然而石门坎却让他的事业步入云端，直抵辉煌。云贵方圆百里数县的人们为了求学，就像后

来抗战时的全国青年奔赴延安一样，走进了自己心目中的圣地。正像人们常常用来形容校园的词儿一样，书声朗朗，歌声飞扬，回响于大山的空谷之中。

在那个偏坡上，柏格里开辟出贵州最早的足球场，虽不是太规范，但伴随着射门的一刻，仍是声浪如潮。因为下临深沟，那球若是往下滚，就意味着有大半天玩不成了，故“球员们”为了尽兴，自然就将控球技术练成了绝对一流，就像贵州的山高坡陡逼得师傅们将驾驶技术练得超棒一样。据说这支光着脚丫的足球队，当年曾给路过的四川军阀杨森的足球队一个下马威。而在解放后，他们的光脚丫也曾在贵州足球赛场闪亮过一把。有时你也郁闷，中国足球队曾被万人所垢，灰头土脸，天知道是缺了什么。若是将石门坎作为他们的高原训练基地，那日后遇上欧美劲敌时，

上帝到底会袒护谁，也未可知。

六

你知道精神支柱这个词，有时很抽象，有时似乎又很具体，因为它能划分人们的贤庸，又能决定区域的强弱，就像是在评判着高标号水泥与普通泥土的硬度对比。

早年当记者时，你在赫章采访“长治”工程，就听说这么个趣事：说某某乡的苗族同胞，听

说上级叫搞坡改梯，大伙都不愿动；后来有人找了寨佬去做工作，将上级改成上帝，结果大伙就甩开膀子干起来了！

你只去过教堂两次，一次是在美国纽约，那大教堂中有一对新人在举行婚礼，你好奇地想体验一下那些在外国文学名著中读到的经典场景；另一次，则是在有关“乌江纪行”的采访活动中，正好是一个礼拜天，好友引你走进了赫章的葛布教堂，这让你对当年教堂的生活产生出思古幽

情。

由此你又联想到柏格里和他的夫人，双双骑马进入乌蒙山区的情景。艰辛与浪漫相伴，信仰与追求同行。那值得永远回味的故事，又永远在未知的行程中。

七

你永远忘不了那年去参加石门中学百年庆典的情景。因为柏格里，那所学校已走过百年，要知道，在乌蒙山区，像这样高龄



的学校还是很稀罕的。

这次你去看了那道像是有一道石门的石壁，据说石门坎的名字就从此而来。苗语叫它“卯岭南”，有两种解释：一说意为像岭南那么兴旺的苗族居住地；另一说为从利亚那搬迁来的苗家。你还因此想起了阿拉伯神话中的“芝麻开门”的典故。

“天荒未破，畴咨冒棘披荆，古径云封，惶恤残山剩水。访桃园于世外，四千年莫与问津……尔乃葛天苗裔，谁肯是携？”这

是《溯源碑》中的句子，似乎带着对历史的反思与对上苍的叩问，令你心绪难平。

后来你又读过一本柏格里的传记，即阿信所著的《用生命爱中国——柏格里传》。的确，柏格里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极力挽救害上伤寒病的学生们的性命。

两位“姓白”的外国人，一位没有偏旁，另一位有。一位是白求恩，另一位是柏格里，前者因为上了《毛选》而声名大噪，而后者却因为意识形态的差异，

长期饱受争议，然而在石门坎，人们却永远铭记和怀念着他。

对于石门坎，你始终好奇的是，在去的路上，威宁可谓晴空万里，但一进入了石门坎，便云遮雾绕，即便是在文艺演出时，也在下着太阳雨。

难道那真的是个离上帝最近的地方么？也难怪人们要送给它一个美妙的称谓，就叫做“云的那一边”了。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李克强提供）



石门坎薄刀岭
马勋勇 摄



走过石门坎马勋勇 摄



原石



上世紀的石門坎苗民 李克強 供图

走过石门坎

□ 陇 华



上世紀的石門坎苗家 李克強 供图



石门坎麻风病院 马学文 摄



最后的麻风病人 马学文 摄

初登石门，就是云遮雾绕。

再临石门，还是云遮雾绕。

爬上垭口，立于猴子岩上前瞻，野鹰梁子迷失了踪影，赶紧回头寻找来路，薄刀岭又没头没脑的斜插下来，裹挟着飕飕寒风……

我想，一百多年前，那个英国传教士第一次踏上这片寒凉之地的時候，迎接他的，也该是这样的下马威吧！

那时，我在猴子岩上，心想，若执利刃于手，一刀劈下去，定叫云开雾散，重峦夷平。

整整一个世纪前，中国西南边陲，遥远、荒凉，瘴气氤氲，被称为“不毛之地”。在贫瘠的群山之中，有一个叫石门坎的苗族小村，这里居住着饱受欺凌的“大花苗”。他们的祖先曾经生活在中原地区，头领是赫赫有名的蚩尤，在与黄帝部落的大战中

落败，退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后又经过多次战乱，飘零到了黔滇川交界的这片蛮荒之地，过着极度贫困、悲凉的生活。若干年后，当人们抹开柏格理墓前“溯源碑”上的泥土时，还能看到这些哀婉凄绝的文字——“我们苗族实际是中国的古老民族，祖先们长期住在中原地方。祖先们有歌唱到，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去。以后变成荒野的

人，国家和政府没有哪一个管理”。

二十世纪初，来了一位英国人，他在这里一住十年，死了，也把骨头埋在这里的山峦上。石门坎因为他的到来，由一块蛮荒的“化外”之地，发展成为蜚声中外的“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

他叫塞缪尔·柏格理。

塞缪尔·柏格理，1864年生于英格兰康沃尔郡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家庭，自幼聪明好学，十七岁考取公务员，二十三岁加入传教团来到中国，循长江而上，于1888年初春到达滇东北昭通，进入循道公会布道所担任牧师——那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寨即将进入他的视野。

1904年盛夏的一天，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四个身着汉服的苗胞，敲响了昭通城一条偏僻后街上一座普普通通的汉族式宅院的院门，柏格理牧师轻轻开门——这是他与苗族的第一次直接接触，也是他第一次听说那个叫石门坎的地方——一个牧师和一个民族，就以这样平淡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一个牧师和一个小山寨，就以这样简单的仪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一年，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在中国的特权，竟然在这个国家的东北地区拉开架势大打出手。

又过了一年，从一个叫安荣之的土目手中，柏格理得到石门坎六十亩土地。我们要感谢这个深居山中的地主，没有他的慷慨赠予，就不会有后来的“第二香港”，就不会有一个牧师与一个苦难民族表演的舞台。

三月底的一天，柏格理来到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这是他第一次到石门坎。

石门坎，从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上都难找到的小山寨，四边群山环围，雾瘴锁困，因一条石砌的小道蜿蜒着从寨子边通过而得名。这里远离集镇，山高雾大，土壤薄瘦，水热条件都不好。农作物以耐寒的荞麦和洋芋为主，产量较低，被人们夸张地称为“屙屎都不生蛆”的地方，柏格理在他的日记这样简单地描绘说：“从未想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柏格理牧师一到这里，就忙着选择地基，建造教堂，传播上帝的福音。条件是艰苦的，开始的时候，他们只能在茅草房内做礼拜，柏格理和夫人住在用五英镑建起来的三间泥筑小房内，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五磅小屋”。他们的虔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信徒，后来，茅草屋容不下这些从几十里甚至上百里外赶来的苗族同胞了。冬天到来的时候，第一批建筑终于落成，乌蒙山区的苗族民众首次有了自己的一所学校和一座教堂。在之后近半个世纪的岁

月里，这里陆陆续续建起很多开创性的机构、贵州最早的男女分浴的游泳池、最早的室外足球场，还有平民医院、麻风病院、实业推广部等等。

出道师门的柏格理，除了传教之外，做了两项主要工作。一是施药治病。由于救活了患天花的同伴邵慕廉和一个吞食鸦片自杀的人，不懂多少医学知识的柏格理声名大振，求他治病的人络绎不绝，他也毫不厌烦地尽自己的所能为他们施治。事实上，除了治疗些常见病外，他主要是宣传卫生常识，帮助人们预防疾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0年他回国休假归来时，从国外弄来疫苗，为苗民施种牛痘，这一种，使他成为乌蒙山区种牛痘防疫的“第一人”。一个人忙不过来，他还培训了一批接种员，开展大范围的“种痘防疫”，使天花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乌蒙山区，另一种令人谈之色变的疾病是麻风病。当时，麻风病是一种不治之症，由于传染性极强，死亡率高，患麻风病的人多被从家庭中赶出去，沦为乞丐，不被社会接受，1914年更是发生了军阀陆荣廷诱杀麻风病人事情。柏格理即撰文谴责，并呼吁保护麻风病人。基督教的一个麻风组织见文后汇款给他，筹建麻风病院，但条件一时不具备，没有办成。1915年柏格理逝

世。1921年，继任的张道惠牧师等终于将柏格理的想法变为现实，建立了“麻风病医院”——这是西南地区最早的麻风病医院。

还有操办教育。“走过石门”的第二年，石门坎学校正式开学授课了，可见柏格理对教育的重视。办学之初，不但不收缴学费，还对学生发放赈济盐鼓励读书，可以说开了“义务教育”的先河。那时，学校开支占石门坎教会总开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最多时达到百分之七十。至1949年，有上万人在石门学校接受过规范的初等教育，他们中的佼佼者还继续接受中等、高等教育，培养出两名医学博士、中共的两名省级干部。解放后，乌蒙山区行政、教育、卫生等众多工作部门，几乎成了“石门弟子”的天下。

石门坎的教育，除了在学校进行之外，独具特色的还有“平民教育”，首先是全民性的、强制性的“扫盲教育”。他们用苗文编制“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读本，培训扫盲骨干，然后通过这些骨干，利用礼拜日等进行扫盲教育，使苗区三分之二的民众达到脱盲水平。一个教会组织，没有政府的强制力，没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唯有一颗为信仰献身的心，取得这样卓越的成就，令人敬佩！这应该是我国最早的“两基攻坚”了。

石门坎教会还非常重视“实业教育”。他们创办“推广部”，在苗民中进行毛纺、麻纺技术培训，创办“良种推广站”，试验种子并进行推广，推广植树造林，保持水土，开办“公益场”，刺激商品生产和流通……可别小瞧了这个“公益场”，那可是“原生态”的市场，通过它在原始、封闭的苗民中输入商品意识。今天，我们依然能看到“实业推广站”的遗址，还可以在足球场踢上一场球，还能行走在“乡村教会五年计划”中拓建的道路和种植的松树中。曾就学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系的王明基拟定了“乡村教会实施大纲”，其内容涉及生产发展、技术推广、教育教学、卫生习俗等多方面，我想，那已经是“新农村”的雏形了。

取得这样的成就，与柏格理牧师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柏格理的幼年时代，家境并不好，生活比较清贫，来到中国后，有感于自己的身世，遵循积极改良社会的宗旨，不畏艰辛，勤奋工作。刚到中国，为了方便工作，世界上最难学的汉语，他用三个月就基本掌握了，进入乌蒙山区后，很快又学会了苗语，并帮助苗民创造了苗文；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诺苏（四川凉山）地区，走访了彝族群众和统治者，并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在走访教徒的路途上，他曾经遭到土目

地主的毒打，肋骨断了几根，刺破了肺叶，险些丧命；他曾经多次挺身保护教徒，做他们的“保护人”，获罪地主权贵；他更无数次为病魔缠身的贫苦群众看病施药，不歧视不畏惧。

然而，柏格理也是悲哀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紧跟着军事侵略的步伐，大批传教士涌了进来，大肆进行文化侵略，意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向中国人灌输西方的价值观，从而心安理得地接受他们的统治。柏格理牧师随着这支文化侵略的大军来到中国，他的心里，也许只有他要献身的上帝，还有上帝那些受苦受难的子民，然而他却不幸成了一个“侵略者”。这是他的不幸，抑或是他的悲哀？

更让柏格理没有想到的是，他用生命为代价所构建的“海外天国”，在他死后三十年开始衰落了。1948年7月7日，石门坎地区发生了一次大地震，石门坎的大部分建筑震裂和坍塌，这似乎是上帝在冥冥之中的某种预示，从此，石门坎教会江河日下，再也没有世纪初的那种“繁荣”景象了。三十年前，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苗民信教的比例，急剧下滑到不足百分之五十，动则上千人参加的礼拜，有时甚至不足百人，学校学生人数也在减少，

兴盛时有近千余学生的光华小学，减少许多。建筑坍塌了，教徒减少了，学生辍学了，牧师离去了，“西南文化复兴圣地”不复存在了。

石门坎的辉煌历史终于翻了过去。

1915年夏，烈性传染病伤寒袭击石门坎地区，柏格理牧师不躲避不退缩。他和夫人不分昼夜地为患者治病，悉心照料，使不少患者战胜了死神，而他自己却不幸身染重病，于9月16日逝世于石门坎。悲痛至极的苗民把他安葬于教会旁的小山峦上——他终于深深融入了他深爱的这个民族。

一己之力以何改变历史。

客观地说，柏格理是一个为信仰而生的人，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了心中的上帝，为了拯救上帝受苦受难的子民，他来到中国，历尽千辛万苦，开创了一番在任何时代都堪称伟大的事业，他的精神，值得敬仰。

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一个有神论者，尚且明白改善人的生存条件是为根本，能够敬业和奉献，何况我们这些无神论者，这些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

基督教的《圣经》中这样写

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柏格理做的，就是引人们进这个窄门。显然，他也不可能成为石门的拯救者，在历史的洪荒之中，他向人们诠释的，也只是信仰之重、生命之轻。那禁锢在人们身上千年的枷锁，打开它的钥匙，不在一个传教士之手，不在一本福音之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即柏格理辞世七十年后，刚到贵州的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同志在处级以上干部见面会上，曾有过这样的评价：1904年，柏格理来到非常贫困、荒凉的石门坎，传播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他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超常发展。之后，他力主在这一片更

大的区域，设立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

跨入新的世纪，在这一片更广阔的大地上，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正在政府的组织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石门人民正在“走过石门”，这一次，他们要劈掉贫困之门、狭窄之门，劈出一条平坦宽阔的通天大道。

走过石门坎，不在那时，不在西方，而在今朝。



李国钧约翰

李国钧——最早的石门坎历史浚源者

□李寿祥

石门坎文化是中西文化结合的典型。特别是西方文化和东方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华文化融合的杰作，是西方文化中国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结晶，是中英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见证。她的本质是中西文化融会的和谐文化，对于我们今天扩大文化领域对外开放，积极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

化成果仍然有较强的历史借鉴意义。

石门坎文化从产生到今天已有 108 年的历史，对黔西北，滇东北广大地区文化教育、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影响到国际国内，涉及到政界和民众，传播从民国至而今，可谓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古人说：“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为石门坎文化强根固本浚源开流的人物，当然首推英国牧师柏格理。除《柏格理日记》之外，按石门坎文化文物文献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溯源，最早的是民国三年（1914 年）八月由“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李国钧约翰敬撰，民国县知事留日法政科员陈



初入石门坎

宗华菊圃敬书”“石门坎全体学生敬立”的石门坎“溯源碑”。第二是“柏格理墓志铭”，署名是“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后学员：李国钧约翰拜撰，民国县知事留日法政科毕业学士陈宗华书”，

写作时间为民国五年（1916年）。第三篇为1916年8月10日“全体苗族信徒暨石门坎全体学生”竖立的“苗族信教史碑文”。第四篇是“高志华墓志”，署名仍然是“李国钧约翰撰，陈宗华书”，

立碑时间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以上四篇碑文是追溯总结石门坎文化最早的文字记载，其中三篇的撰写者都是李国钧约翰，书者均为陈宗华菊圃。参考其他史料确知，李国钧和陈宗华不仅亲自参加柏格理团队进行石门坎文化的拓荒，而且被苗族同胞公推请出第一个用心智总结评价柏格理光辉的一生，做了盖棺论定奠基工作，并且首次对石门坎文化进行溯源。因此，他俩确实是石门文化的最早浚源者。

其后记录反映石门坎文化的著作与日俱增，20世纪30年代有朱焕章的苗文版《苗民夜读课本》，杨汉先的《花苗移迁乌撒传说考》、《基督教传入滇、黔、川交界一带苗族地区史略》，王建明的《现代西南苗民最高文化区—石门坎的介绍》，古宝娟、饶恩召的《苗族救星》，《云南基督教史》、《昭通教会史》。柏格理、王树德、张绍乔、邵慕廉、甘铎理、张继乔等著，东人达、东旻翻译的《在未知的中国》；沈虹的《感人的往事、沉重的现实—中国有个石门坎》，阿信的《用生命热爱中国—柏格理传》，1989年版《威宁自治县教育志》，1994年7月版《威宁自治县志》、《威宁自治县民族志》、《苗族百年实录》，2012年版的威宁《五心教育》地方教材，黄昆的石门坎遗迹遗址系列诗……这些古今

著作都是石门坎文化的载体，都为记载传播石门坎文化做出了不同的贡献。

对石门坎文化最客观、最有力的推介评价是胡锦涛同志作出的。他在1985年刚任贵州省委书记时用柏格理的事迹教育干部群众说：“公元1904年，一个名叫柏格理的英国人来到了贵州毕节地区威宁县的一个叫石门坎的小山村，那是一个非常贫穷荒凉的地方。他带来投资，就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学校，修起了足球场，还建起了男女分泳的游泳池。他用英文字母仿拼当地的老苗文，自编了‘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这样的教材，免费招收贫困学生。最后瘟疫夺走了他的生命。柏格理去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山村留下了他的坟墓。他传播了科学知识和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中华精英。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有的老人居然还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文化和艰苦创业，可以在贫困、落后的地区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在贵州人民构建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后发赶超，与全国同步小康的伟大实践中，以柏格理为代表的英国牧师、滇黔知识分子、以西南苗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石门坎文化中“奉献和敬业精神”、“科学文化和

艰苦创业”仍然是熠熠闪光精神财富。可是在溯石门坎文化之源，论石门坎文化之功的历史文献资料中，解放初期至1980年前，极左思潮影响，否定柏格理，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而1980年改革开放以来只重推崇柏格理，而有意无意忽略滇黔知识分子和以西南苗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大量参与创造的史实，也是不够全面不够客观的。尤其是对最先用心用笔对石门坎文化进行拓荒性记载的李国钧和陈宗华重视不够，很少介绍。别说广大读者，就是文史工作者对李国钧，陈宗华也知之不多。笔者从1988年参与编辑《威宁自治县教育志》就接触到李国钧撰陈宗华书的三篇碑文，感觉到它们是石门坎文化的最早的重要史料，但一直不知李国钧和陈宗华的身世。询问县内外文史闻人也知之甚少，直至2012年底为印刷《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教育志(1989-2010)》到昭通美克印务公司，才知道李国钧(约翰)就是公司经理李克强的祖父，李司提反(李国镇)就是他叔祖；第二天在公司印刷厂恰巧遇到昭通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历史学教授、原校长、昭通书画院院长陈孝宁先生，他就是陈宗华先生的贤孙。对李国钧、陈宗华二位石门坎文化的最早浚源者，敬情及孙，很高兴。得到李克强经理、陈孝宁教授的帮助，

找到李、陈两位老前辈的历史资料，兹从李克强经理的提供的史料节选成：

李国钧(约翰)事迹记要：

李国钧，字岳汉(约翰)，清同治八年(己巳年，1874年)3月30日生，秀才，是当地文化界颇有名望与影响的人物。他不仅学识深厚，且诲人不倦，经常给后辈子侄讲解《四书》、《五经》与《古文观止》。

1896年前后，李国钧家与当时在昭通传教布道的英国牧师柏格理住所相近，两人都温文儒雅，博学多才，互相仰慕，频频交往。但李国钧崇尚孔孟儒学，柏格理笃信基督文化，各自信仰不同，时有辩论。两种不同文化的撞击与交融势属必然。久而久之，李国钧逐渐从柏格理的言谈与作为中看到了基督文化的真谛，渐生钦慕之心。一年，李国钧病危，中医治疗无效，多亏柏格理说服了李国钧及其家人，改用西药救治。柏格理又多次到李国钧家中为他祈祷，并示意是耶稣所赐，终使其转危为安。自此，李国钧便改变信仰，崇奉耶稣，并带动弟妹等家人和其他亲戚都信仰基督。在昭通知识界中便成为首批皈依基督的世家。

据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云南基督教史》所載：“关于昭通传教站的建立，乃至基督教在昭通市的传播、发

展，有一户人家不得不提及，这就是李国钧（入教后也称‘李约翰’、‘李岳汉’）一家七兄妹”。

“像李氏兄妹一家数人虔诚信教并热心服务教会的家庭，在整个昭通市可谓绝无仅有。”“其七兄妹中，有三人在昭通基督教界影响最大：长兄李国钧，入教后取圣名‘李约翰’……1898年接受基督教信仰，之后到武汉华中协和神学院学习，毕业后返回昭通城做牧师，自诩‘中华基督教宣道使者’，在昭通基督教界最有影响。”（摘自该书第36页）

李国钧与其五弟李国镇同是昭通第一代牧师。阿信先生所著《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证实：“1896年，昭通庠生李国镇兄弟二人，因为生病，时常到教堂求医，他们和柏格理熟悉之后，经常坐在一起辩论。柏格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让他们感到震惊。天长日久，他们从敬重柏格理的人品开始慢慢地相信了基督福音。受洗之后，柏格理给李国钧取教名‘李约翰’，给李国镇取教名‘李司提反’。

“李国钧、李国镇兄弟二人是昭通知识分子信仰基督教的开始。柏格理特别优待他俩，经常给他们辅导天文、地理、英语、算术等知识。他俩不负柏格理的厚望，努力学习，同时热心帮助柏格理办理各种教会事务，更加得到柏格理的器重。李约翰天资

聪明，尤其擅长中国诗词歌赋，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特别强。二李又是昭通本地人，亲戚朋友很多，他们介绍了很多亲戚朋友来信仰基督教。柏格理就委任李国钧担任中西学堂的中文主任教员，协助柏格理夫妇认真教授学生。李司提反长于交际，笃信福音，于是专门协助柏格理四处奔走传教。”

在《柏格理日记》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记载：“（1898年）11月8日。……李约翰的母亲已经要他同一位农村闺女（编者注：即赵氏）订婚。而现在他又归顺了耶稣，因此决意要他未来的妻子也这样做。于是，他今天同另一人到女方家宣讲，还说一个妻子必须和丈夫走同样的路。据说，这是此地第一次一个订了婚的男子进入他的未婚妻的家。他正在承受着他家里人的许多责骂。”

据《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记载：“1898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英国领事馆急电催促柏格理撤离昭通。1月17日，柏格理一家人由李司提反陪同，先到昆明，经云南蒙自离境，暂住上海。他们走后，昭通教会暂由李约翰负责。”（摘自该书第63页）

在这之后的时间里，李国钧与其五弟不负柏格理所托，为发展昭通地区教会事业倾尽全力。以至于到1901年左右，“昭通市城区已有30名教友，其中就包括

李氏兄妹、鄯腓力和从会泽来的钟焕然（编者注：李国钧堂妹夫，年18岁）、梁福臣（编者注：又名梁发祺，李国钧之三妹李丽之夫）等，这些教友后来皆系循道公会的主要教牧人员，而且是中坚力量。”（摘自《云南基督教史》第38页）

李国钧由于人品和人文素质都高，传教布道极受柏格理欣赏与信任。柏格理曾多次在昭通周边数县和凉山彝区传教，而李国钧都随行协助。据《柏格理日记》记载，仅1902年10月30日至12月11日在凉山边缘地带的一次传教旅行，“李约翰秀才共宣讲87次”，“每一次都是认真、新鲜和优良的讲道。”

1903年，李国钧受西南教区委托，跋山涉水赴滇川边缘山区笃行传教，并携带其妻赵氏（当时已怀孕在身）与长女、次女随行，四处传教。先后到绥江、富水、永善、会泽、奎香等地传道宣教。三女李冰兰、长子李学苏都出生在为传教事务奔走暂住的乡村。

1904年12月26日，柏格理在日记中又详细记下了当晚由李约翰主讲的礼拜会上的情况，有九个从事巫术的苗人“全都跪下”“面向上帝，请求帮助”，“此情此景，不同于我以往所看到的任何事物。所有的人都万分激动，真是精彩无比。”

1905年春，柏格理又带李国

镇等五人去贵州威宁石门坎筹建教堂与学校。开始教师不足，李国钧也多次去石门坎小学（1911年辛亥革命后取“光复中华”之意改名为“光华小学”）任教和培训苗族教师和传道人员。

李国钧等有时还冒险陪同柏格理深入彝族地主家中，为减免当地贫穷苗民的贡赋地租，与土目、地主交涉抗争，多成功而返，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此举深为当地苗民称颂，随行汉族传教人员也受到当地苗民的称赞。

1912年，昭通教会在县城开办有美会女子学校的同时，又在昭通东城区创办男校，不久改名为宣道中学，学制三年，附设宣道小学，“李国钧负责主持至1927年”。1935年奉省教育厅之命，宣道中学更名为私立明诚中学。李国钧一直在昭通教会负责，并在明诚中学兼任教师。明诚中学校歌歌词便是李国钧所作，歌词如下：“明以通事理，诚以束身心，体魄健而强，事竟成。以此完国策，以此建文明，教学敬

奉信仰，心中神；无种族之别，无中外之分，立学求根基，做主人。明诚精神首在服务人群，坚毅不拔勇往向前奔。担负责任，开辟光明途径，始终如一，悬为座右铭。”

昭通教会所办学校“除培养牧师、传教士外，也培养了教育及医务人才，至华西大学、协合大学攻读，本教区先后有李国光、杨正隆、王肇勋、王培恩、王嘉恩、唐富泽、梁绍仁、梁绍义、梁绍礼、王传福、何鸣歧、李学苏、王传恩、王传美、彝族陆堂珍、陆堂恩、聂光廷、苗族吴性纯、杨汉先、朱焕章、张超伦等二十余人。”（摘自该书《昭通基督教简介》第215页）。据编者所知，由昭通教会选送出国或出省深造的人才远不止这些，仅李氏家族

中李学法（女），华西大学毕业，又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毕业证书，是昭通的第一个女博士；李学应，浙江大学农学院毕业；李学敏，天津南开大学毕业；曾庆亚，华西医科大学毕业，……。

李国钧除负责昭通教会工作外，也长期从事中学教育事业，为培育人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1914年，“苗家人公推李约翰撰写苗族《溯源碑》，刻碑纪念这段辉煌的历史。碑文文字优美，用简要的文字记述了苗族几千年来的历史，对儒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做了简要的比较，记述了苗族信仰福音的历史。这是苗族用文字记载自己历史的创举。”（摘自《用生命爱中国——柏格理传》第200页）

1915年，柏格理为护理已患



李国钧（前排右一）与石门坎牧师



上世纪的石门坎苗民



文革中损毁的李国钧约翰撰写的溯源碑

伤寒的学生而身受感染，在石门坎不幸去世。应当地苗民之请，李国钧又以中文撰写了《柏格理墓志铭》。充满激情地讲述了柏格理为造福当地苗民的动人事迹与献身精神。这两块碑文仍是研究苗族历史、民族教育发展史和基督教在云南传教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1915年之后易理藩继任西南教区区长。易理藩又带领李国钧、李国镇、梁发祺等牧师，一道去昆明筹建宣教点，在昆明金碧路建锡安圣堂（至今仍在）传布福音。同时，由英籍传教士苏穆才赞助，李国钧在昆办好手续，让次女李冰如、三女李冰兰与其他信徒绕道越南由海路至上海再赴

南京黑德女中、汇文女中和神学院读书。

在李国钧负责昭通教会期间，爆发了抗日战争。昭通基督教会也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云南基督教史》第103页有明确的叙述与评价：“在滇东北的重镇昭通，教会的活动已与社会的抗日救亡活动融为一体，从另一角度上看，通过积极地参与声援抗日救亡活动，教会的活动开始演变成一种突出的社会力量。”“就连地处偏僻的农村山寨石门坎，教会的活动也不例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李鉴清先生撰写的《昭通基督教简介》载，李国钧“热烈支持”青年教友们创办了抗日救亡油印

本刊物《微声》，并经常为它写稿，笔名“丘八”。“丘八”者，兵也，李国钧表示了自己的爱国志向，也愿当一名以文笔为武器的抗日战士。

民国初期，李国钧还以“郡绅”身份，参予编纂《民国昭通县志稿》。1940年以前李国钧担任昭通循道公会联区长，1943年后，李国钧任昭通循道公会主任牧师，明诚中学、福滇医院学校的语文教师。

1945年，李国钧又被公举为昭通县教会创办的红山麻疯病院院长。该院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管，即现在的甘河红山医院。

李国钧还救助收养了孤儿马惠仁、马福兴、刘道角等多人。

总之，李国钧不愧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被公认为“世界五大使徒”的柏格理的亲密同事、得力助手。他怀慈爱之心，以宣教传布爱心，以教书点燃光明之火……，一言蔽之，李国钧以真善美终其一生，不仅在当时遐迩闻名，即使在后人的相关著作中也彪炳史册，流芳于世。李国钧1955年逝世，享年81岁。

2010年8月，编者重返故里寻访旧日遗址和先祖事迹时，常向相关老人打听一些情况，只要提到李约翰、李牧师、李耶稣、李多迦，无人不知。当我们自我介绍是李国钧的亲孙男女之后，都受到热情接待。还有两位出自

石门坎学校的苗族老学者陶绍虎、朱艾光闻知我们是李国钧、李国镇的后代，亲自登门致意，讲述了他们父辈在石门坎学校与李国钧、李国镇的交往与情谊，并给我们留下了珍贵史料。……这一切都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先祖们的仁德博爱之光与热至今尚在，真是活在人心便永生。我后辈幸甚！

再从《陈孝宁文集·空存热血满腔留得冰心一片》节选成：

我的祖父陈宗华

我没有见到过祖父。照片上的祖父穿着长袍马褂，侧坐在一把椅子上，神色端严。浓黑的眉毛下，一双深邃的眼睛透过历史的时空，似乎正注视着后人。

祖父姓陈名宗华，字菊圃。19世纪70年代末生于昭通一个普通市民的家庭。1905年祖父以优异的成绩被选送为官费留学生，踏上了到东洋日本留学的道路。

从清朝统治下的万马齐喑的山城昭通，取道越南，来到樱花之国的日本，这是祖父人生道路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历史不能编造，也无法重复。在日本求学的那些岁月，祖父是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是革命营垒中的一分子，是这个时代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回国后，本想大有所为，但黑暗的现实使他抱负难伸。他在心情压抑中回到了故乡昭通。在这黎明前的黑暗时刻，为了表示和旧体制的毅然决裂，祖父在昭通第一个剪去了象征着奴性的发辫。每一次去见地方官员，他都脱帽露横，用这种叛逆的行动来挑战世俗，表明自己的信仰。

辛亥重九，云南光复。张开儒率领援川军经过昭通，一见祖父即委任为永善县知事（县长），不久辞归。第二年张开儒凯旋返昭，邀祖父一同到昆明去见蔡锷。被蔡锷委任为曲江知事。

1918年至1919年间，中国南北分裂，道德颓丧。祖父目睹地无宁土、岁无宁日，愈发消沉，于是仿东晋诗人陶渊明的做法，遍请昭通文人为自己写挽联挽诗。祖父亦自作一联云：

生未逢世，死未逢时，空存热血满腔，点点滴滴向谁洒？

外不徇人，内不徇己，留得冰心一片，明明亮亮有天知。

1924年11月19日，正值壮年的祖父在小城昭通溘然长逝。祖父逝世81年后的2005年，我随学校的几位朋友来到贵州威宁的石门坎。在石门坎一个遍布榛荆的荒凉的小山包上，我们找到了英国传教士柏格里的墓碑。无意中，我发现碑文的书写者竟然是祖父。遗憾的是原碑毁于“文革”，我所看到的是后来请人重抄

重刻的，当然，祖父的真迹是看不到了。回来后查阅有关资料，又发现立于1914年的石门坎《教会溯源碑》亦是祖父所书。从曲江挂印辞官后，祖父到石门坎任教，和柏格里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个世纪前的石门坎，闭塞、苦寒、荒凉、贫困，到这个地方在苗民中搞教育，绝不是利益所驱使，一定有着心灵和精神上的更高追求。从慷慨悲歌，赴日留学，到息影荒山，破屋任教；从官场的樽俎应酬，钩心斗角，到与山民的披草来往，共话桑麻，在石门坎那些悲风怒吼的夜里，在壶觞自酌的沉思默想中，祖父的心事一定如黑夜中大海的波浪，沉默而汹涌地滚动着。

祖父字菊圃，可以想见其对东晋诗人陶渊明景仰之深。其一生行事，亦以渊明为楷模。这从他挂印归隐，生挽自己的所为中亦能明显看出来。他给我的大伯、二伯和父亲分别取字为少甫、幼甫、稚甫，也可以看出他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痛恨，对“返璞归真”的追求和对“赤子之心”的珍视。和渊明一样，祖父本也是“猛志逸四海”，愿意“大济苍生”的人，但是对黑暗现实的憎恶，使他不愿过“羁鸟”、“池鱼”的官场傀儡生活；对自由的向往，使他义无反顾地冲决“心为形役”的世俗樊笼；对桃源净土的追求，对苦难众生的同情，最后使他劈

开榛莽，走向石门。祖父的一生是短暂的，但是对于参透生死的他，已深深地了悟“寓形宇内复几时，何不委心任去留”，“乘化归尽”，“乐夫天命”的道理。平静地来，平静地去。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生命的过程中，人对精神自由和心灵解放追求所达到的高度。我想，祖父是尽力去做了的。

祖父性格豁达，幽默诙谐。与人交以情不以势，以义不以利。研习法政，醉心老庄；精于丝竹，尤擅文字。他曾集昭昭俗语为联，针砭时事，描摹世态，精当深刻，出人意外，令人叫绝，被人传颂一时。其中如“以直待人，切莫耍玩狗解手；把稳行事，再不会碰羊鳌头”，“说个实言，莫与懦夫当师，宁与烈汉牵马；讲何公理，只由州官放火，不由百姓申冤”，“宦海即如苦海，官场恰似戏场”，“推翻君主立民主，拔出铜钉安铁钉”，均言浅意深，在平易中见奇崛。

挽联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已在历史的舞台上淡出。盖棺认定的挽联好写，而生挽却难写之至。拔高了有阿谀之嫌，贬低了有嫉妒之称。要恰如其分，见性见情，有理有义，真还要有些水平。翻阅那些将近一个世纪前的昭通各界人士为祖父所写的生挽，使我更贴切地感受了那个已逝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各色人等的

风神才情，感受到了他们从文字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乱世人生观。

为了方便读者，笔者不避浅薄，将《溯源碑》、《柏格理墓志铭》，翻译成现代文。

《溯源碑》译文

柏牧师等披荆斩棘，访求踏堪开辟石门坎，是破天荒的创举。古代的道路被云层厚厚地封闭，哪有心思怜惜残余抛荒的一片山河。到蛮荒之地去寻访世外桃源，（从九黎到现在）四千年来没有一个人为你指明路在何方。在林莽中探求生长灵芝的圣法乐园，历经五百劫才开始为人民讲读法理。这是自古以来从无到有的事实，难道就这样苦难地度日吗？推原探究边荒古民，好像野地里长出的各种花花草草，也难以引起人们欣赏鉴别的兴趣。你们本来是葛天氏的远代子孙，哪一个愿来帮扶你们？回教徒原本固守着祖先的遗风，孔子开宗的儒教又从来都坚持排挤外来的人。禅宗未能穷尽超渡众生的道路，道教更找不到脱胎换骨的灵丹妙药。只有恶草败苗繁茂的生长，我们却感伤荒芜的田园无人开垦。长流的溪水滚滚滔滔，人们叹惜道路堵塞，但有谁来开辟通途？幸好天神耶和华，指示他的圣先知撒母耳，洒下古传圣经

的甘霖，沾溉秦汉至今的古老遗民；让明星（柏格理的字）映照到伏羲氏的人民。鲜花已经从干涸中重新挺直腰杆争相开放，枯槁禾苗出现勃勃生机。开始像亚当能施恩惠给黔滇黎民，第一次开启了蒙昧的心灵。（柏格理先生）率先开辟了边荒的石门坎，再加上一批中流砥柱撑起高屋大厦，惟愿他的野橄榄枝能接活我心中真理和葡萄树。（柏格理先生）等经营十年，灌溉荒田野苗。与好朋友一起创造了苗族文字，翻译苗文的圣经。两次漂洋过海，和妻子分别班次讲授功课。因此让苗疆万花齐放，终于使大片良苗获得新生。喝令石头变为绵羊，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高攀教门追随骐骥，将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薪火传承。像青天和再生父母的恩惠一样多么光明显耀，神圣的伟力真的超乎人们的想像。在石门坎修建许多高房大屋，并不是夸耀财物丰盛。另起炉灶，开拓新境，只为了让当地人超脱凡俗，归附圣主的教化。牧童樵夫联唱着赞美歌，时常听到山鸣谷应；行走站立都能见到家家户户朗诵阅读圣经，孩子妇女都能歌颂圣的诗，恰似写大文章，他每一步都精心筹谋策划，倡导经营的都是惠及民生实业。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行为包含丰富的三民主义。在这片神仙福地，把雀噪鸦啼改成莺歌燕舞。让这片狂

风骤雨的名山大川之人，从苦难的人间上达天堂。彝族引颈瞭望学习，有些汉族人民也皈依基督。回忆当年披星戴月辛苦万状，看今天“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值得高兴的是群山高岩上布满明星的光辉，我恭恭敬敬将这篇文字铭刻在玉一般的石碑上。跪拜祈祷先生护佑信民像渔人得鱼，大家以对神圣的赤诚立碑纪念，用精粹的语言赞美先生开辟石门的功绩

赞曰：

转动灵魂之宫的活石，步入最高道法之门；

小心绊脚之石，谨守生命之门。

搬开屋角压在头上的大石，开起灵魂登天城门。

凿开石壁引来清泉，打开心灵天窗之门。

这是一块遮风挡雨的神石，跟着他走出死门；

这是女娲留下的石头，也是亚伯拉罕的羊群进入天堂的门。

这是一块奠基的巨石，它弹奏仙乐开启金门；

讲经能让顽石点头，这是人们文明进步的大门。

李国钧约翰敬撰，民国县知事陈宗华书

《柏格理墓誌铭》译文

（柏格理）先生原本是英国

国籍，按英文姓氏和荫穆宠腊而得到译音相进。先生从小谨遵家训，恭敬的领受天命，才20岁就

渡过海洋到东方来，把名字更改为汉语，名叫柏格理，字明星。能说多种语言、服饰、习俗、（饮



上世纪的石门坎苗族妇女

食)起居都和当地人相同。登场讲演,善于现身说法,听讲的人每每觉得兴致勃勃,觉得没有(哪个)不深刻省悟的。(他的讲演),能够令堕落的人奋起和懦弱的人振作;品行恶劣的人听了胆气虚寒;而悲苦的人听了心情宽慰。至于他心肠热忱,毅力坚韧,不躲避艰难危险。金沙江一带凡是瘴疠流行,狂风暴雨、野性蛮横、人烟稀少等未开化的荒凉寒冷的地区,没有(哪一处)不费尽脚力,几乎全部走遍。当地百姓和读书人喜欢他,并且亲切地称他为“赫甲家”。城市和乡村之间,妇女小孩都知他的美名,先生亲切和蔼待人。小孩也爱戴他,他经常把小孩抱在怀中熟睡,而且情感深厚,就像不忍心离开他温暖的胸怀一样。至于老年人和一般成年人,人人都接受他的熏陶,没有谁不说先生能用福音救济世人,简直就像保罗重新出现在今天。(人们)对他心悦诚服,赞扬备至。前清丁未年间,(先生)曾经在冷米寨传教,好几次遭到(当地人)围困,几乎到了危险死亡(的地步)。当权的人原本想依法惩处施暴者,但是,(柏格理)先生反而多次替他们说好话,并且流着泪说:(这些)敌视真理的人其实不懂基督的福音,假使让他们懂得了(其中道理),可能服从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有排斥的(意思)呢?先生确实

能感动万物,士大夫争着和他结交认识。他对待普通教士,忧伤快乐与大家共享;诚恳亲切的热烈程度,超过对待家人父子。(先生)亲自开辟石门坎的传教事业,广博地精心筹划,苗族人称他为“堪德”先生。先生为苗人创造文字,翻译经文典籍,建礼拜堂,设立学校。在一片荒地上,用尽所有的智慧与精力来经营,最终修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别有一番新天地。(做了这些事业),先生心力交瘁,去年秋天患病(溘然)去世。(遗体)埋葬在(石门坎)附近的山上。现在碑石齐备,(苗民和学生)请我请序,我尽自己所知撰写。铭曰:

万人景仰的先生,你亲自开辟了石门坎的传教圣举。

你传播宣讲天主的道理,在民众中开启了一道认识真理的窗户。

你就像及时的甘霖普降人间,让苗族人民得以光大兴旺。

苍天和人民都喜悦爱戴,你的英名万世流芳。

两篇碑文都以精美的文言,深刻反映了柏格理等人开创石门坎文化的显著贡献、光辉峻洁的人格、令人敬佩的卓越能力。两篇碑文特别是“溯源碑”把基督教、儒教、佛教、伊斯兰教的知识融汇。陈义高、选言精、赋色古,辞高而识远,文约而义丰。虽然

侧重于柏氏宗教的功德再现,却顾及实业操持,追求道德昌明、践行民生主义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中西结合、和谐共生、艰苦奋斗、拓荒创业、求真务实、为民奉献的文化内涵积淀。今天,对实践十八大报告中“12个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有借鉴意义;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仍然有深刻的启示;对追溯滇黔知识分子和以苗族人民为主体的各族人民汇成历史动力,艰苦创业,建设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的不朽功绩,仍然是难得的史料。两位作者广博深厚的学养,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底,在碑铭中令人叹为观止!尤其是李国钧写的碑联:“牧师真是中邦良友,博士诚为上帝忠臣。”站在中邦的角度、介绍给上帝的高度作出的准确判断,明明白白,的的确确,经一百多年历史检验,还是不刊之论。

在这大改革、大开放、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应铭记最早浚源石门坎文化的先驱李国钧、陈宗华等等有思想有作为有贡献的先驱先贤,学习继承他们的高贵品质和不朽的精神,站在石门坎文化高度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创造磅礴乌蒙之巅的精神高地,大展当代新咸宁的宏伟蓝图,以告慰长眠在乌蒙山区的先烈、先驱、先贤的忠魂。

(本文图片由李克强提供)



石门坎的秋天 马勋勇 摄

遥望石门坎的天空

□ 肖 林

1

六年前，我独自一人去石门坎，不是去看五磅小屋、宿舍与教学楼，也不是去看足球场、泳池与溯源碑，更不是去看那一扇天然的石门坎，就为看石门坎的

天空，天空之上的辽阔。是日，天气晴朗，抵达石门坎已是午后，石门坎的天空空如也，除了深入骨髓的蓝，就是让人心疼的蓝，一匹大风从蓝天掠过，发出空旷寂寥的回声，似是巨人之手扫过古筝倍低音，在天地间，颤颤巍

巍，遥遥渺渺。

这里的天空一定飘浮着一些我所望不见的东西，一些只属于石门坎人的东西，一代又一代的石门坎人行走在这一带，累了，抬头看一眼，苦了，抬头看一眼，饿了，抬头看一眼，总之，只要

抬头，这一片天空总会给石门坎人予安慰。而为什么现在的我，无论怎么仰望，这辽远的天空依旧一无所有？何谈安慰！

它到底是什么！！

当晚，一位朋友联系十多公里外的一位姓韩的村民接我去他家住，晚饭过后，我在他家小屋内躺下，却怎么也睡不着，石门坎那一片望得见摸不着却一无所

有的天空一直在脑海反复出现。凌晨三点，我还是叫醒了他，请他骑着摩托车，把我送回石门坎。

星空晴朗，月色皎洁，我们直接爬上山头，穿过荆棘，来到



柏格理从英国带回的无名树 唐福德 摄

柏格理的墓地。我站在柏格理的墓碑前，对着星空深深三鞠躬，尔后一屁股坐在墓碑边，背靠着

碑柱。仰起头，又看见了石门坎的天，深夜的天空，除了一轮圆月、闪烁星斗和片片薄云，再无

他物了。

忽然间，这天空发生了诡异的变化，好似梵高的《星月夜》，

一个个星辰高速旋转，带动周围的薄云，形成一个强有力的漩涡，似在翻涌，似在静止，月色变成骚动的线条，在天空肆意舞动，这墓碑，忽然放射出灼目光彩，

直射天空。

眼望着诡异的天象，我想起了一个人，石门坎人的邻居——昭通诗人樊慰忠，他曾写过这样的诗歌：

“云海茫茫，宇宙在膨胀
星宿像萤火虫，打着灯笼远逝
也许，上帝不喜欢地球人
被抛弃的还有时间和忧伤
有人留下骨骸；坚硬的幻影



石门坎足球场遗址 唐福德 摄

有人播种精虫，生命的灵性”
我叨念着这些空灵而有质地的
诗歌，仿佛看到一缕缕来自地球

另一端的光芒，在这天空之上烁烁
灼灼，似乎也看到了石门坎人的苦
难，看到了石门坎人的幸福。

2

对于掩埋在层层历史之内的石门坎，铺成在这历史夹层中的许多事，我一直不敢讲述，甚至不敢谛听，更不敢逼视。我们讲述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苦难史，但总有一些地域，总有一些故事被忽略，被遗弃，一代又一代人，我们甚至都开始怀疑这块土地，以及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的真实性。比如说，在这西南群山围绕，莽林深掩，卷曲在历史夹缝中的咸宁州石门坎。

在这云贵高原之上，“四季无寒暑，一雨便成冬”，“清明不断雪，谷雨还打霜”。《威宁县志》记载：“寒互特甚，出产最少，故曰凉山。凉山之上，瘦瘠异常，不便耕稼。”民间有谚语称：“春中一坡，秋煮一锅”。据张坦先生考证，这里历来又是瘴疠之区，天花、霍乱、回归热、痢疾、麻风、疥疮、伤寒经常在城乡各地流行……这里的人一旦染上传染病，只好将病人送到荒山之上，或搭一草棚，或丢入岩洞，听天由命。

天命如此，人事更甚。百年以前的石门坎人，被少数的土目地主统治着，清赵翼编著的《檐曝杂记》记载：“凡土官之于土民，其主仆之分最严。盖祖宗千百年以来，官常为主，民常为仆。故其视土官，休戚相关，直如发乎

天性，而无解免者，主官虐使土民，非常法。所生女友姿色，土官辄唤入，不听嫁不敢字人也。有事控于土官，土官或判不公，负冤者惟向老土官墓上痛哭，虽有流官辖土司，不敢上诉也。”张坦在先生《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石门坎猎人张永元外出打猎，在投掷武器时，误伤了地主的一条狗，被地主发现查明后，把张永元当做一条狗，拴在地主家门口为地主看了一年的门。

在解放之前，石门坎人处在天与人的剥削之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据张坦先生考证，土改时，佃农年人均口粮仅有120公斤，一些凉山地区仅有100公斤。因此，一年之中有半载是要以“野蔬”“采芒”为生。

鲁迅先生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而在19世纪的历史缝隙之中，在这山箐广茂林深的边陲小寨里，无字的历史方正正的就写着“吃人”这两字！

3

站在今天的石门坎，这些似乎历史已非常遥远，要抖落几层

灰，才能探视到苦难的一角。其实历史并不遥远，1887年3月14日，一个年仅23岁、名叫撒母耳·波拉德的英国人在上海吴淞口踏上了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此时，偏居西南石门坎人，依旧在一代又一代的苦难轮回中挣扎。

这个年轻的英国传教士在中国落脚后，很快就进入适应中国文化，他以中国儒家“格物致理”之义，取名柏格理，字明星。此时的他，受李文斯登非洲冒险传教成功的影响，满怀为基督教建功立业的激情，他说：“余之来华，惟求获得一种民族之信仰，完成余之夙志，虽牺牲性命亦在所不辞”。

1887年11月，柏格理从上海乘船前往云南昭通。1888年2月8日傍晚，抵达昭通，从此，他将他的一生奉献给这片乌蒙大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从清政府手中取得了传教士在内地自由传教的特权，到19世纪末，天主教、基督教向中国派遣的传教士就已达3300多人，中科院民族研究所石茂明先生认为，“外国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本国炮舰作为后盾，在他们公使、领事的庇护下，深入中国穷乡僻壤，做尽坏事，罄竹难书……第一，在文化思想上，奴役中国人民……第二充当侵略中国的谋事和间谍，直接参与武力侵略战

争……”

柏格理是这 3300 多名传教士中的一员，他是不是也和其他传教士一样在中国国土上干着一样的勾当？在昭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8 年 2 月刊出的《柏格理其人其事》一文认为：“柏格理在华期间，到目前（2008 年 2 月）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他在暗中干过有损中国主权的勾当，他也没有扮演在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的特殊角色。”

为什么柏格理会成为一个“异类”？是因为中国西南的贫穷，更因西南的人心底的善良。

柏格理出生在英国康沃尔郡卡姆尔福特一户贫穷的手工业家庭者，深深理解贫穷，当他进入中国西部以后，首先接触的就是贫穷，他被中国西南的贫困深深地地震了，他感叹：“或许中国是全世界人民生活最为艰苦、衣着最为褴褛的国家，比他们 500 年前的生活还要差。”

1888 年 1 月 31 日，柏格理行走至云南和四川交界地，这里山峰巍峨，白雪覆盖其上，道路悬挂在峭壁，人走在上面心惊胆战。他与一位负重的男孩相遇，在歇气的时候，他问男孩：“你多大了？”男孩回答：“13 岁。”柏格理的心微微一震，他又问：“你背上的东西有多重？”男孩回答：“110 斤。”柏格理感觉到心被利刀重重地划了一下，他

再问：“在路上你要走多少天？”，男孩平静地回答：“7 天左右。”柏格理再也问不出一个问题，小男孩站起来，歪歪斜斜又走了十多步，又靠在悬崖上休息一会儿，再走，再歇……

进入中国西南后，柏格理几乎“忘记”了他传教者的身份，一驻扎下来就四处治病救人，这也当时他能为中国人做的最大的事情。第一年，他在昆明救治了一个吞食鸦片自杀的男子。从此，柏格理喜欢骑着一匹马或骡子，四处“溜达”，据《柏格理日记》记载，仅在 1897 年 1 月，他就外出救治了 20 名吞食鸦片自杀的人，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平均每周末外出救人 2 次……

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卖儿卖女是常见的现象，饿慌了的穷苦人家，又不忍心开口吆喝卖掉孩子，只能在孩子身上绑上一根稻草，买家一看就明白了。1892 年 12 月 25 日，柏格理一如往常在街上“溜达”，他遇到一位衣不蔽体的妇女，带着一位 10 岁、身着几缕破布的女孩，妇女告诉他，因丈夫吸食鸦片，早已倾家荡产，她带着女儿前往衙门求助，衙役提出以 2000 文钱购买她的女儿，被她拒绝了。柏格理被这位妇女身处绝境却未卖女儿的举动打动了，将身上仅有的几文钱也掏给了她。

老子说“善者吾善之”，也

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存在善良的基因，那一定不是一个坏人，我们就要以善待善。

柏格理的心里，一定揣有这样的理念。

4

柏格理在昭通的善行，变成了美丽的传说，流传到威宁州，深深吸引了这一带的穷苦人民，特别是石门坎人。作为一个传教士，也许这是他传教的手段，传教仍是他的终极目的。但历史已经证明，柏格理在西南地区的所言所行，已在无意间将他手段变成了目的，而目的却成了他“捎带”的事情。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切就像高山流水，柏格理血液里的善良因子，遇上了西南这贫困的、善良的人群，也就自然流露出来。而柏格理这种自然流露出来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吸引深深吸引西南地区穷苦人民，他们已经触目到彼此的心灵。

1904 年 9 月 8 日上午，柏格理来到威宁州牛街子（现哈喇河镇牛街子），他爬上了最荒凉最高的一座山，眺望威宁，看见了璀璨的高原明珠——草海。此时，距他第一次与石门坎人接触已近 2 个月了。也因为与他的接触，石门坎人深陷巨大的痛苦之中。地主们认为石门坎人要造反了，

他们从柏格理这里得到了毒药，要毒杀土目地主。柏格理此行就为解决此事，进入威宁后，经与州府谈判，威宁州衙贴出布告，宣布石门坎人接触柏格理，没有阴谋，任何人不得干涉，如果有违反的人，将依法严惩。有了州府的参与，加上柏格理亲自前往各土目地主家与之谈判，石门坎人的人身安全得到了保护。

我始终相信，人世间永远都存在感动与被感动的故事。1904年7月12日始，石门坎人带着燕麦面，一批又一批来到昭通，找到柏格理“要求念书”，柏格理不厌其烦，一批又一批地教授，直至精疲力竭。一天，心疼他的妻子海孝贞强行要求他去休息，主动代替他为石门坎人讲解，柏格理答应了妻子，疲倦地躺进了二楼卧室。没想到石门坎人却爬上窗户，偷偷爬进柏格理的房间，要求柏格理继续为他们讲解，海孝贞虽然心疼自己的丈夫，却被石门坎人这种求知的精神打动了。

一个阶层的人求知若渴到这种地步，谁还能忍心拒绝？为了更集中地将现代文明带给石门坎人，1904年冬天，柏格理与几名苗族、汉族人一起进入石门坎，经过反复勘查，发现这扇天生的石门旁边是块好地方：这里是威宁州穷苦人民聚居的地方，出产煤炭，有烧石灰的石材，水源方

便，也是商旅要道。柏格理随即向地主安荣之提出要求，安荣之也不愿他的佃户长期在昭通城出入，破坏他的统治秩序，便同意将这块地赠送给柏格理。

柏格理在石门坎落脚后，他着手解决的第一件事是将石门坎人的精神独立出来，他深深地知道，千百年来，石门坎人承受的不只是物质上的奴役，还有精神上的奴役。为此，柏格理集中精神办了三件事情。

第一就是把石门坎人从巫师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在石门坎，巫师有着重要的地位，无论是百姓，还是地主，对巫师都怀着三分的敬七分的惧。无论是天灾人祸，还是生老病死，都要请来巫师来施法，到头来人财两空。据《柏格理日记》记载，在柏格理到来之前，“贵州省境内连一个西医都没有。”当他在石门坎落脚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西医带进石门坎，一方面逐步建立医院，由他的妻子带着一个小团队为病者医病，另一方面宣扬干净卫生的生活方式，这一措施立竿见影，最后连巫师也放弃了巫术。

第二就是把石门坎人从地主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柏格理了解到，石门坎人每年除了向地主缴纳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外，还必须敬拜土目地主的家神。柏格理借以基督教名义，一方面向石门坎人传播“不敬拜别神”、“不

给他们酌酒，更不得向菩萨献酒”的基督教戒律，一方面与李斯提反一起，前往土目地主家，与地主展开谈判，最后地主同意以缴纳钱币换来“不献酒、不拜家神”。这一协议的达成，使石门坎周边四十五个寨子从地主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整个石门坎为之欢呼。

第三件事就是把石门坎人从自身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石门坎人以苗族人为主，苗族非常喜欢酗酒，节日、婚礼、献祭日都成为无节制饮酒的机会，有些人一场酒宴可以持续三天。他们的异性交往也较为随便，每村都建有“花房”，以供小伙子与姑娘们晚上聚会使用。柏格理到石门坎来后，首先摧毁所有“花房”，举办“同乐会”，成立“改良会”倡导严格的“一夫一妻”婚姻生活，同时，取缔一切以饮酒为噱头的活动。在柏格理等人的努力下，整个石门坎的风气为之一变，之前耻笑石门坎人的人们对石门坎人礼遇有加。

柏格理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将石门坎人丢失已久的“人”一点一点还原，让石门坎人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5

1936年，在云南的川籍著名将领杨森部下有一支球队，号

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听说石门坎有一支球队，水平十分了得，便率足球队来到石门坎，与石门坎光华小学师生进行一场比赛，光华小学以一球优势获胜，杨森非常吃惊：“我部队所到之处从未有对手，诘知石门坎还有对手。”

此时，距柏格理去世已经21年了，杨森不知，在1904年至1915年这11年间，柏格理已经把—个“厠屎不生蛆”的石门坎变成了一个文化高地。

把石门坎人从各种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后，柏格理开始了他的扫盲运动。1906年，教学楼和两栋厢房在石门坎完工，“识字班”开班；1909年，石门坎小学基本完善，建立了宿舍、礼堂、游泳池和运动场等设施；1910年，第一批举办第一批师资培训班；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石门小学取“光复中华”之意，正式取名为“石门坎光华小学”；到1945年，“石门坎边疆民族中学”成立，云贵川3省20个县都有学生在此读书。

这一场扫盲运动波及范围之

广，成就之高，历史罕见。在运动中，柏格理结合苗族服饰上的一些图案和拼音字母，创造了一套简单易学，便于掌握的苗文，结束了苗族几千年无文字的历史；开设体育课，举办运动会，使得一些现代体育项目进入乌蒙山区，包括团体操、游泳、田径、爬山、赛马、射箭等；建立平民医院、麻风病院，为石门坎人接种牛痘，教会石门坎人运用科学观念和手段与病魔抗争；进行“实业教育”，创办“推广布厂”，对石门坎人进行毛纺和麻纺技术培训，创办“良种推广站”，用以进行种子试验和推广工作……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何嵩昱先生认为：“随着英国传教士（柏格理）的到来，石门坎这个极普通的村寨成为了“西南苗族文化的最高区”，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教育神话”；开办了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创建了西南苗疆第一所中学；培育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开创中国近代男女同校之先河；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倡并成功实践双语教学；建构

出二十世纪上半叶西南地区最大的基础教育网络。”

斯人如此，夫复何求！

《诗经》说：“南有樛木，葛藟累之。乐只君子，福履绥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乐只君子，福履将之。南有樛木，葛藟萦之。乐只君子，福履成之。”柏格理就是这樛木，高大伟岸，枝繁叶茂，这石门坎人就是这葛藟，顺着枝干缠绕生长，蓬勃向上。

1915年7月，柏格理在照顾患上伤寒热病的学生时，不幸染上了伤寒热病，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病倒在石门坎，最终葬在他整日艰苦劳作的山中。也许他病逝时，他已经忘记了他当初来到中国时的决心——“惟求获得一种民族之信仰”。

6

六年后，我已经知道，现在柏格理的墓，只是一座衣冠冢，但一点也不影响柏格理的人性之光在着墓冢上肆意绽放，就像我所看到的石门坎的天空，虽然空空如也，但这蔚蓝却毫无边际。

也说石门

□ 桂龙香



石门百年校庆时，王大卫先生的著作《中国石门》一书被免费赠送给参加校庆活动的来宾。乍一看装帧精美，图文并茂，怀着对先哲的无限景仰，抱着对学者的由衷敬意，对石门人民的真挚情谊，我如饥似渴地读完了这部书。但越往下读，越感觉不是滋味。

真正有良知的学者，不仅有悲天悯人的博大情怀，更有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对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的人们的深刻理解。但王大卫先生的著作显然不是如

此。他写中国石门，虽然想慈航普渡，处处在为石门坎人民祈祷，但感情的着力点其实并不在此。在扉页上，他写道：“献给‘深入到石门采访、考察的中外记者、作家和学者。不仅是身体，精神苦旅，也是良知苦旅’”，也难怪王大卫先生的著作里，仿佛上帝使者，居高临下地传达“上帝之爱”，苛刻地审视今天石门发生的一切。

没有人因为柏格理是宗教的信徒而否定其在石门坎创造的教育奇迹，但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

去了解一个人，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自古以来，由于贵州“远在遐荒”，山高皇帝远，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影响甚微，浸润不深；中央政府对像石门这样的边远少数民族地区鞭长莫及，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仍，客观上给基督教在石门的传播提供了发展空间。苗族人民迁移威宁的历史，既是一部迁徙史，同是也是一部苦难史。柏格理们在布道的同时兴办教育，虽然其目的是为了传教，但在客观上则是对闭塞的山村吹来了一阵



现石门乡新营苗寨 罗春卫 摄

清新的文明之风，同时，石门也成就了柏格理。在肯定柏格理精神，承认柏格理巨大贡献的同时，难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审视一下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目的，就是无限上纲的“政治”了吗？因为柏格理客观上作出了巨大贡献，就以偏概全地否定了英国殖民主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了吗？抗日战争时期，西南经济文化因很多工厂学校机关内迁而一度发展迅速，我们难道可以得出结论：日本侵略中国促进了西南经济文化的超常规发展？

《中国石门》一书，绘声绘色地描写石门旅途的艰难，给人的感觉，除了证明柏格理百年前的艰辛，更大的程度上就是为了表现文人学者“身体、精神和良知的苦旅”是如何伟大，“行走在石门的伟大的灵魂”（王大卫先生说的当然不包括在这里的干部群众）是如何的不易了。新中国成立后，石门无数的干部、教师和职工在这里奋斗了半个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大卫先生是看不到的，他很少写到他们。王大卫先生的著

作更主要的表现手法是对比，无论是文字内容还是图片资料，无非是突出表现教会的教育奇迹和今天儿童失学对比，过去的文明发达和今天的触目惊心的贫困对比，他们这些文人学者的高度关注与当地党委政府的漠然对比，政府领导的无力和群众的宗教热忱对比……，无视解放后石门各民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和睦、共同繁荣、发展进步的客观事实，无视党和政府作出的艰苦努力，渲染和夸大石门的落后，把今天的石门描写得一无是处。

对县委、政府为使校庆活动办得隆重、热烈、适度，推迟到今年举行百年校庆，也颇多微词。

石门教育事业因种种原因没有了昔日的辉煌，我们也不否认如今石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对滞后的事实，但客观公正地对今天的建设成就作出肯定，不仅是对生生不息的石门人民和在这里奋斗过的干部职工的肯定，也是对今天依然在这里创业的人们的鼓舞。学者们对石门的关注，对石门的宣传，如果都像王大卫先生这样沉湎于过去，抹煞新中国成立后的成就，只能给西方以攻击中国人权的口实，挫伤石门广大干部群众的信心。对于那些真正关心石门的学者，纯朴的石门人民会以感恩的心，由衷感谢他们。但是，“纵观文人学者乃至

基督信徒们，大家都在津津乐道地不厌其烦地不断重复着这个故事，……大家似乎只对这故事感兴趣，而对其后石门学校一个世纪的发展并非真正关心，特别是1952年人民政府接管这个教会学校后的发展更少有涉及，……这并不是科学的历史的观点。更多的学者则把这里当作调研的基地，以完成其研究任务，或者根本就是来猎奇的，对石门乡的发展特别是教育问题并不关心，……”（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贵州省委秘书长姜刚杰语）。我祈祷（向王大卫先生学来的）这样的文人学者早日完成自己的著述，束之高阁，不要再打扰真正为石门的教育和发展作出贡献的柏格理，让他安息；也不要再来惊扰这里的人民，他们需要的

不是垂怜，不是祈祷，是真正的理解和支持，最终改变命运不是靠基督，只能靠党委政府和石门人民自己。

回到柏格理精神，柏格理和他的后继者们用其几十年的实践乃至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他们的献身精神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使原本落后的石门实现超常规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一厢情愿，力图复兴石门作为“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的地位，不是今天石门文化研究的正确态度。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广大干部群众的不懈努力，艰苦奋斗，打造和发挥好石门文化品牌的独特优势，构建和谐石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是我们今天应该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新建的石门民族中学 罗春卫 摄

本栏责任编辑：蔡逸秋



位于解放路的威宁县食品公司三街门市部旧址 唐福德 摄

威宁往事

□唐福德

任何回忆你都有权刻骨铭心，
因为时光终究无力挽留那些曾经在我们生命中经过的温暖。

——题记

食品公司

食品公司差不多有十个豆腐社大，在市场坝里面。肉是那个年代的贵重食品，远远不是豆腐之类的东西所能比的。作为供应猪肉的总部所在，食品公司仅凭它设置在县城主要街道的几个鲜肉供应点，就足以成就那个时代最大的幸福高度。在那种高度之

下，所有人的欲望都显得异常渺小，那种仅仅只靠一溜三尺高的柜台，几把砍刀支撑起来的幸福，简单而又意味深长地充满着时代的自豪感。

我陪母亲在肉市的柜台前排队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苍蝇忽上忽下，在狭窄而又充满肉香味的空间惬意地穿梭，刺耳的鸣叫和噼噼啪啪的剁肉声混合在一起，折叠成肉市经久不绝的市侩声，以一种不可一世的态度在我面前大张旗鼓地炫耀。但在那个夏天，我在听觉上却保持着异常出奇的冷静。苍蝇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我反倒是透明的。在那块约有三寸厚的木案板前，咽着世上最好咽的口水，看着世上最锋利的刀，闻着世上最好闻的味道，我感觉自己是幸福的。在石块或砖头堆砌，表面用水泥拌料糊抹，并打磨光滑的石柜台上，杂木的肉案板横躺在鲜肉的下面，龇牙咧嘴地听着快刀穿过鲜肉剁在自己的身上，躲是躲不过的了；好在每一刀过后，鲜肉的脂肪就会滋养一下干裂的刀口，这种命运在某天正午时分竟然让人羡慕了。五保户赵老三按人头领到的鲜肉供应票被自己毫无计划的馋嘴嚼完后，站在门市部的台阶上左看右看，上嘴唇和下嘴唇快速地合拢又分开，分开又合拢，像蜻蜓点水，吐出句让很多人恍然大悟的口水话：“怪了，怪了，肉案

板天天吃肉，人还不如这木板板哦”。这话引来一阵附和：“是哩，下辈子你干脆做一块木板算了，不用票还能天天吃上肉”。欢笑声中，谁也没注意到肉案板重重地龇了一下嘴……

我们三街的猪肉供应点，在市场坝入口斜对面，是一幢三层混凝土结构的平房，上两层住人，底层一溜排开三个门面。无论从外观还是内里看，算得上是那时最好的建筑，方位坐东向西，按照民间的说法是“朝阳”，专业的说法是采光好，所以每逢天晴，临近中午，太阳就眼睁睁地盯着供应点看，时间一久，便看出了这半截“土街”上的一些端倪。关于肉的细节或者表情，在不经意间都注定逃不过那双挂在高天却又无法遮挡的眼睛。那些少得可怜的心事，也随着阳光的直视一点一点地在供应点门前被摊开。比如，提着肉从门市部出来的张大爹眯着眼从台阶上走下来，喜滋滋地庆幸自己认识操刀的王小二，在下刀的关键时刻，刀锋只轻轻一偏，就避开了原本属于自己的那个筒子骨，至少有一两肥膘肉的便宜轻易就神不知鬼不觉到了自己的手上，改天遇见王小二，一定要对他多说上几句好话，最好是在他没看见自己之前就给他笑，给他打招呼，这样才能表足自己对他的感激之情。紧跟着出来的孙大妈，在柜

台前只转过一半的身子，笑脸立马就像被冬天的北风吹跑了一样，心疼自己倒霉，摊上了这个足有二两重的筒子骨，原先想着小炒一盘不添加任何配菜的精肉心思，在还没有迈出门槛的一瞬间就已烟消云散，丧着一块脸不得不对炒精肉的方案作出调整。路过门市部的王嫂子呢，本来是下定决心不往门市部里看的，但走到近处，耳边响着的那片苍蝇呼喊声以及鼻孔里面飘进来的肉香味，早已将她弄得心猿意马了，偏偏身后又传来李大哥对孙大妈说的那句“割肉啊？”的话，硬是逼着她扭脸朝门市部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得她心里酸溜溜的，嗓管快速地鼓了一下，咽下了一大口口水。同时心中怪起在贵阳工作的小叔子来，这小叔子为啥不在家中计划吃肉的时候回家，而偏要在计划外的日子从贵阳回来探家，让一家人的肉票少了两张哦……

门市部关门的时候，夏季的太阳还老高，随着苍蝇们在门缝里进进出出，随着从门市部前走过的一双双眼睛经意或不经意的一瞥里，食品公司第三门市部面对着夏天的阳光，隔着平街上的那排青瓦木板房，悄然传递着空气中能够盛得下的幸福空间。同时也注定了在此后的时间里，幸福的含义和表情走了几十年，最精妙的东西却还一直留在那个年

代。那种人与人之间用素面朝天搭建起来的微妙和用计划经济丈量生活质量的满足，在食品公司肉市前一摊开，像一幅世俗画卷交给夏天的太阳，直到一整条街被看得走进暮色深处，最终被卷起为止。

想吃猪肉的其实还不止人，街坊孔家的那只一辈子只穿一件黄外套的猫，因为一斤六两猪肉而整整离家出走了两天后才怯生生地回到家中。年末，孔家把全年省下来的肉票集中起来数了又数，决定年前最后再吃一斤六两肉，其余的留到过年时再统一消费。那天一大早，孔大婶顶着寒风在门市部排了一早上的队割好肉回家，下午出门时千叮嘱万叮嘱地叫放了寒假的小儿子看好肉，谁知她刚一出门，儿子的同学便来约儿子出去滑冰，小孩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出了门，把冬天的家门交给了一把铁锁的同时，也意味着将一斤六两猪肉交给了穿黄衣服的猫。到下午接近黄昏时，整条街都不约而同地听到孔大婶歇斯底里的呐喊，儿子听到后丢下同学往家赶，进门便被劈头盖脸的一顿狠揍，当他流眼泪问老妈为啥打他的时候，穿黄衣服的猫正远远地蹲在木楼梯上看，看的过程中感觉自己打了一个寒噤。这寒噤让脚步匆忙的冬夜眨眼间就来到了孔家。孔大叔下班回来后，同样也歇斯底里地

吼了孔大婶一台，揍了儿子一顿，然后楼上楼下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抓到穿黄衣服的猫，用手捶，用脚踢，黄衣服的猫企图用哭声换取主人的同情，当它感觉身上不疼的时候，自己已经飞出了孔家大门，在冰天雪地的寒风中接连滚了几个轱辘，它同时看见从邻居窗户透出的煤油灯，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小女孩手中的火柴。穿黄衣服的猫就着微弱的光，一拐一拐地借助离家出走的机会在冷风中整理生疼的思维，一边走一边想：到底是猪肉好吃，还是耗子好吃？

直到两天后，结束了离家出走的无助，穿黄衣服的猫仍然没有将猪肉好吃还是耗子好吃的答案带回孔家大门。

当然，这样的意外毕竟不多。那些穿黄衣服或穿其他颜色衣服的猫们，终究解释不清楚那个年代的猪肉，为啥在此后的时光隧道中会给人留下如此多的深刻记忆，这记忆窜起来的不单是食品公司门市部，它还暗示了这个小城世俗但亲切的画卷，以及在画卷中走动的鲜活嘴脸，还有那些嘴脸转身后的社会变革，在变革中逐渐失落的人性，和在人性中绝美谢幕的那些传奇一样的温暖。

红旗照相馆

小学毕业时，我有了第一张

照片，是在红旗照相馆照的毕业照，这是我十四岁前唯一的一张相片。之后我上初中，再之后不同阶段的相片开始多起来，但我却从此再也没有跨进过红旗照相馆一步。

国营红旗照相馆位于平街（现在的解放路）上，坐南朝北，两层砖混平房，相馆在二楼，占了整整一层，楼梯在房子外面的左边，楼上只有一道门，进了门后首先是一间宽大的摄影室，一块黑布捂着由三根木架托着的一个四方盒子，正正放在房子中间，靠东一整面墙挂两张幕布，一张有图案，一张无图，黑色；其它两面墙边摆一溜木凳，中间的隔墙开一扇小窗，旁边开一道门。女照相师从小窗伸头往外面看，毫无表情问一句：“照相？”外面答“照相”，便登记，埋头说：“去站好”。去的人都懂，也就自觉去幕布前，或站或坐，看需要而定，照相师傅离开小窗走出房间，径直走到黑布捂着的盒子前，掀开黑布一角，将头埋进去，右手拉扯出一个用胶管连接的椭圆形坨坨（后来知道是相机快门），然后抬起头来开始调整照相人的姿势，师傅的脸也在此时有了些许笑容。大多数时候，女照相师都重复一句话“眼睛看我，笑一笑，对，就这样”，随着右手一紧，空气中传出“咔嚓”的一声响，一个人就将自己放进了红旗照相



位于解放路的原红旗照相馆旧址 唐福德 摄

馆的一张相纸上，同时也将记忆和青春，以及那些平常或者已经出人头的生命时光，在相馆那座台式老相机中保存了下来。

不知道是叫向阳牌或者其它什么名字的座式老相机，静静地在红旗照相馆的大厅里迎来送往，它只是看见人脸上的表情在空旷的大厅绽放，无所谓漫长或短暂的生命，经过另一种形式的表达后，越来越显得扑朔迷离起来。这些暂时都跟相机无关，但

在许多年以后却又都与相机联系起来。一切非亲非故的故事，所隐藏的时间与不得不说的时间加在一起，远远胜过一个人的一生。而相机记录的过程与消耗的生命，是不是又能长过一个人在乎的青春呢？但最起码，它在1981年的夏天，让一群懵懂无知的孩子们并不十分在意的时光，无端地漫长了一大截，让学校操场上的树荫忘记了自己的前世今生。树枝缝隙间的蝉同样也面临

着毕业，只是树上的毕业和树下的毕业不同，树上的毕业意味着生命的涅槃和宿命，树下的毕业则代表着一个不成熟的片段，从此走向另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是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哪怕在下午，也绝对是早晨的事情。这一点座式相机心知肚明，它在红旗照相馆的那些年月里，最大收益是阅人无数，最大的处世之本是宽容；这种宽容，接纳了所有踏进相馆的人以及内心的脆

弱。座式相机让人们可以看见自己一去不返的生命过程，真真实实地证明着生命在世间行走的痕迹。就像参加“对越自卫还击战”的吴姓人家，一家八口人在老四戴上大红花坐上军车去云南前，到红旗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第二年吴家老四便在战场上光荣牺牲，尸骨最终也被安顿在云南的土地上。英雄留给故乡最清晰的记忆，除了脆弱的生命，就只有那张对吴家异常珍贵的全家福了。那些日子，红旗照相馆的座式老相机，比平时更加沉默和伤悲。

相机也有快乐的时候，一对新人经过试探、相识、恋爱，直到瓜熟蒂落，直到结婚前走进相馆，人生才算是完成了众多小结的其中一个。而在此之前，任何有滋有味的单身生活都是不完整的。成家与否，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青春过得是不是有质量。座式老相机凭着多年的临街经验，在红旗照相馆的店牌后面，想象着每一个从平街上走过的适婚男女，谁也说不清它的担心和放心哪一种要多一些。不过，当一对男女经过走廊掀开门头上挂着的黑布，婚姻的喜悦就在相机面前展开了谁都能猜得到的幸福生活。相机的声音那时仿佛也比平常要响亮得多，照我的理解，那声音代表着对将来一家人的祝福，况且这句祝福一生也许只有

说一次的机会。女照相师的笑容也同样只有笑一次的机会，所以，大家的祝福和笑容都表现得异常灿烂。我不知道自己那个时候对这样的祝福和笑容有多么的渴望，或许我根本就没有从这方面去想。因为1981年初夏，我只是小学毕业，离婚姻还有二十三年的距离需要去飞翔和靠近。

仅仅只是1981年初夏的那个早晨，我就等了足足十二年，红旗照相馆也等了我十二年。我们之间的约定与生俱来。等待的过程既扛不住往事，也无法知晓未来。我甚至在小学毕业之前，对位于平街上的红旗照相馆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偶尔路过，心中充满着有意或无意的两次敬意，一次向左，一次向右。那些日子，相馆的命运与许多曾经胀鼓鼓的记忆连接在一起，一个人的光阴也总是在一点一点地瘪去。在我们的身边，形形色色的表情经过又消逝，平街上的宽度和长度，在午后的阳光下令人寻味，所有从这里走过的事物既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更不是永恒。它只是有可能经过了座式老相机的时间，而老相机在下午常常时间充裕。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事物、事情中，小城单独把一大串时间匀给了相机，匀给了我们，匀给了它自己。直至许多年后，时间仍然还是时间，而我们已不再是自己，老相机会不会也成了更老

的相机？它在1981年夏天握住的那把时间，恍若隔世。

永远其实是有区别的：一种是要多远就有多远，一种是有多远它也不远。

国营红旗照相馆的那个上午，就在远和不远之间，分不清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将来的孤独。我们也分不清楚。经过师傅在暗房中对胶片的冲洗、显影、定影等一系列工序，威宁县城关二小五年级二班的毕业留影照，就在第三天清晨集体亮相了。捧着那张七寸大小的黑白照片，我们对明天的渴求，掩盖了在潜意识里一直飞奔不息的童年时光，而在时光中歪歪斜斜走过的那些片段，包容了课间所有产生过的细节和弱不禁风的谜题。多年以后我突然明白，我们那时忽略成长的烦恼，忽略教室木楼板上的读书声，只为了长大后还能将年少的回声牢牢地扛在肩上，在不借助任何风向的情况下，也能健步如飞地奔跑。而在那个时光倒流的上午，我们的童年把阳光和对前路的猜测，折叠进一纸轻飘飘的成绩单，懵懵懂懂地走出城关二小的大门，转身汇入滚滚红尘及匆匆人流的刹那间，并不知道要怎样去判断一个人此后的情感和过往的岁月。

同窗五年，在1981年初夏的时光里，我们不懂得告别。

现在，偶尔走过人尽楼空的

国营红旗照相馆，记忆仍然在抬头和低头间呼唤，仿佛我积攒了三十年的时空岁月，也尽数回到相馆那一块黑色的幕布前，经过女照相师傅的重新排列和组合，握一段有关人生岁月的长短，以此来纪念我们在时光深处永远珍藏的那个淳朴年代，以及遥远而又脆弱的国营红旗照相馆。

这，可能吗？

三街粮店

粮店的名字简单：三街粮店。范围包括中山路、民享路、江西街、上关岭等街道。粮店坐北朝南，在现在的民享路半腰与江西街南边路口交汇处，中间隔一间自来水供应点。

到我懂事，可以帮母亲去粮店背粮时，姐已经出嫁，我们全家五口人的肚子，全凭一本牛皮纸做封面的硬壳购粮证支撑，全家人的姓名、职业、粮食供应数量等一一登在本上。粮店比民享路路面矮大概两级台阶的样子，砖木结构，青瓦盖顶，上下两层。外墙用白石灰抹面，凿了两个一尺见方的孔，伸出同样两个一尺左右用白铁皮焊接而成的漏斗，漏斗穿墙而过，连接着店内用木板和铁皮做成的梭槽，在店外漏斗口下方的地面凹下去六七十分，够放一个背箩从漏槽接粮。粮店外表并不打眼，但

内部结构却是拥挤不堪，一张带有三个抽屉的木条桌供收钱和票用，周围码放着一袋袋整整齐齐的包谷、面粉、大米及一些杂粮，秤和用来铲米、铲面的高帮铁簸箕“灰头土脸”地坐在粮堆上，油腻腻的大油桶立在粮店进门的墙边，上插着一个带有刻度和油嘴的“打油器”。售粮员确定你要买多少油后，将“打油器”上的小钮调到对应的刻度上，一压手柄，油就从大桶抽进你的瓶或罐里了。粮店卖的是散粮食，居民要自己准备口袋、竹背箩等工具，布口袋装大米和面粉，背箩装包谷，玻璃瓶或者土制陶罐装菜油。我家的菜油是用土制陶罐来装的，陶罐产于当地，形状小嘴大肚，罐口用两寸左右长的苞谷骨头裹层塑料布塞堵，满满地大约能装五市斤菜油。一般来说，各种粮食运到粮店先是堆在一楼墙边，每天由售粮员把粮食打散后倒进楼上相应的木槽内，楼下的售粮员负责验证、收钱，楼上的负责称粮和放粮。验证、收钱、称粮的工序完成后，居民就到粮店外，根据自己所买的粮食类别将布口袋或者背箩放在铁漏斗下，一颗头戴蓝色布帽、满脸都被面粉染白的脑袋从漏斗上方的小窗中伸出来，问：接好没得？买粮的人边调整口袋边抬头看一眼“圣诞脸”说：接好了。只听“哗”的一声，或“噗”的一声，之前

还营养不良的背箩或口袋，瞬间就变成了肥头大耳的“罗汉”。多数人单从放粮的声音上，就能分辨出买什么粮食：“哗”的一声是包谷，“噗”的一声是面粉。买苞谷时背箩对准漏斗就可以，若是买面粉，口袋一定要套在漏斗口上以防面粉洒出口袋；声音响过，母亲都会习惯性地用手拍拍漏斗，确信里面不剩一丁点面渣后，我们才背起竹背箩开始往家赶。

从江西街到上关岭一路上坡，我人小，不能一气把粮食背回家，中途歇气时，母亲几乎都要提前几步走到我前面，寻找适合我个子的石坎子供我歇气。整条江西街用青石板铺就，阳光下，油光水滑的石板和石板之间保持的默契，曾经远道而来的江西人不说，江西人的后裔们也不说。一切仿佛都是按照民间传说的章节来谋篇布局的，首先是长途跋涉，然后是一件件银器锻打出的生活起居，当江西人的故乡在祖先们翻来覆去的大地上安安静静的时候，远隔千里之外的咸宁东城外，一家首饰铺子在鞭炮声中毅然绽放。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一段繁华注定要被岁月镀得光亮如月，并让一个陌生的地名出现在清朝时候的咸宁人心中。三百多年后，粮食让我的童年跟在母亲身后下坡、上坡，江西街成为全家人生活的必经之路，街上的

住户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我和母亲走过时，偶尔会得到一两句赞扬我懂事，知道帮大人做事的话语，母亲笑，我也笑。

在远处粮店中进进出出的人也在笑。

是的，粮食是我们有气力笑着继续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这意味着尽管日子艰难，生活清苦，我们也能够怀揣希望，从物质匮乏的“计划经济年代”里一笑而过，并用那种因粮食而躁动的幸福表情，来填补童年极易动摇的稚嫩和信念。在简单的日子深处，粮食的回声陪我一路走走停停，那些充满诱惑的时光之旅，从既定的高度和神秘中还原出一家人的清晨和黄昏，粮食的重量和由此而延伸的长度，注定要比所有成年人的梦都还轻。而我们正在经历或者已经经历了的那些想象，以及毫无边际的生活章节，犹如电影院里刚刚展开的跌荡起伏的剧情，高潮最后都指向粮食。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三街粮店的陈旧和喧嚣，正好可以放在岁月转身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供另一段岁月在回忆中寻找老故事时的依据。掐去与世俗无关的那些高贵，或者道貌岸然的几十年时光，由粮食书写的章节最终也只剩下了粮食。时间的无限，放弃了自己原始的积累。粮食从田边地头走进熟悉的村庄，经过一次次粗糙、龟裂的温度，从粮店的低处

走向高处，从高处走进深不可测的人心，哪一次的旅程不被充满幸福的疼痛反复拷问？当三街粮店在阳光中醒来又睡去，春夏秋冬或者寒来暑往的定义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粮食的精神仍然与我有关，与所有活着的人有关。

就我而言，在三街粮店所接触到的粮食种类，与那个时代的特征一样简单，按比例供应的大米、面粉、苞谷几种常用口粮，静静地在我们的生活中喧嚣着日子的长短。尤其是苞谷和面粉，大多数时候总是与我们亲密无间地共同抵挡着属于人类的饥饿。或许它们也有属于自己的苦衷。从播种到发芽，从生长到成熟，它们试图通过人类来实现自身隐藏的某种轮回，以一种游离于现实和梦幻之间的民间精神，提醒着我们的来日方长。有过一阵子，粮店来了一批个头要比平时大一些的包谷，据说是漂洋过海的罗马利亚品种，虽然在做法上我们仍然将它们平等对待，从粮店到咽下肚子的工序丝毫不差，但感觉吃味就是赶不上土生土长的国内货。直到一种在今天看来无法忍受的说法在街坊邻里间大量流传，说粮店供应的这种包谷在罗马利亚是用来喂猪的后，我们仍然乐此不彼地顾不上打上一个轻轻的寒噤。倒是街坊刘大哥端一玻璃瓶茶水，逢人便大谈特谈罗马利亚如何如何的好，我们吃的

粮食都是人家猪吃剩下的东西等等时，我们仿佛才在忽远忽近的饥饿感中，找到芝麻大的一点向往，这种对陌生国度永远没有机会走近的念头，远远地诱惑着我们和大人之间的神经。由此可见，那个摸不着看不见的罗马利亚是多么的富有！一些人少不了要添油加醋地附和，言语间充满了羡慕和无与伦比的幸福感，但想过之后，大家依然还是沉浸在具有鲜明特色的时代富足感中，没有一丝一毫的诸如贫富不均的牢骚。只是这种坊间传说的真伪，在三街粮店的记忆以外，却被时光不明不白地珍藏了几十年。

然而，粮食的故事远不止这些。它既宽容了民间太多的离奇和纯粹得纤尘不染的直白，也同样书写着一个国家遍布大街小巷的诸如“抓纲治国、以粮为纲”的政治标语。如此，围绕三街粮店的回忆，也就不仅仅限于对一个时代说说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了。

电影院

电影开演前，大概有二十级台阶的电影院门前挤满了人，台阶前的平地上挤满了人，售票处也挤满了人，整个电影院犹如汪洋中的一条船，在暮色的合围中逐渐靠了岸。房檐上那盏大射灯斜斜地照在台阶和平地上，照得

人心花怒放，尽管如此，大多数人手里还是握着吕皮做成的手电筒，一束束电光忍不住内心的躁动从人群中喷涌而出，在人的头上、身上和脚底滚来滚去，接着弹向四周建筑物的墙壁，最后直直地射向天空。

电影院的大门由三扇镶玻璃的木门组成，工作员一般提前半小时打开一扇，用一条木长椅顺势卡在门边，一些坐在椅子的靠背上，一些齐刷刷地站在椅子边上，查看一张票放进一个人，虽然被挤得大汗淋漓，却查守得相当严密。电影开演，售票处和大门是高潮。没有票要混进电影院看电影，守门的人是关键，如果是熟人，彼此心照不宣地放行，进了这道门便意味着合法，一溜烟便跑进去挤在木椅上，观众与观众之间不问出处，大家各自看自己的电影。电影院内清一色的长条木椅子，暗红色，按正常容量坐五个人，靠背上留出一人宽的隔条，用白漆编排和编号，观众按手中的电影票对号入座。随着场内的灯光暗下来，一部电影开始在夜空中演绎改编来的传奇，故事里的人和事，花与草，阳光与风雨，寒冷与温暖，以及白天与黑夜，一一在七十年代的时光隧道中穿梭往来。

凭着与街坊陈叔的关系，我逃过了八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挤在老电影院的长条木椅最边上，

看已经开演的彩色舞台样板戏《沂蒙颂》。随着剧情的展开，我逐渐平息了因为逃票的不安，焦急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敌我双方的交战。在电影院的黑暗里，什么舞台艺术、灯光、肢体语言等电影的元素我们一概不懂，我们只想看打仗的镜头。一般来说，每部电影的片头，往往是我们判断这部戏是否好看的依据，那时，八一电影制片厂拍的电影大多数是革命战争题材，而片头那个光芒四射的五星则代表着这部电影是不是打仗的。只要片头中出现五星，整个电影院的掌声、欢呼声就会响成一片。我混进电影院时，电影早已开演，片头中是否出现了五星我不知道，但电影《沂蒙颂》直到散场，也没有出现我想看的打仗的情节，这令我很失望。走出电影院后，很多人在抱怨电影中没有发生战争的同时，一个劲地可惜自己的那八分钱。但电影院并不因为这部没有产生过打仗情节的电影，而影响它在那个年代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

第二天放学时我遇见了陈叔，打过招呼后他问我昨晚的电影好不好看，我说不好看，他摸着我的头说：鬼娃娃嘞，这种电影你这种年纪肯定是看不懂，等哪天有打仗的你再来，但要注意别挤着。我答应一声后往家赶，陈叔在后面一脸慈祥的笑着。多

年以后，我一想起电影就会想起十一岁时的那个上午，以及那一张慈祥笑脸。在电影院工作一辈子的陈叔，在戏里戏外进进出出了几十个春秋，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结局，却唯独没有看穿自己身上的人生变数。我上初中那年，陈叔未婚的侄子因为在野外喝凉水引发了一场大病，在去北京等地治疗后仍然不见好转，最终竟然导致精神间歇性失常，疯了。那段时间，从陈叔家门前经过让我提心吊胆，以前满脸堆笑平易近人的明山哥，时常用恶狠狠的眼睛将路人看得内心发麻，我不得不在经过时一鼓作气跑过陈家门口。

某天放晚饭学后，听父母在摆谈中提到疯子明山哥从家里地底下挖出了财宝，父母说，这鬼娃娃用这笔钱看能不能把自己的病医好哦。接下来的日子里，街坊邻居都在议论有关陈家挖出财宝的事，有的说是大洋，有的说是银子，有的说是铜钱，这些说法都是在私下里传递，不论是大洋或者银子，还是一罐或者几罐，反正都无法向一个疯了的人去求证。陈叔的笑脸依然在笑，但笑的质量明显下降了一大半。偶尔陈叔会给街坊透露一两句家中事务，话题还是集中在疯子的头上，说疯子整天扛一把锄头在家里挖来刨去之余，还问他独吞了多少老人留下的钱财等等，每当这时，

陈叔总是一脸的茫然和无奈。从大人们零星碎语中，还听说疯子明山哥要独住老辈留下的祖屋，让陈叔一家搬出去住的传言。我们人小，不解大人们的心事，但陈叔从此开始爱独自喝闷酒的习惯，却是深深地留在了我的印象里。这期间，疯了的人又一次出去看病，不过这次他不是站着走进家门的，而是被装在了一个小箱子里由他在地工作的母亲捧回来的。灵堂设在陈家老屋里，透过灵堂的缝隙，有人看见屋内的土有松动的痕迹。疯的人在灵堂里呆了几天后，带着他二十多年的行走和经历彻底离开了我们的视线，小巷恢复了平静。

之后的一段时间，在街面上很少看见陈叔，听说他大多数时间都爱呆在屋后那个大约三、四平米的花园里。花园我曾经进去过几次，虽然没有什么名贵的花草，但牡丹、芍药、月季、海棠等应有尽有，在一截从后房檐通向厕所的宽不过尺余的篱笆两边，枝繁叶茂，繁花似锦，鸟鸣啼翠。小小花园在七十年代的天空下，显得是那样的姹紫嫣红和充满生机，在单调而枯燥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地变换着四季出演的炫目魅力。在陈叔的花园里，仿佛所有的日子都是跟在花草身后慢腾腾地挪出来的时光片段，闲散而又亲切地向我们挥着光阴舒嫩的芊芊素手。然而，这个美

丽得让人不敢相信的童话，犹如电影里经常会出现的那种戏剧性的冲突，在现实中被侄子不经意的电闪雷鸣强硬地改变了。于是，在电影开演前的那些个黄昏，陈叔先是在凋零中站一会儿，之后便转身匆匆地走向电影院无数个不同的结局，或者开头里……

这种重复的画面在小巷中上演了大概年把天气后，随着陈叔举家迁往单位宿舍，一场画里画外的剧情，也在我们居住的小巷落下了帷幕。我们在布满青石板的小巷里，除了每天跟在枯燥的日子后面打发着素面朝天的光阴外，生活中少了有关电影方面的信息，少了陈叔与他花园一样温暖的笑容。此后，全巷子的人但凡有看电影的想法，只能自己穿城而过，从城东走到城西的电影院看电影海报了解影片行情。在这期间，电影票价也从八分钱提到了两角、八角等，并逐渐取消了“母子场”等优惠政策，电影种类及来源也随之丰富起来。县里接着又新建了一个电影院，我们以老电影院和新电影院来区分，起先，两个电影院放映的都是同一部电影，只是各自将开映时间错开，这个电影院放完一个拷贝后，工作人员用单车马上送到另一个电影院。我们也基本不再混电影看，但看电影时还是要去找陈叔帮忙，这样可以买到几张座位好的电影票。到后来，两

个电影院放的电影不一样了，票贩子也开始在小城出现，陈叔的大女儿和二女儿也逐渐长大，并都坐在售票处里当起了卖票员，我们要买好座位的票，直接去售票窗口找她们就行了。

后来，陈叔当了电影公司的经理。

后来，陈叔因为饮酒致病而辞世。

后来，我们就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了。

再后来，电影院就承包给外地人开商场了。

乡村露天电影

1997年夏天，我在一个叫龙街的镇上看了一场露天电影，电影是一个经营保健品的公司为了扩大产品的销售量而组织放映的。那天晚上，龙街的夜空星光灿烂，蛙鸣声脆，村庄在此起彼伏的流岚中安静得一如从前，镇政府的空地上，从田野四周汇集而来的沾满露水的一双双脚，像及了我们二十多年前，在那个叫北镇的村子里看见过的那些望眼欲穿的情景。

那个夏天对于刘哥来讲，是一个布满躁动和闷热的夏天，随着电影公司开始搞承包的体制在七月的空气中弥漫开来后，一部分职工从县城狭长的街道走出来，风尘仆仆地完成了朝着农村





黄土飞扬的山路转身的过程。刘哥是其中之一。一个人负责几个村子的电影放映工作，排好放映的日程，刘哥从电影公司领出电影拷贝，托人向要去的村子捎去口信，村里派劳力好的年轻人进城来将设备提前背到村长家放好，然后通知全村人某天某晚在村中的空场上看电影的消息。电影名称在装拷贝的铁皮壳上写着，村长口头向村民公布，不消半天，电影的消息便传遍了村庄灰头土脸的旮旮角角。村民们无论在茶余饭后或田地边角，于是开始将脖子伸长到不能再伸的长度，仿佛都掉进了苦苦盼望着刘哥瘦瘦的身影的漩涡。对于村庄，那个时候的刘哥就不单单再是刘哥，而是一部部名字不同、内容和风格也不同的电影了。年轻人大多零零星星的跑去村长家，围着放映机和拷贝左一圈右一圈地转着圈子，一场关于电影的话题透过村长家年初才翻过的青瓦缝隙，重重地落在房前那棵挂满果子的老核桃树上，撵跑了正在枝头叽叽喳喳的两只喜鹊。但村长家的客人源源不断，喜鹊们也不好将属于村长家的喜讯按下不报，在村里得罪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得罪村长，得罪村长就意味着村长的坏心情会引起日子不好过，村长日子不好过了，全村小到植物花卉、飞鸟鱼虫，大到天

牛棚镇白碗窑老放映员马双华为村民放露天电影 马学文 摄

空泥土、人马牛羊的日子都不会好过。喜鹊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尽管被村长家屋内传出的话音反反复复地扰乱了枝头节奏，也不敢在村长家的大黄狗停止对客人不满的表达前，安安心心地回到夏天的原野。

村长坐在火塘边喝着罐罐茶，一脸的不屑，半天挤出一句：狗日勒些，渺见过世面就别在老子面前瞎扯，反正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几爷子逗姑娘逗远点，别影响老子看电影就行了。村长不满10岁的儿子在一旁嚷道，还有老子呢？村长随手在火塘边抓起一把柴灰向儿子撒去说，狗日嘞，敢在我面前称老子？儿子还嘴说，你都称我为啥不能称？村长鬼火绿了，刷地一下站起来说，狗日嘞，老子是老子，你还敢跟我吊歪，看我不掌死你。屋内的人就赶紧上前劝说，接着就集体撤出了村长家乌烟瘴气的瓦房，带着对电影的无比渴望消逝在村长家的大门外了……

第二天恰逢星期六，下午放学后，我和街上的两个伙伴跟刘哥去了这个叫北镇的村子，电影设备早已经被搬到村子中央的空地上，刘哥我们经人指点在空地上找到了村长，村长见到我们的第一件事，就是着重强调了头天晚上在他家发生的那一幕。接着村长问刘哥对场上的布置满不满意，刘哥背着两只手在空地上

转了一圈，肯定了村长的成绩。村长受宠若惊，戴着绿军帽的脑壳像空地边上那几只正在啄食的鸡，在黄昏来来回回地点了不知多少次。能够容纳一两百人的空地上，电影幕布早已经拴在两根刮了皮的跟小碗一般粗细的松树杆上，松树是新近从山上砍下来的，松蜜油从内里沁出来，往下走了几公分后就凝固成大小不等的结晶体，在黄昏散发出一股味道纯正的清香，这香味与村庄的原始气息搅合在一起，仿佛村庄一次次前世今生的转身，从此就在我15岁那年的夏天彻底地安静了下来。那个极尽奢华地用彩霞满天织就的黄昏，暮色的表情，比下地干活转来的一头头老牛的脚步还要慢，慢得令那个叫北镇的村庄，从此不知道什么是世上最慢的夜色来临。

刘哥的放映机边摆放了两条四只腿的长条木板凳和一个独凳，村长两爷子占了一条，我和街坊的两个伙伴占了一条，刘哥坐独凳。村长在黄昏的缝隙里除了抬头看天、看人头蠕动的空地外，更多的是反复看着腕上那只上海牌老手表，并且不断重复着前一天晚上在他家里发生过的那一幕。北镇空地上的黄昏，就在村长东拉西扯的言行中，像吃臭豆腐干一样被时光一小点、一小点地掐去。刘哥一边整理着电影拷贝一边随手递支烟给村长，村

长马上关上滔滔不绝的肉嘴，从话匣中腾出一张堆满笑容的向日葵，将整个上半身弯到刘哥面前，双手像霜打过的焉茄子往前一送，两个拇指和食指，分别恭恭敬敬地扶住刘哥递过来的纸烟的两头，先横放在鼻孔边闻闻，然后将纸烟的一头塞进两排被烟熏火燎洗礼过的黄牙中……

暮色终于在一支烟的工夫里逐渐合上了眼。夏夜的北镇，终于注定要从一个高潮走进另一个高潮了。从1960年就开始在全国巡回演唱的刘三姐，到达我们这个边远小城时，一向平心静气的乌蒙高原立刻就产生了地动山摇的效果。尤其在乡村，更是百看不厌。每当县城赶集天，县电影院几乎都会在白天加演电影《刘三姐》，观众百分之百是从四乡八面到县城赶集的男女老少。那晚在北镇，作为压轴戏的《刘三姐》一出场，北镇的整个空地上掌声雷动，山歌吆吆，一片哗然。刘三姐在桂林山水里唱，观众在幕布外面唱，空地周围的飞鸟鱼虫也在夜幕的角落里唱，仿佛北镇的一生，只为一部电影里的一个女人醒来过一次，而其他时间则好像都在睡觉一样。村长在换拷贝时歪过头说，刘师，莫老爷这个杂种连山歌都不会唱，还当什么地主？不是吹的，老子的山歌有几大撮箕哦。刘哥回他话说，要不然你还当个球的村长。村长

一脸得意，站起身用手扶了扶吊在放映机头顶上 15 瓦电灯泡，一只飞虫在飞的过程中撞到了村长的眼角，村长腾出一只手边擦眼睛边说，狗日的，还敢整我？刘哥接过话头说，就是，狗都不敢咬村长，你一只毛毛虫还敢吊歪。村长没说话，一张嘴在灯光下笑得像夜间的荷花一样灿烂。与村长一样灿烂的，还有那个叫北镇的村庄，以及村庄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脑壳。

电影散场后，在村长的盛情邀请下，我们去他家火塘边烧了一排洋芋吃过后，在密不透风的夜色里举着两只手电筒，走出山歌声此起彼伏的北镇村口，踏上了回城的山路。刘哥在被浓浓夜露和萤火虫湿透的山道上，问我们以后还跟不跟他去乡下放电影，我们三个小街坊说只要叫我们，我们天天去都要得。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啊，既有电影看，还有洋芋吃，仿佛几公里的山路尽头，不但有我们童话一般美丽的年少时光，还有我们因物质匮乏而滋生出来的关于食物的幸福和欲望。遗憾的是，这种幸福旅程，在冥冥中似乎注定只能属于我们一次。而且是唯独的一次。

多年以后，当我们的生活不再因为电影而感动或麻木时，我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露天的漂泊者，依旧以她简单而朴素的道

具来打动我们繁华的年代；依旧在换拷贝的间隙里，令我们等候的心情迫不及待。依旧是几只飞虫围着放映机打转……”的句子。对我而言，算是对那些曾经在生命的夜空中闪烁过的章乐，留下一抹难以言说的，如流星雨一样的轻轻痕迹。

理发店

多年以后的农历二月初二，我和妻子带着刚满两岁的孩子，像母亲当年带着我一样，在县城四处寻找那些曾经在生命中出现过的老式理发店的时候，一家家摩登时尚的发廊正播放着各种音乐，随着阳光懒散而温暖的步子，在大街小巷陌生地散布着时光前世今生的行板。

熟悉的谢家理发店，在时光不经意的另一侧，隐去了它用几十年光阴拼凑起来的章节，由此而衍生出的那一个个人是人非的故事，最终也在县城慢腾腾的叙述中，随着泛黄的页面尘埃落定。仅仅只是一步之遥，便只剩下我踩着早春淡淡的步子，在怀念中看内心蕴藏着的渴望，同时，也看我遥远而又亲切的那些童年时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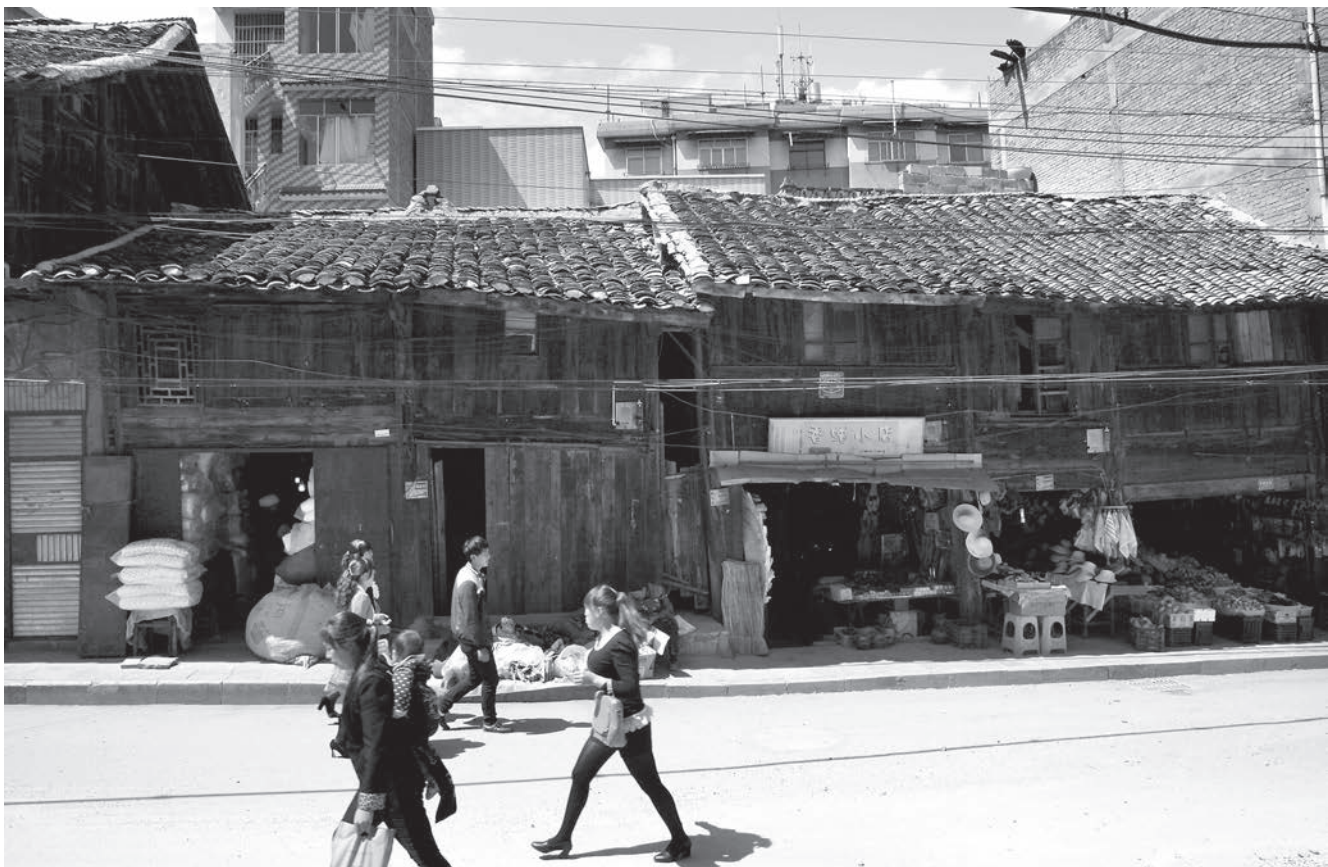
当一种真实走进另一种真实，为数不多的青春回响，就让流年似水紧密地跟回忆联系在一起，在阳光稳坐如禅的正午，飞

一般地向我跑来。

谁都知道，正月以前是剪发剃头的一个高潮。

老人们在准备好了过年的一切物品后，回过神来开始清理室内和孩子们的个人卫生，理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父母说正月间不能剪发，剪发伤舅舅，但凡家中舅舅还健在的，都必须赶在正月以前将头发打整干净，一方面避免伤及无辜，另一方面也好干干净净地过个年。那些日子，县城的两家理发店生意火爆，穿着白大褂的理发师，此时再也顾不上讲一句多余的话，一天到晚不停地用老式推剪忙着批发人头。碎发铺满一地，黑黑的，与室外飘飘洒洒的雪花遥相呼应，共同呼吸着越来越重的年味。

谢师傅的理发店在平街上，是老辈留下的房产。店面和墙身都用木板隔成，屋顶苦青瓦，内壁用过时的废旧报纸裱糊，除了遮挡从木板缝隙间透进来的风外，还起着美观和隔墙的作用，借以保守住自己家的隐私。谢师傅家没在店里居住，理发店因此就没有什么秘密和隐私而言，用废报纸裱糊，只不过是出于当地的习惯和美观上的需要。理发店四季不离火，火上的大铝锅装满用来洗头的水，周年四季冒着热气。墙壁上的报纸日积月累，早已炸裂或者泛黄，若是取下挂在板壁上的镜子，被遮挡的地方便



位于县城解放路的原谢家理发店 唐福德 摄

会现出一块与镜子一样大小的白，像是一扇啄在墙上的窗。

此时是一年中忙的季节，谢家没时间往墙壁上糊新报纸，墙壁就让它黄着，或者裂着。店里那两个有靠背的长条木椅子上，长时间坐满了等候剪发的人，没赶上座位的人，就站在木椅前，无论大人还是小孩，脸上都洋溢着过年的兴奋。哪怕平时不爱说话的大人，也会在这时与陌生人搭上几句有关过年、天气、娃儿等话茬。理发师老谢依旧一言不

发地干着自己的活路，对于他来说，忙是其次，重要的是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在过去的七八十年代里，差不多县城里常住的人都知道，平街上的谢师傅，剪发手艺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不知什么时候便送了个“谢刮刮”的外号给他。这个外号只在背地里使用，当面是不能说的。对于这一点，谢师傅当然是心知肚明，但谢家人对这个外号转不过弯，认为那是带有贬义的绰号，如果有谁当面锣背面鼓地叫，谢家人

肯定会不依不饶的。

农历二月初二则是另一个剪发高峰。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家家小孩剃毛头”。过完年后，我们的头发在春风中像柳树的嫩芽一路疯涨，在单调而乏味的二月，沿着日子的散板，渐渐铺满了春雷一次又一次朦胧的试探。大人们在闲暇之余，开始对春天喃喃自语。春雷的背后，不但有大地复苏和万物萌动的生机，更有一年之计始于春的希望和祈求。父

母们将目光从远处收回来，饱经沧桑的眼睛最后落到了我们的头上。如何将一个人在春天收拾得干净得体而显出朝气，乃至于顺利利地走过生命的一年四季，是民间千百年来无法回避的善良和大爱。所以，农历二月初二的这次剪发，便成为了我们在春天要做的一件大事。按照民间流传甚广的习俗，二月处于惊蛰前后，蛰伏了一个冬天的各种动物，在此期间开始恢复活力，连中国人在远古就崇拜信仰的龙也抬起了头，开始履行它降雨的职责。既然龙选择了在这天抬头，证明二月二就是吉祥如意的日子。民间凡事都讲究个吉利，全家人给予厚望的小孩在这天剃头，便喻示着新的一年从此开始，好运气也就随之常伴身边了。在父母的携带下，我们穿戴整洁，怀揣全家人的希望走进平街上的谢家理发店，心情愉快地将自己一年的吉利，交给了沉默少言的理发师谢师傅……

直到今天，仿佛我生命旅途中所有的吉利，都跟小时候的那一个农历二月初二有关。

所不同的是，三十年后的农历二月初二，我们一家人走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却再也找不到我印象中那种简单、朴素的理发店了。最后，妻儿在我的坚持下走进一家门面没怎么装饰，店名也不是时下流行的那种什么机

构啊、空间啊、工作室等名称的理发店。在排队等候的间歇里，孩子问我为什么非要选在这天理发，我避重就轻地说这是老辈传下来的日子。

说这话的时候，理发店门外过了一辆车和一些人，还有一阵很明显的暖风。

我确认自己没有撒谎。

人一生中有许多日子，谁又会对跟自己无关的某一天去加以刻画呢？在人潮如流的大街上，跟一个两岁的孩子讲剃头，或者讲一些不属于他的往事，时光只会无休止地蔓延，到头来会在什么地方停止，只有那个未知的地方知道。而将能够做很多事情的时光，交给毫无相干的某一天去保管或者挥霍，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冒险。所以，当孩子又问我为什么要有这个日子时，我无言以对。孩子不满，掉头望向他母亲，妻子郑重其事地说：二月二，龙抬头。在今天理发，大吉大利哩。孩子再问为什么会大吉大利时，这回换成了妻子不满，说你愣个会有这么多问题，再问，再问就整给你吃起。我在一旁好笑，母子二人便将矛头指向我，大的说我幸灾乐祸，小的则嘟起个嘴，在早春在阳光下，表达了他那个年龄最大的抗议。

在理发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是一个传统和容易重复的人。所以两岁的孩子别无选择地要把成

长的岁月和满头的黑发，交给那个多年以前就牢牢划定在早春的日子，跟我一厢情愿地在传统的缝隙中，寻找能够将一头黑发托付的那双手。他不知道，怀念在很多时候像我们正在行走，或是已经走过的任何一条路，随着时间的厚度与日俱增，路将成为老路，人将成为老人。怀念则成为了没有前生，也没有后世，并且从来没离开过家门半步的幻影。

但对于留在我记忆中的谢家理发店，却在每一次回首的间歇里，抖落平街上的尘埃和风霜，一点一滴走远，一丝一毫变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岁月深处走去。仿佛从它诞生的那个瞬间起，就注定没有任何转身的余地。而它真正的失落还远不止这些，它在街口静静摆放过的忧伤，在时间的最深处停留得实在是太长了，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知道它曾经就在过去的一二十年时间里活着。但还是无法像它那样，在路上可以毫无顾虑地坐下来，想一想自己该不该走进时间的深处。

但我不。

我现在还在时间可以容纳的距离里用一些记忆，看见那个镶在平街上的木板房后面，凭一双手让我和其他很多人的童年，在农历二月初二这天，清爽、利索地抬起头，看见阳光、天空、白云和暖风，树枝开始发芽，鸟儿

开始筑巢。那个外号叫“谢刮刮”的理发师，在春天的人流中，抬头或低头间，只用眼角轻轻地一扫，内心便可释然。因为他看见整个东半城的小孩们，正顶着由他描绘的画卷，在人生初始的季节里徐徐展开，他在这些鲜活的颜色中，自豪地找到了自己用平凡和坚守保持一生幸福的蛛丝马迹。

而幸福二字，是我在时隔三十年后，唯一可以对平街上的理发师谢师傅，以及他所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春天说的话。

豆腐社

天还没亮透，我提着家里那只瘪头瘪脑，却又被母亲在头天晚上就已擦拭得油光水滑的铝锅，走过微微泛光的上关岭青石小巷，拐上通往豆腐社的大道。

大道是土路，却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大街上”。这样的叫法，是在解放以前就一直延续下来的，直到县城开始对所有的大街小巷重新命名，并在各家各户的门头上钉上比烟盒稍大一点点的门牌号时，在民间叫了几十年的“大街上”，才正式有了现在的“中山路”叫法。这段路一华里多的样子，从上关岭岔路经城关二小，由东向西延伸，跨过已被历史烟尘撕毁了城楼和城墙的老东门，然后镶接在同样是凹凸不平的解放路的半腰。（解放路也是

现在的叫法，在当时叫“平街上”）顺解放路往左而下后再往右拐，便是经年的市场坝，我要去的豆腐社就零乱而悄无声息地堆在场坝的一角。豆腐社有围墙，墙里面的房屋四壁除了少数石头外，几乎全是由没有上漆的木板拉扯而成，顶上盖瓦，标标准准的土木结构。木板和木板之间的缝隙，大处能够容拳头穿过，小处也有手指那样宽，通过大大小小的板壁缝，可以看见装豆腐的木缸前大概有多少人在排队……木门槛龇牙咧嘴地横在脚下，大人一迈而过，小孩则往往要用其中一只脚踩一下，后脚才悬空跟进。所以，一间房子最疼、最具忍耐性的，应该就是门槛了，多年后我这样想。而在那个简单的年代里，每跨过类似的一道门槛，便意味着生活又多了一种幸福。

豆腐社是众多幸福中的一种。

进入围墙大门，远远地便能看见水蒸气丝丝缕缕地从瓦缝和四壁挤出来，整个豆腐社笼罩在一片氤氲之中。如今想起来，那种一年四季不断连绵的情景，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尽然一路生根发芽，成长为若干年以后还在向往着的海市蜃楼，亲切而又永远的遥远着。所不同的是，像那样固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海市蜃楼，在当时一点也不飘渺，它的大众化不但让人感觉不到一丝物

质匮乏的别扭，反而令所有的家庭对那两口冒着热气的木缸充满着温馨和渴望，对木缸后面那些个轮流提着勺子的人无比敬畏。在雾气弥漫的狭窄空间，一颗15瓦的灯泡吊在楼板上，睡眼迷矇地打量着并排立在地上的那两口木缸，木缸一口装纯汤，一口装嫩豆腐；在木缸中出入的勺子也是两把，一把铁的，一把木的，铁勺浅，木勺深，铁的舀豆腐，木的舀清汤。凭着每个月按人头发放的供应券，任何人都能凭票进入，排着永远不会乱了次序的队列，依次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到木缸前，先递上供应券，然后再双手毕恭毕敬地将自己的器具平抬至与缸沿差不多高矮的位置，眼睛盯着挽起袖口的手，以及手中捏着的那把浅铁勺子。先是木勺子在缸里舀上几勺泛着嫩黄色的汤水倒进你的锅里，铁勺子接着斜斜地飘进粉嫩粉嫩的玄白表面，轻轻地一挖，豆腐就进了勺子，然后再一送，豆腐就在嫩黄色的汤水里翻个滚，然后静静地躺在了锅底。那一锅锅黄白相间的浑浊，在灯光同样浑浊的照射下，令铝锅以外的嘴咽下了一口七十年代清晨渴望咽下的口水。在充满玄机的豆腐社，如果人熟，豆腐就能舀得厚一些，人不熟，就薄一些。我人小（大人也一样），不懂得计较那些（事实是：计较也无用），只把眼睛随着那只手

上上下下地移动，并在心里默默地数着那把长勺子伸进过铝锅多少次。

很多时候，我们两只手小心翼翼地端着铝锅走出豆腐社大门时，天才大亮。豆腐社每天早上供应的豆腐有限，卖完为止，如果去晚了，只能捏着票，提着锅第二天再起个早去排队。放到今天，吃不成豆腐还可以吃别的，那年月，每家每户吃粗粮还是细粮，吃豆腐还是白菜，几乎都是在头天就计划好了的，如果计划有变，很容易就会让一家人不知所措。而豆腐的加工工序多，程序又极为复杂，供应时间恰恰又选在清早，所以，在计划要吃豆腐的头天晚上，一家人决定派谁去做这件事，谁就早早地便要上床睡觉，以免误了第二天的大事。在80年代以前的那些年月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在路上行走的大人小孩，除了早锻炼以外，大多数都是拿着各种铝锅赶往豆腐社的。

遇上冬天，手冷，我常常是将锅放在路边高一点的地方，把手揣进衣袋捂一会，或者是左右手相互换着搓，边搓边放到嘴前呵几口热气后，重又端锅上路。如此反复，一段不远的路程，竟然也要好几十分钟才能走完。在我的印象中，那时的冬季凌冻特别大，只要是冻雨天，照本地话的说法，从天空落下的几乎全是

“黑头凌”。上关岭这一段路，长度不过百十来米，斜度大约45度角，加上中间铺满光滑如镜的青石板，在“黑头凌”的笼罩下，一切的行走姿势都会异常夸张。这样的天气去豆腐社，对于还不满十岁的我，是一种生活的挑战，更是一种那个时代的童年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从家里出来后，我横着身，习惯性地先伸出右脚，在石板与石板的铺接处找准落脚点，然后左脚跟进，站稳，接着再继续下一步。遇上石板大的时候，步子就会迈得很大，在右脚伸出寻找点时，为了保持身体的平衡，上身蹲下，重心自然就落在左脚上，提着锅的右手和空着的左手不自觉地杵在左膝周围的地面上，与武术套路中的扫堂腿相似。一路“扫堂腿”下完这百十米的青石小巷，拐上大路后我终于可以伸直腰杆站起来，恢复了正常的行走姿势。全部是泥土铺就的大路，斜度小，且上面没有铺石板，虽然也有凌冻，但比起上关岭的滑度已经是小得很多了。

从豆腐社出来后，我往回赶，在小巷口遇上二哥，他帮我将豆腐端回了家，接着我们去学校上课。中午回家吃饭，进门便被脾气暴躁的父亲一顿臭骂，原因是早上买回的一锅嫩豆腐，有的已经碎得跟胡豆一般大小了。我小声小气地说可能是二哥晃碎的，

父亲说等他回家再跟他算账，二哥回来后，父亲又接着骂他，二哥很委屈，说他好心就帮我端一小段路，不可能是他晃碎的。父亲找不到晃碎豆腐的真正元凶，于是又将我们二人合起来骂了一通后才息了台。这事过后，二哥差不多两天没与我讲话，姐不注意，大哥却看了出来，于是又在中间恶作剧地调拨离间，惹得二哥与我差不多到了要动“武”的地步。

那年冬天，买豆腐的事从此便没有再排到我。

三十年后，有一次与姐一家人去凤山寺赶庙会，姐说寺庙里有斋饭供应，我们便绕过正殿去厢房供应点吃斋饭，斋饭的菜除了豆芽等蔬菜以外，大多则是以寺庙居士做的豆腐为主。饭间，我看见一位端菜送饭的老人很面熟，好像似曾相识，却又感觉到朦朦胧胧，好一会才想起她似乎就是我小时候在豆腐社遇见过的几个工作人员之一。于是向姐求证，姐非常肯定地告诉我，说我没看错，并且还说出了她的姓名，以及她每个庙会都会在凤山寺做豆腐，已经持续了十来年时间的信息。

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三月初三。距离我去豆腐社买豆腐的那个冬天，已经过去了足足三十一年。

本栏责任编辑：肖林

世上到处都是山

(短篇小说)

□曹永

昌龙背着包裹，顺着山路往回走。

跑出去六年，昌龙到底还是回石门了。昌龙不仅回石门了，他还带回不少钱，就藏在包裹里面。山路像条笨拙的蟒蛇，慢慢朝岩羊湾方向爬去。虽然现在看不到那个叫岩羊湾的村寨，但昌龙知道，再走两个小时，它会就冒出来。

想起岩羊湾，昌龙无端有点难受。那里到处是陡峭的山崖，目光刚刚伸出去，马上就被弹回来，似乎要把人弹个跟头。以前在村里，昌龙经常坐在门槛上，撑着下巴胡想。昌龙觉得，生活在那种没滋没味的地方，简直跟牲口差不多。

世世代代，岩羊湾的人始终被关押深山里面，一辈子没能离开。多少年来，只有昌龙成功逃出去。但现在，他又跑回石门了。

昌龙背着包裹，顶着剧烈的阳光，顺着山路往回走。

翻过垭口，就看到那所麻疯病院了。很多年前，这里流传麻疯病。那时候，麻疯病很难治，大家害怕传染，就把病人赶出去。后来建起麻疯院，那些流落荒野的病人才得到治疗。有一次，昌龙去跑去麻疯院。没想到，里面居然还有几个老人。那些老人手足残缺，脸上坑坑洼洼，把昌龙吓了一跳。

看到麻疯院，昌龙就心里发毛。那他赶紧收回目光，埋头往前走。路边长着几棵树。那些树全都半死不活。在这种鬼地方，树也活得很艰难，它们无法尽情生长。树枝上挂着叶片，但不多，稀稀疏疏。树皮很厚，黑不溜秋，绽着无数裂纹，像饥饿的嘴巴那样张着。

昌龙停住脚步，他在看那些

树。昌龙心里怪怪的，说不出到底是啥滋味。第一次把来凤带到岩羊湾，他们走的就是这条路。姑妈嫁到黑土河，昌龙去那边走亲戚。姑妈就给他做媒，把来凤介绍给他。

来凤家遭了火灾，家里只剩她一个。昌龙第二次去黑土河，就把来凤领回来了。他们就走这条路。从岩羊湾出来，也只有这条路。昌龙走在前面，来凤跟在后面。有时候，昌龙会扭头朝后边看。来凤害羞，总是惊惊慌慌，脸红得跟什么似的。

昌龙记得，走到这里的时候，他回头问，累不累，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来凤没吭声，但看到昌龙朝树边走，她也跟过来了。昌龙搬块石头，让来凤在上面坐。来凤不坐，她低着头，几根手指绞在一起。

来凤的身上有股什么味道，

香喷喷的。昌龙想问，但没好意思。他闻着那股香味，嘴里渴的要命。后来，他舔着嘴唇说，要不然，我们还是走吧？来凤就跟在他的后边，像只温顺的猫。

岩羊湾被山崖夹在深沟里面，偏远闭塞，外边很少有姑娘愿意嫁进来。看到昌龙带回个漂亮媳妇，大家惊讶得好半天没合拢嘴。那时，昌龙对生活很满意，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会跑出去。

太阳很厉害，把风烤热了。风吹的时候，仿佛火苗在他的身上舔了一下。昌龙确实有这种感觉。昌龙抬起胳膊抹了一下额头上的汗水，继续顶着恶毒的太阳往前走。他身上汗淋淋的，连衣裳都浸透了。

经过苏戈寨时，昌龙看到路边蹲着个放牲口的老者。那个老者戴着顶树叶编的帽子，手里拿着根枝条。两头牛甩着尾巴，悠闲地吃草。几只山羊亮着红屁股，在树丛里钻来钻去。它们拱得树丛乱颤。

老半天没看到人，昌龙想跟放牲口的老者打招呼，但他只是这样想。昌龙晓得，苏戈寨的村民历来看不起他们。苏戈寨简直把他们当成麻疯病人，路上碰到，也似乎从来没给过好脸色。昌龙不是个小气的人，但他实在忍受不住那种轻蔑的眼神。

昌龙的头皮被太阳晒得隐隐作痛，头发差不多燃烧起来了。



昌龙背着包裹，顺着山路往回（插图：孙福）

昌龙东奔西走，在外面奔波六年，但现在，他又跑回来了。昌龙背着包裹，里面藏着他的血汗钱。他顶着亮晃晃的太阳，顺着山路

往回走。

野草伏在地上，看起来像是枯死了。其实没有。它们把根须扎进泥土，顽强生长。周围仍然

是山，有的山连树都不长，上面尽是乱七八糟的石头。有的山上，虽然零零散散地长着几棵树，但很不成材，比庄稼高不了多少。前面有堵岩石，像被烟火熏过，黑糊糊的。

昌龙家屋后的崖壁，就这样黑糊糊的。他家在贵州和云南的交界处。两省的界线，是中间的洛泽河。两边的山崖，像群抵架的牛，拼命冲撞。那条河水呢，俨然是从伤口里面挤出来的血，缓缓从山缝淌出来。

岩羊湾就在河滩上，地势狭窄。来凤是个有主张的人，她看到门口没有场坝，就在侧面打主意。她把旁边的树砍掉，让昌龙搬石头，在那里修石坎，然后自己背土来填。半个月的时间，硬生生让她弄出一块场坝来。

来凤很勤快，差不多每天早上，她都会提着扫把，弯腰打扫场坝。庄稼收成时，她就上面晒红豆和菜籽之类的东西。甚至，她还从山上刨来几株兰草，用破桶栽在场坝边，每天给它们淋水。兰草开花的时候，老远就能闻到香味。

昌龙不知道，那块场坝到底变成啥模样了。昌龙已经跑出去六年。现在，他就像条快要烤熟的鱼，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往回走。山路弯来扭去，好像很痛苦的样子。路边尽是乱石堆子，几棵树从石缝里钻出来。

昌龙他们在崖顶上种洋芋，在河边种苞谷红豆。河边水分足，土地也肥，其它地方的苞谷只有肩膀高时，岩羊湾的苞谷已经成熟了。河边不仅能种苞谷，还合适种蔬菜。每年春天，河边的庄稼地总是绿油油的。

岩羊湾收成好，但没钱用，村民穷得吃盐都成问题。他们想把粮食背到外边卖，但几座山崖挡在眼前。那根细长的路，像绳索似的绑在半山上。山崖左奔右突，差不多把路绷断了。这里的许多老人，他们生在山沟沟，也将死在山沟沟，生活一辈子，硬是没能迈出半步。

这条路实在不好走，有好几个地方，他们只能扒着岩石，侧着身体挤过去。要想背粮食去外边卖，豆腐都能盘成肉价钱。没有法子，大家只能拿粮食喂猪。猪崽不仅吃粮食，还吃他们的血汗。他们从早到晚拿着勺子喂猪，硬是把勺子摸得光溜水滑。

看着猪慢慢肥了，他们想赶到外边去卖。但没想到，猪的那身肥肉，也成了累赘。赶到街上时，人和猪都汗水淋漓。人没啥要紧，但猪趴在地上，横竖不肯起来。人家过来看看，再也不肯开价，都说像是瘟猪。卖不掉猪，他们只能赶回去。几年前，曾发生过一桩要命的事情。赶到半路，竟然把猪活活累死了。

昌龙挣不到钱，曾打过山草

药的主意。他像只猿猴，在悬崖上到乱蹿。到处挖天麻、和尚头、大鸡子、刺午甲，还有何首乌之类的东西。药材挖了半麻袋，但没能卖脱，全都扔在屋檐下边。药味不怎么好闻，昌龙索性把它搂成一团，甩手扔出去了。

要是没碰上灾害，岩羊湾总能有个好收成，但其它地方的人就是瞧不起。这让大家无比难受。尤其是昌龙他们，年轻气盛，浑身憋着火，总想张嘴骂人，更想提起拳头打架。刚开始，他们不清楚自己怎么有这种荒唐的想法，后来，就渐渐明白了。他们知道都怨这个鬼地方。他们试过修路，但终究没干成。

岩羊湾的村民像一群关在圈里的山羊，撞破脑壳也无法冲出去。这些年来，逃出去的只有昌龙。但现在，他又跑回来了。汗水把昌龙的头发浸湿，紧紧贴在额头上，让他多少有点不舒服。地势很陡，仿佛这条路一直伸向地狱。

路边有块石头，只有屁股那么高，生得很平整。昌龙记得，以前跟来凤背东西到街上卖，走到这个地方，他们总会歇脚。每次，昌龙刚刚把背箩放稳，来凤就拿着手帕过来，给他擦汗。来凤说，你看你，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来凤走过来的时候，身上有股什么味道，就是第一次闻到的

那种，怪模怪样的。昌龙迷恋那种味道，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但他还是记得很清楚。现在看到那块石头，他又想起来了。他觉得那股味道好像从什么地方飘过来了，像虫子似的在鼻孔里拱来拱去。

昌龙看看那块石头，抬脚把一块泥疙瘩踢进路边的草丛，继续朝前走。不时地，昌龙会吐两口唾沫。这地方风沙大，尘土不停地往脸上扑。他感到嘴里有沙子，牙齿总会磨出噌噌的响声。风一直没停止，也许它会这样一直吹下去。

远处飘来一团黑云，挡住阳光，让昌龙感到有些凉爽。昌龙抬起头，正猜测是不是要落雨，那团黑云就慢吞吞地飘走了。岩羊湾最怕的不是旱灾，而是洪灾。上方落雨，山水涌到河里，洪水就会涨起来，淹没河边的庄稼地。

昌龙的爹娘都是洪水卷走的。那次，雨水下得铺天盖地，河水浊黄，大得吓人。昌龙的爹用竹竿绑着铁钩，站在岸上捞柴。岩羊湾最缺的，不仅是钱，还缺煤炭。他们买到煤炭后，搬运成了大问题。

岩羊湾不通公路，他们只能自己背。无论哪家买煤炭，都要叫上全村的劳动力。几十个村民背着煤炭，爬山下崖，走成一串。男人出去背煤，女人就在家里帮忙做饭。每次搬煤炭，都要出动

整个岩羊湾的人，简直像办酒一样热闹。

看见涨水，昌龙他爹赶忙往河边跑，准备多捞点柴。昌龙他娘提着麻绳，跟在后面背柴。他娘刚走到河边，突然听到上面传来哗啦的响声。她抬起头，发现一条水缸粗的东西，黑糊糊地横在河面上。

河流就像遇到堤坝，下半截水势减缓，上半截却波涛汹涌。他娘吓得差点尿裤子，慌忙叫喊。但风很紧，洪水也大，他爹根本听不到。他娘跌跌撞撞地跑过去，准备把男人拽回来。没想到，刚跑过去，那条拦在河面的东西就翻滚几下，骤然沉到水底。洪水随即奔涌而来，把昌龙的爹娘卷走了。

昌龙顺着河边寻找两天，硬是没能找到爹娘的尸体。昌龙想起就难受，以前的时候，爹娘老担心他找不到媳妇。后来娶到来凤，他们又催昌龙赶紧生娃娃。他们说，到这年纪，啥都不想了，只想抱孙子。

昌龙被逼得受不了，就天天抱着来凤折腾。来凤是个好女人，无论昌龙怎么鼓捣，都不气恼。她轻轻往昌龙的怀里钻，温顺得像只母羊。昌龙搂着来凤，恨不能把她勒进自己的身体。他们折腾几个月，来凤的肚皮终于慢慢鼓起来了。昌龙的爹娘想抱孙子，但还没来得及，洪水就把他们卷

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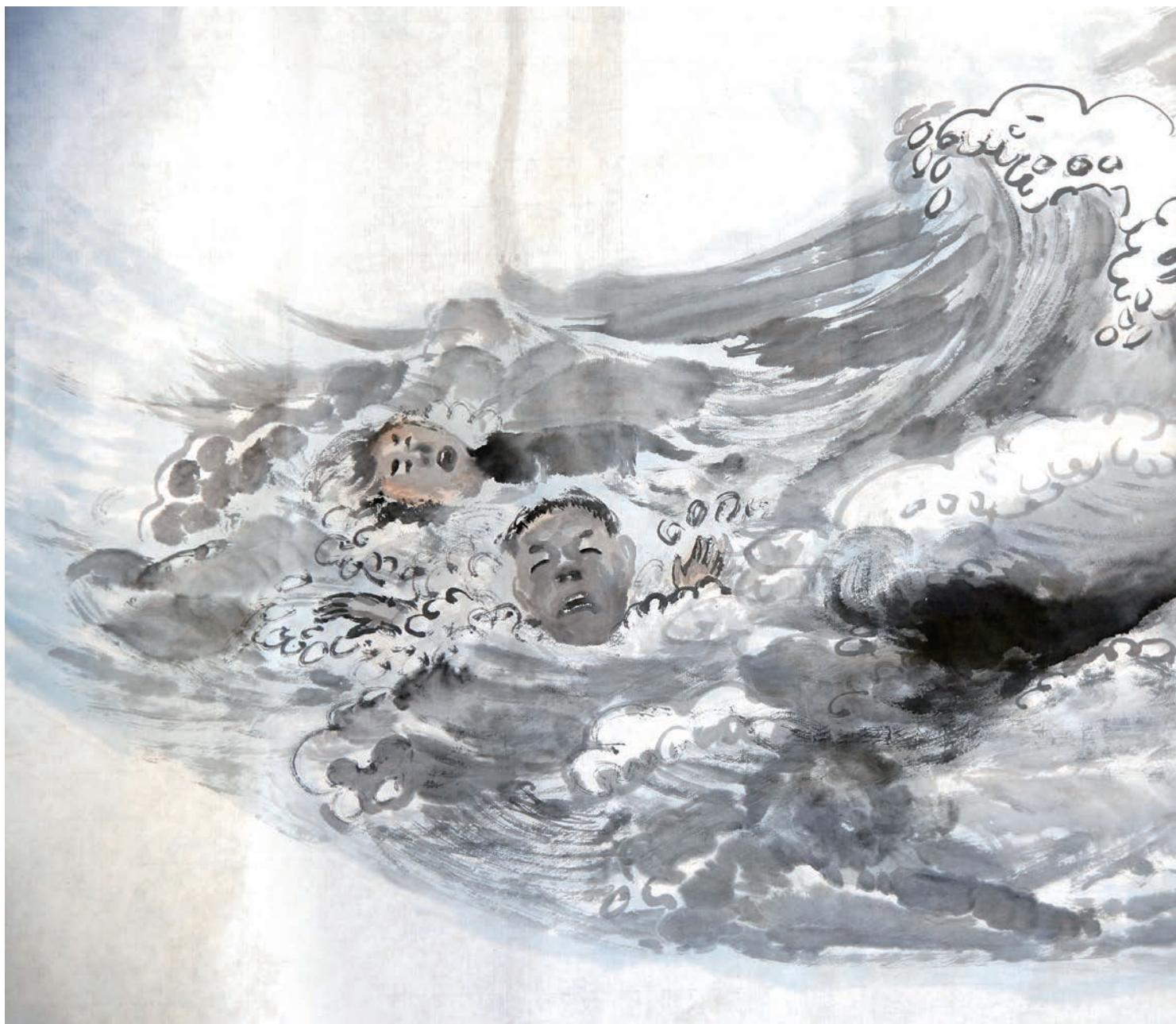
所有的事情，昌龙都记得清清楚楚。刚出事那段时间，他难受得命。他像疯掉似的，抱起石头朝河里乱砸。河面溅起水花，河水被他砸得咕嘟响。后来，昌龙在半坡上修了两个衣冠冢。

昌龙整整六年没回家了。他已经想过，这次回去就再也不出来了，以后，每年清明节都要给爹娘上坟烧香。这会儿，昌龙正背着行李，顺着山路往前走。阳光粗暴地烤着大地，昌龙感到脚板隐隐发烫，仿佛踩在烧过的石板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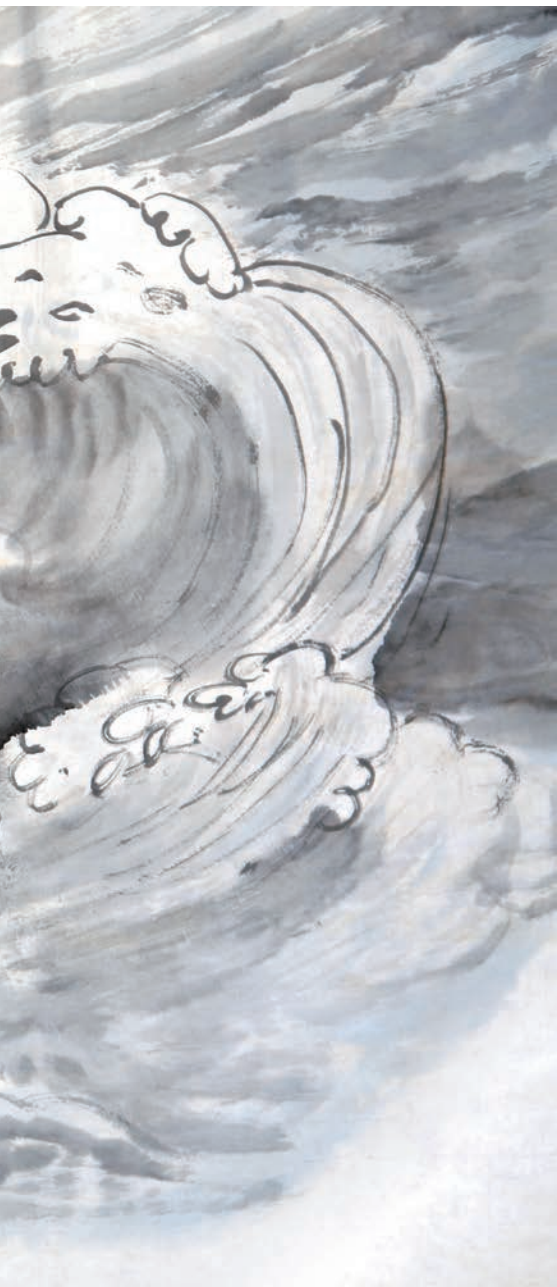
前面是那堵悬崖。崖壁上端长着几棵树，它们用根须拼命抓着岩石缝隙。任何风雨，都让它们颤颤巍巍。昌龙感到心里毛躁躁的，有点不舒服，他晓得这是什么的缘故。来凤就是死在这里的。

那天晚上，来凤肚子疼，让他赶紧喊接生婆。昌龙明白怎么回事，慌慌张张往外边跑。接生婆像在鸡屁股里面摸蛋一样，把手伸进来凤的肚子。她摸到的结果是，来凤难产，需要送到卫生院抢救。

昌龙找来几个邻居，用门板抬着来凤朝石门走。开始，大家走得很急。爬上山坡，他们的速度就慢下来了。昌龙看到大家慢慢吞吞的，简直急坏了，央求说，你们快点，再晚就来不及了。他



洪水随即奔涌而来，把昌龙的爹娘卷走了。



(插图：孙 福)

们喘气说，路太烂了，实在挪不动。昌龙急得嘴上冒泡，跺脚说，哎呀！

来凤躺在门板上，嘶声叫喊。昌龙说，来凤，你莫喊，你喊得我心里乱糟糟的。来凤用手抠着门板说，我有点忍不住。昌龙说，听到你喊，我就想从崖上跳下去。来凤说，我的肚子疼得要命，恐怕撑不下去了。昌龙焦急地说，你在说胡话哩，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来凤很听话，昌龙让她别喊，她就紧紧闭着嘴巴。来凤全身汗淋淋的，好像还有血。因为有什么粘稠的东西，顺着门板滴到昌龙的身上。来凤没再叫喊，但她的咽喉咙是堵着什么东西。昌龙听得难受，恨不得找把镰刀，把自己的耳朵割掉。

月亮苍白地挂在天上，比死人的脸还难看。门板像嘴巴似的咬住肩膀，他们走得很艰难。来凤躺在门板上，仿佛睡着了。远处的树林有雀子叫，呜呜的很难听。雀子叫的声音像娃娃哭，这让他们觉得很吉利。

昌龙他们汗流浹背地走着。他们要去一个叫石门的乡镇，那里有医院。路很难走，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大家几乎不去那个

地方。山岩像两堵墙壁，猛地夹过来，让人感到快要活不成了。走在这种地方，总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其实，另一座山还很远。

暗淡的火把在风里不停地摇晃，似乎马上就要熄掉。尽管昌龙急得火烧火燎，但地势陡峭，根本走不动。前面的路紧紧地贴着悬崖，非常危险。他们没胆量抬着门板从上面走过。从这个地方摔下去，顶多能找回几根骨头。

昌龙急得像屁股着火，干脆把媳妇搂到背上，吭哧吭哧地往前走。走过悬崖，他挥着手，催促大家快把门板扛过去。后面的人跟过去，刚把门板放在地上，来凤就抽搐起来了。他们吓了一跳。好大会儿，她都那么躺着，没想到现在全身乱抖，看起来说不出的痛苦。

大家慌了，围在旁边不晓得怎么办。来凤伸出手，似乎要抓住什么东西。她的声音渐趋微弱，最后两只脚蹬了几下，慢慢停止抽动。昌龙抓着那只僵在半空的手，哆嗦说，来凤，你莫吓我，我胆子小啊，听到没有，你快点起来呀。来凤躺在门板上纹丝不动，没有半点起来的意思。

昌龙双手抱着脑壳，喉咙里

像堵塞着什么东西，呜呜地响。大家劝他不要伤心了，先把尸体抬回去。昌龙哭丧着脸说，一定要送到石门，也许还有救。他们摇头说，没有用了，已经咽气了。昌龙就蹲在地上哭，声音不高，但听起来很悲惨。

路边的杂树和野草正在努力生长，凉飕飕的空气里飘荡着复杂的味道。突然，昌龙抬起手，不停地抽自己的耳光。他们急忙拽住说，你不要这样，就算打死自己，她也不会活过来了。昌龙痛苦地说，都怨我，是我把她害死了。他们安慰说，要怨就怨这条路，要是及时送到医院，你媳妇就不会死了。

昌龙咬牙切齿地看着那条路，恨不得扑下去啃几口。

来凤死掉以后，连续好多天，昌龙都蹲在那块场坝上，两只眼睛红彤彤的。他用手抠地上的泥块，差不多把指甲抠掉了。昌龙总想起来凤的模样。来凤很温顺，

就像一只猫，老往他的怀里拱。

昌龙仰着脖子，蹲在那里胡看。岩羊湾挤在一条峡谷里，地势不怎么宽敞。站在崖顶上，看到山沟是长长的几道。但从崖脚往上看，简直就恐怖了。总觉得被两边的山崖挤压着，几乎透不过气来了。

昌龙知道，归根结底都怨这条路，要是道路通畅，事情就不会弄成这样了。这些陡峭的山崖，让岩羊湾与世隔绝。这里的村民，像得麻疯病似的，以前被世界所抛弃，以后还将永远受到抛弃。看着周围的山崖，昌龙憋屈得跟什么似的。

昌龙把手插进头发，用力撕扯，恨不得连脑袋一起揪下来。此前，昌龙过得昏昏噩噩，当他揪下几缕头发后，忽然冒出一个念头。昌龙准备修路，他觉得自己活在世上，就是为了修通这条路。拿定主意，昌龙就跑出了岩羊湾。他在外边奔波六年。现在，

到底还是回来了。

翻过前面的山梁，就能看到岩羊湾了。昌龙有些激动，他紧走几步，顺着山坡往上爬。多少年来，祖祖辈辈始终困在前面的深山杳杳，如同闷在水缸里，最后全被活活憋死。昌龙早就寒透心了，他打算硬从岩石上破出一条路来。

昌龙准备先修路基，再慢慢把路面扩宽。他已经豁出去了，决定把以后的光阴，全都用来修路。活在这种地方，实在太煎熬了。昌龙希望这条路早点接通外面的世界，让大家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昌龙绷着两条粗黑的眉毛，使劲往上爬。登上山梁后，昌龙满脸惊愕，像被什么东西砸中脑袋，他身体摇晃几下，慢慢瘫在地上了。昌龙用手捂着脸，全身颤抖。他看到远处的山崖上，赫然挂着一条公路……

搬家(散文)

□ 申开玲

我们家住在山上，山上也只有我们家。

我们家住的这座山叫申家山，山不大，但树不少。树有松树、杉树、柳树、梨树、桃树、杏子树、核桃树和李子树等，还有许多是我叫不出名的杂木树。我们家的房子原先是爷爷修的一间茅草房，后来父亲把房顶上的茅草扒了换成小青瓦，茅草房就变成了小瓦房。前年春天，政府要搞新农村改造，村里居住在大路边的人家都由上面拨钱把土墙房换成砖墙房，砖墙房再盖上彩瓦，居住在小路边的人家就由政府派人用水泥沙浆往土墙房上糊一层皮，再用涂料画上几根柱子，画上砖缝，盖上彩瓦，样子也跟砖房差不多。但我们家不在大路边，也不在小路边，平时很少有人过往，也很少有人能见，村长说为了不让一颗老鼠石坏了一锅汤，影响全村的整体形

象，就叫我们家自己找石灰在房檐上刷一道白边，父亲按照村长的安排如法炮制后，我们家的小瓦房果然旧貌换了新颜，看上去也就比先前气派了许多。

小瓦房常年掩映在鸟语花香浓荫蔽日的绿树丛中，加之门口的土地不是种青枝绿叶的苞谷洋芋，就是种繁花怒放的向日葵，看上去多少有些世外桃源的味道。若是碰上晴朗的天气，一大早就会有许多穿着各色迷彩服，身上坠满大包小包的摄客埋伏在我们家周围的树丛中，其状俨然一支训练有素的特种部队将我们家团团围住，好像他们围住的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而是恐怖分子拉登的老巢。他们手里都握着炮筒子大小的镜头，太阳一冒出来，他们就举起镜头对着我们家的房子又拍又照，咔嚓之声此起彼伏。偶尔他们也会来家里坐一坐，聊

一聊，喝上一杯茶水。其间不仅一支接一支地给父亲和爷爷敬烟，还把带来的饼干、面包、罐头、巧克力和饮料分给我们吃。然后又趁机给我们家的牛照相，给我们家的鸡照相，给我们家的小瓦房照相，给我们家的簸箕筛子镰刀斧头和犁头耕索照相，但照得最多的还是爷爷。

爷爷今年九十岁了，头发是白的、眉毛是白的、胡子是白的、牙齿是缺的，只有脸和衣服是黑的，浑身染满了岁月的风尘。摄客们大概是从爷爷身上找到了他们想要表现的艺术感觉，纷纷把镜头瞄准爷爷不停地掀动快门，眩目的灯光在爷爷脸上闪闪烁烁，刺得爷爷不得不把眼睛眯上。那情景，好像爷爷不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而是哪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似的。一开始，爷爷还有些不太适应，不是埋着头就是扭开脸，尽量避开那些眩目

的灯光；要不就是紧绷着面孔，目光专注而呆滞地盯着镜头。爷爷是想让自己在对方的镜头中留下更好的形象，可拍出的照片一点也不自然，看上去都不像是爷爷了。后来拍得多了，爷爷也就习惯了，也就不再把照相相当回事了，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该怒则怒，该乐则乐。结果爷爷定格在画面中的样子反而更生动、更自然、也更像爷爷本人了。摄客们把爷爷的照片带回去之后，有的登在书上，有的发在报上，有的收入了个人的摄影作品集子、有的镶进大街上影展的橱窗。跟着爷爷一起沾光的还有我们家的牛、我们家的鸡、我们家的小瓦房。只是爷爷所有的照片上都没有爷爷的名字，若是清早拍的，他们就把爷爷叫成朝思，若是傍晚拍的，他们就把爷爷叫成暮想，若是中午拍的呢？他们就把爷爷叫成守望、叫成岁月、叫成日子……总之，除了村里的熟人和我们家的亲友，谁也不知道照片上佝腰驼背满脸沧桑的老人就是我的爷爷；谁也不知道照片上老人身后破瓦残砖歪檐倒壁的小瓦房是我们家的房子。这样的房子拍出的照片看起来是很养眼，但住在里面过日子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天晴还好说，天一下雨就麻烦了，屋顶到处都漏雨，外面大下，里面小下。下得我们不得不



把家里的坛坛罐罐都搬出来接漏下的雨水，弄得满屋子都是叮

咚咚的锅碗瓢盆交响曲。若是雨脚短一点，接一盆倒掉一盆，



接一桶倒掉一桶，眼放尖一点，腿跑勤一点问题也好解决。倘若

是碰上雨脚长或是连阴雨，到了晚上要睡觉了雨还下个不停。

父亲和母亲就轮流睡觉，轮流倒水，可时间一长，父亲和母亲都坚持不住了，再到晚上，全家人的脸上都愁成了一团乱麻。幸好我们家的地平是黄泥巴地平，不像其他人家的地平是水泥地平。黄泥地平土松，父亲便急中生智，用锄头在堂屋里开了条“丫”字形的小沟，又在门槛下面挖出一个小孔，漏到屋里的雨水便沿着“丫”字形的小沟，顾自穿过小孔流到门外，哗哗啦啦淌下山去了。不过，多数漏下的雨水虽然淌到下山去了，但少量的积水还是留在了家里，多下上几天雨整个屋子都变成了稀泥塘，人一走在上面就呱唧呱唧地响。直到雨过天晴后，父亲把屋里的稀泥刮干净，再铺上一层干土用拍板拍紧，屋子才又恢复原来的模样。由于屋里地气潮湿，全家人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风湿，奶奶和母亲尤为严重，母亲气候一变腰就痛得直不起身来，奶奶不仅腰痛腿痛，身上的每一道骨节都变形了。所以，很久以来，我们全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山下的小镇上修一栋新房搬下山去，且一直都在为盖新房作着准备。

我们家有一块土地就在小镇的马路边，又平整又方正，用来做建新房的地基是很理想的。可是在自家的土地上建房子不像在自家的土地上种庄稼，在自家的土地上种庄稼想种什么就

种什么，种什么别人都不会干涉你。但要是用来建房子，干涉的人就多了。得办了土地证和建房许可证才能修建，为此，父亲一次又一次去找组长、村长和镇上的干部求情，这样跑了几年，土地证和建房许可证倒是跑下来了，但原先准备用来建房的钱也跑光了，既没有钱买建房的材料，也没有钱请泥水匠做工。父亲只好带着全家自己动手把地基挖出来，然后又自己动手从山上一块块搬来石头砌房子，再自己动手贴上墙砖、刮上瓷粉、布上电线、就连门窗也是父亲自己做的。这样折腾了五六年终于把新房建好了。父亲说这下好了，我们再也不用住在破破烂烂阴暗潮湿的老屋里，天天用坛坛罐罐接漏下来的雨水了，爷爷奶奶也可以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了。不料，新房建完还没有搬家，奶奶就过世了。

奶奶过世那天是个阴雨天，阴雨一下就没完没了，好像老天爷也跟着我们伤心，跟着我们哭泣。因为老屋又窄又漏，在里面办奶奶的后事极为不便，来家里帮忙的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父亲建议把奶奶的后事搬到新房子去办。父亲说奶奶一辈子没住过一天好房子，现在过世了就让她搬过去住上两天，别让她到了那边还为房子的事牵牵挂挂。不想，爷爷却不同意。

爷爷说老屋虽然破漏，但奶奶好歹已在老屋住了一辈子，这辈子她最熟悉的是老屋，最放心不下的也是老屋，她在老屋已经住习惯了，既然新房盖好了她都等不得搬家就要走，说明奶奶还是想留在老屋里，那就让她最后在老屋里再呆两天起身算了，省得搬了新房她路径不熟也摸不着锅灶。爷爷这么一说，父亲也就依了爷爷，将奶奶的后事安顿在老屋里办了。父亲见屋里到处都在漏雨，想请人去镇上租借一床大车篷布来苫住房顶，爷爷还是不同意。爷爷说何必花那个冤枉钱呢？房子又不是今天才漏，都漏几十年了。爷爷说奶奶就习惯住漏雨的房子，不漏雨的房子她还住不惯，要是晚上下雨房子不漏她会整夜都睡不着。爷爷说就让它漏吧，漏了奶奶才睡得踏实。

按老家的规矩，老人只要是在家里过世都要在堂屋里装殓，在堂屋里停放，不能拿到外面去装殓，也不能将棺木抬到外面去停放。奶奶是在家里过世的自然也不例外。奶奶的棺木是多年前就做好的，做好之后就砌在爷爷奶奶住的耳房里用塑料布苫着。奶奶落气的时候，父亲把奶奶抱在桌上坐好，让母亲和爷爷扶着，父亲跪在地上给奶奶烧了落气钱纸，就叫我和姐跟他到耳房里去搬奶奶的棺木盖子。我和姐姐抬小头，父亲一个人抬大头，

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把棺盖抬到堂屋放好，父亲才又把奶奶从桌上抱下来躺到棺盖上。

一扇棺木的盖子我们姐妹俩能和父亲搬出来，但要搬一合棺木来给奶奶入殓，无论如何我们都是搬不动的。幸好在农村和在城里不一样，在城里即便是隔壁邻居死了人，只要平时没有什么往来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在农村则不同，农村只要晓得谁家死了人，即便相距三山五里，即便平时有什么恩怨，都要放下手头的农活前来帮忙。所以奶奶去世的消息一传出去，亲戚家门和团邻四舍都赶来帮着料理奶奶的后事，抬棺木的事不仅不用我和姐姐操心，甚至也不用不着父亲操心。还没等父亲开口，执事的总管就安排帮忙人把奶奶的棺木端到了堂屋里。只是我们家老房子的堂屋空间太小，堂上摆了奶奶的棺木后周围连个转身都打不开。总管又安排人把屋里的家具搬到外面去。好在我们家的家具不多，也就一张放锅碗的条桌，一张吃饭的方桌，一副墩着石磨子的磨架，再就是一口水缸，几个筛筛簸簸，帮忙人三下五除二就清理干净了。

接下来的事便是给奶奶入殓，总管见屋里长麻吊线地漏着雨水，又吩咐帮忙人找来一块塑料薄膜，由四个人牵了四个角站在棺木两头高高举着，严严实实

地把棺木罩住，这才叫人殓的师傅给奶奶入殓。入殓的师傅先在棺底摊上三升六角老墙土，然后在老墙土上铺了一层草纸。如果是家境好的人家，还得在草纸上放一层丝棉做垫背，再在头部放一个小枕头，才把亡者抬进棺木。可我们家的家境不好，买不起丝棉给奶奶做垫背，铺完草纸之后，帮忙人就把先前直挺挺躺在棺盖上的奶奶直挺挺地抬起来，又直挺挺地放到棺木里。然后将折叠成三角形的绵纸，从奶奶的脚头一牙一牙往身上扣，一直扣到奶奶的颈项上，又在耳边填满绵纸固定住头部，只让奶奶惨白的面孔露在外面，人就算是装好了。入殓的师傅叫我们全家人最后看一眼奶奶的模样，才让人把棺盖合上，从此，我们便与奶奶阴阳两隔，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

奶奶的后事办得很热闹，热闹整整闹了三天。父亲不仅给奶奶置办了纸人纸马，纸轿纸车，还请了道士先生来给奶奶敲锣打鼓诵经超度。道士先生给奶奶诵经超度的时候，爷爷叫我和姐姐不停地给奶奶焚香化纸，爷爷说我们在这边烧的纸就是奶奶在那边用的钱，我们烧的纸越多，奶奶到了那边身上的钱就越多。奶奶身上有了钱，到那边就不用再住漏雨的房子了。

奶奶过世不久，我们就开始

搬新家了。明倒说是搬家，其实只是搬人，再说，家里也没有什么可搬的东西，除了农具就是些破坛烂罐，残桌断椅。搬到新家一来是没有地方堆放，二来呢？就算找到有堆放的地方用途也不大。比如石磨吧，下了山人家都用机子碾米打面了，谁还用石磨子费时费力的碾，费时费力去推呢？而且家里的用具也不能全部搬走，房子更不能搬走。因为我们家里的土地大部份还在山上，山上的土地还种着庄稼，庄稼在山上人不在山上照管怎么行呢？何况家里还有牛，还有猪，不可能连它们搬到镇上的新房去住，再说镇上的新房也没有它们住的地方，加之老房子离新房子也不算远。所以，按照父亲的计划，搬家主要是把我和姐姐还有爷爷搬下山去，父亲和母亲虽然也要搬，但他们得新家老家两头住，两头照管。

搬家的日子是父亲从老黄历上选的一个除日，父亲说除日是黄道日子，黄道日子一般天气都很好，那天的天气的确不错。天才麻乎乎亮，栖在树上的雀子就叽叽喳喳地围着我们家的房子叫个不停。大概雀子们也知道我们那天要搬家，怕我们睡过了头，都跑来催促我们抓紧起床。其实我们是用不着那么早就起床的，因为搬家入宅的时辰是定在下午的未时，所以太阳都出山

照到我们家的窗口了，我们才从床上爬起来慢慢烧火做饭。吃完饭喂了猪，又等爷爷喝好茶才开始搬家。

搬家也是有讲究的。父亲说搬家火和水最重要，火主运，水主财。搬到新家有了红火的运气，有了广进的财源，就不愁过不上好日子。父亲是一家之主，理当走在前面，当然是不能空着两手进屋的。所以父亲在前面提着一炉烧得很旺的火，身后跟着挑了满满一担水的母亲，母亲后边是端着满满一甑饭的姐姐，我的任务是在最后扶着爷爷下山。爷爷虽然年纪大，但身体很硬朗，走路是不用扶的。只是这天父亲给他买了双新皮鞋，让他穿着去新的家，父亲说搬了新家得有个新气象，不能再穿着破鞋子去了。可爷爷穿上新皮鞋才走两步就喊脚痛，父亲又帮爷爷把皮鞋脱下来，用手沿着鞋口使劲蹭了一阵再替爷爷穿上，可爷爷穿上之后还是喊痛。父亲说穿新鞋子都磨脚，穿两天就好了，并特意让我在后面扶着爷爷下山。

爷爷平时穿的是平跟布鞋，布鞋是奶奶做的，几十年了爷爷都穿奶奶做的布鞋。如果是穿破了，奶奶就给他补一补，要是不能再补了，奶奶就会再给他做一双。自从奶奶病了之后，就没有给爷爷做鞋子了。母亲说要给爷爷做一双新鞋，爷爷也不让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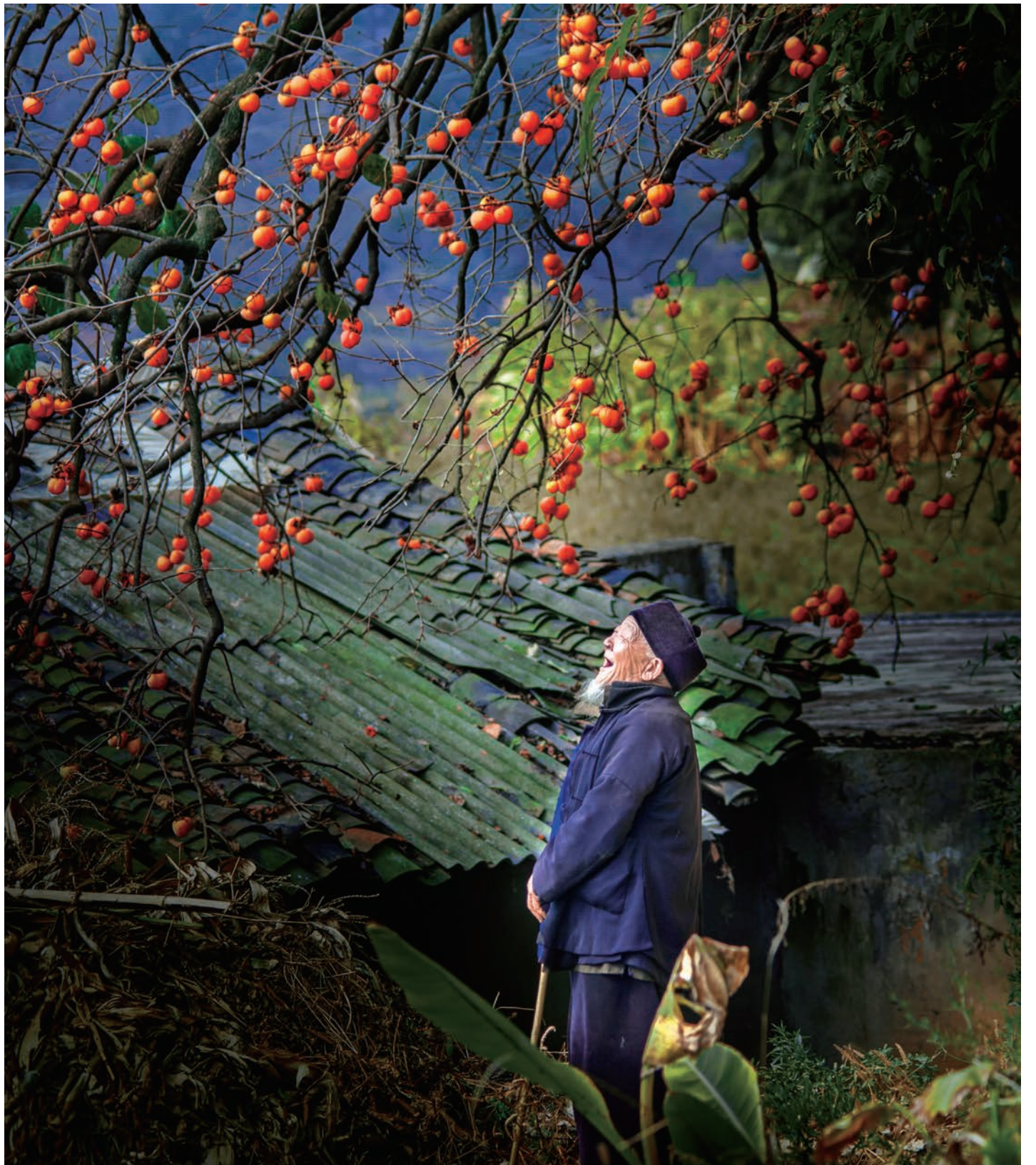
爷爷说天天坐在屋头，又不走亲串戚穿什么新鞋呢？将就穿了。后来爷爷的鞋子破了，两个大脚趾都露在外面。母亲每回要给爷爷补鞋，爷爷也不让补，爷爷总是说这样穿才凉快。母亲知道爷爷是不想穿别人做的鞋，也就不再提鞋子的事了。后来爷爷的鞋子不仅破得露出了双脚的十个脚趾，就连后跟也破开了，爷爷只好把鞋子当拖鞋趿拉着整天在屋里踢踢踏踏地走。父亲见爷爷的鞋子实在是破得不能穿了，才借搬家之名硬买了双新皮鞋要爷爷穿，爷爷才不得不把奶奶做的破布鞋换下来。我们以为他会把破布鞋扔了，可爷爷却舍不得扔，临到出门，他又把破布鞋和烟锅一起别在后腰带上。我说爷爷，这鞋都破成这样了，你还别在腰杆上干啥呢？丢了吧。爷爷说这鞋我都穿了几十年了，以后再也没这鞋了，丢了可惜，带过去换换脚吧。说罢抓过靠在墙边的拐棍，杵着摇摇晃晃地出了门。也许是爷爷穿新皮鞋不习惯，以往爷爷走路虽有点摇晃，但摇晃得没有这么厉害，而且头上的白发也比往天多了许多。

从老家去新家走的全是下坡路，由于下了几天阴雨才晴起来，路上还稀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又因为穿了新皮鞋，爷爷走起来既别扭也吃力，每一脚他都要踩实了才敢挪步。刚走

到半山腰上我们家的那棵老核桃树下，爷爷就停住脚不走了。我说爷爷你再坚持一下吧，下了山就是水泥马路，到山脚就好走了。爷爷两眼呆呆地盯着树上说，歇哈儿吧，歇哈儿再走。我说爷爷你看什么呢？爷爷说你看看树上的核桃。爷爷说今年这核桃怎么不结了呢！我说可能是春天那场雪把核桃伤了。我说不仅我们家的不结，别人家的也不结。爷爷哑哑说，怪了怪了，我们这棵核桃是很伤不掉的，以往别家的不结我们家的都结嘛。爷爷说以往这棵核桃年年都要打好几箩，一年到头的煤油盐巴钱，人亲来往钱和穿招零用钱就全靠这棵核桃撑倒。爷爷又说，早些年我在树上打核桃，你奶奶就在树下捡，后来我打不起了，你爹在树上打，你奶奶还在树下捡。这下你奶奶一过世，核桃也不结了！

我见爷爷提起奶奶的时候说话有些哽咽，不想再提核桃的事让爷爷心里难过，就岔开话题劝他坐下来休息一下。爷爷说，要得，那就裹杆烟再走吧。说着慢慢弯下腰在裸露的树根上坐下来。爷爷坐在树根上喘了一会儿气，从身后的腰带上抽下烟锅在鞋底上磕磕，又含着烟锅嘴噗嗤噗嗤吹了几下，觉出烟锅通气了，才又从怀里掏出烟袋摊放在膝头上开始卷烟。爷爷的烟袋是一块猪尿泡皮，里面裹着一截一

截掐好的烟叶和一小匹嫩白菜叶。嫩白菜叶有水份，放在烟袋里可以回潮烟叶，烟叶有潮气就不会碎断。爷爷从烟袋里找出一截叶皮厚实的烟叶碾开，拈出一撮散碎的烟末放在上面，用双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端，两个拇指按住另一端一点一点往上卷，很快，一支喇叭筒形的烟卷就做成了。接着，爷爷又把喇叭筒参差不齐的尾巴掐下来放进烟盒，才将烟卷旋转着栽进了烟锅。爷爷一手提着烟锅，一手又伸到怀里去摸，可他摸了半天什么也没摸到。我说爷爷你掏啥呢？爷爷失望地叹着气说，我没带洋火。爷爷平常都用的是火机，可他一直不把火机叫火机，总是把火机叫成洋火。我说那就到了新房子再抽吧，反正也不远了。爷爷晃晃手里的烟锅说，烟都裹好了，你回去帮我拿个洋火来抽了再走吧。那口气不像是在指使，倒像是在乞求。我想爷爷平时都喜欢把火机揣在怀里，我们随时要找火机点火，随时都可以找爷爷拿到，今天他怎么会没带火机呢？也许爷爷是想把我支开，好让他一个人在树下清清静静坐一会儿。也许爷爷一个人清清静静坐在树下就会看到以前他在树上打核桃的情景，就会看到奶奶在树下捡核桃的身影。尽管那样的身影会让爷爷倍感伤痛，但伤痛之中也有久违的温暖。温暖是冬天



里的篝火，黑暗中的阳光，人活着不能没有温暖，尤其是像爷爷这种多愁善感而又喜欢怀旧的老人。于是，我赶紧答应爷爷去给他拿洋火，我说爷爷那你等哈儿我马上就回来。事实上我并没有马上回来，而是一路上磨磨蹭蹭走了大半个时辰才回来。

我回来的时候，爷爷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老地方，似乎是长了根，似乎是入了定。正午的阳光从茂密的树叶上透下来，在爷爷黝黑的脸上泛出斑驳的色彩。我看到爷爷的眼睛有些发红，眼眶有些湿润，上嘴唇上还粘着没有抹干净的鼻涕，像是刚流过泪的样子，我说爷爷你想什么呢？听到声音，爷爷才回过神来，说没想啊。边说边胡乱抹了把脸上的泪痕问，洋火拿来了？我一扬手里的火机说拿来了。说着凑上去帮爷爷点烟，爷爷歪过头把烟卷对着火苗叭哒叭哒地啣个不停。可叶子烟不像纸卷烟，一点就着。烧了一会，我的手都被火机烫疼了，叶子烟卷才燃着一点火星子，我只好把手收回来。尽管爷爷不停地砸着烟嘴，一会儿烟卷还是熄灭了。爷爷只好拿过火机自己点，等把烟点着，火机也烧坏了。看着被烧坏的火机，爷爷心疼地嘟囔说，什么东西都越做越假了，以前两分钱的洋火可以点几十杆烟，现在一块钱的火机一杆烟就点完了，埋怨打火

机没洋火好使。又说皮鞋也焐脚不透气，穿着热烘烘的难受，还不把滑，一点都没有布鞋好穿。

说到鞋子，我才发现爷爷又把脚上爸爸买的新皮鞋换下来，穿上奶奶做的破布鞋了。我说爷爷你怎么把皮鞋脱了呢？爷爷说皮鞋磨脚得很还是布鞋软和。我说布鞋是软和，可都破成圈圈了不好看嘛。爷爷一抬脚嘿嘿地笑着说，破了好啊，破了才不焐脚才凉快呢。看着爷爷的一双脚趾从布鞋的破洞里拱出来，我突然想到一群刮了光头的小孩在窗口探头探脑往外张望的情景，忍不住噗嗤一下笑了。我说爷爷你要是只图凉快还不如打光脚板走呢。爷爷啞了口烟说，我也想打光脚板走路，可你奶奶不让我打。我说奶奶都过世了你打了她也不知道呀。爷爷叹着气道。她知道，她到了那边也是看着我们的。说着又回头看了看我们家在半山腰上的老房子，似乎奶奶就站在老房子边看着我们，而他这一回头就能看到奶奶的身影。

我怕爷爷又为奶奶的事伤了心，就劝爷爷说，天不早了，我们还是走吧。爷爷才极不情愿地回过头来很快地啞了几口烟，然后努着嘴把剩下的烟锅巴吹飞，再把吹飞的烟锅巴拣起来朝鞋底上杵杵，捻灭了火又放回烟袋，揣进怀里，将烟锅别在后腰带上，这才极不情愿地欠起身说，那就

走吧。也许是爷爷穿惯了奶奶做的鞋子，走起路来脚下更有数更把滑吧。再下山时，爷爷的双腿就迈得不像先前那么别扭那么吃力了，而是每一步都踩得很踏实，走得很轻松，甚至在快下完山时，他还把手里杵着的拐杖收起来夹在腋下，一个小跑就冲到了山根脚的苞谷地边，急得我在后面边跑边喊他走慢点。

我和爷爷赶到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摆桌子吃饭，客人虽不像村里别的人家搬新家那么多，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也来了不少，以至把新家的两间房屋都坐得满满的，屋里没有地方安放吃饭的桌子，只好在门口的马路边安了四张桌子请客人吃饭。客人都是我们家的亲亲戚戚和村里的右邻右舍，有几个见爷爷来了，都嚷着要让爷爷去坐上八位，爷爷却不肯。爷爷摆着手说，你们先吃吧，我先喘口气再吃，说着就进屋坐在回风炉边的沙发上。可爷爷坐在沙发上屁股动来动去的怎么也坐不踏实，后来他干脆从沙发上梭下来蹲在地上。我叫爷爷坐在沙发上，爷爷说沙发不好坐，爷爷说沙发一弹一弹的不好坐，我只好找了条小板凳递给爷爷，让爷爷靠着墙脚坐下来，爷爷这才叉开腿常常地舒了口气。

摆第二轮席的时候，又有亲友喊爷爷去吃饭，爷爷还是摆

着手说你们先吃，我再喘口气。父亲知道爷爷是不习惯和外人一起吃饭，爷爷这辈子很少和外人一起吃饭，平时都只跟家人一起吃饭。父亲就找来一只大碗，从厨房给爷爷舀了一碗饭，又拈了一些爷爷喜欢吃的菜放在碗里端给爷爷，让爷爷一个人坐在火炉边上慢慢吃。

吃完晚饭，客人们都陆续走了，一家人才开始动手收拾残局。母亲拖地抹桌，我和姐姐洗刷锅碗，父亲则忙着清理从邻居家借来待客的用具。爷爷年纪大了，平时除了在地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家务事他是从来不管的，回到家里除了吃饭喝水，就是埋头抽烟。以往奶奶在世的时候，爷爷抽着烟偶尔还说两句话，自从奶奶过世后，爷爷再抽烟就不说话了，两眼都木木地盯着一个地方，目光沉迷而空洞。

这会儿，爷爷又开始抽烟了。爷爷不抽烟的时候很少吐口水，可抽上烟他就不停地吐。爷爷说叶子烟是化痰的药物，即使是再浓的口痰也能化成清水。爷爷说的没错，爷爷就从不会吐痰只吐口水。而且爷爷吐口水也吐得很特别，他不像多数人那噙着嘴往外吐，而是齜着嘴用舌头从牙缝里把口水挤出来，每挤一次都发出“嗞”的一声，口水也就吐得很远。以前在老房子住的时候，家里的堂屋都是夯

实的泥土，口水嗞到地上很快就被泥土吸收了，至多也就留下一个湿迹。现在搬了新家，新家的堂屋不仅用混泥土打了垫层，垫层上还贴了地板砖，爷爷嗞到地上的口水无法被地板砖吸收，爷爷每嗞一口，地板上就留下一线清水。爷爷只好用脚去搓，结果是不搓还罢，越搓地板越脏。母亲使用拖把替爷爷把地板上的口水拖干净。可母亲才转过声，爷爷又忍不住把口水嗞到地板上了，母亲只好又回去替爷爷拖地上的口水。如此几番折腾，爷爷一怒之下竟然连烟也不抽了，收了烟袋说是要睡了，又问父亲茅坑在哪里。爷爷说的茅坑就是厕所，父亲便带爷爷去里屋的厕所。可父亲刚回来一会儿，爷爷又跟回来了。爷爷说，里面坑都没有哪里会是茅坑！以往老家的茅坑是一个大粪坑上面放几根木头，人就蹲在木头上往粪坑里解手。现在新家厕所是安了抽水马桶的蹲便器，也难怪爷爷说找不到茅坑。父亲便又带爷爷去厕所，详细告诉他如何使用蹲便器又如何使用抽水马桶。过了好一会儿，爷爷才从里面出来，父亲问爷爷家里的厕所好不好用？爷爷没好气地说，好用个鬼，蹲在里面连手都解不出来。说着气呼呼去了外面。

因为搬家忙了一天，大家都累了。临睡之前，父亲对姐姐和

我说，明早你们可以多睡一会儿，事实上就算父亲不打招呼，我们也是想好好睡个懒觉的。谁知，半夜里爷爷就起了床，一个人开着灯坐在火边抽闷烟。爷爷抽烟的声响倒是不大，但屋里开了灯通明透亮的一家人都睡不踏实，天还不太亮就从床上起来了。我问爷爷怎么不多睡一会儿，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爷爷说他在这里睡不踏实。爷爷见我一脸不解，又说，他刚刚睡着就梦见奶奶一个人坐在老屋的火塘边打抖。爷爷叹了口气，又说，老屋的火塘里连个火种都没有，奶奶能不打抖吗。爷爷说着起身胡乱洗了把脸就出了门。父亲问他要去哪里？爷爷说回家！父亲说这不是家吗？爷爷说不是，爷爷说我的家在山上！父亲还想说什么，却被母亲止住了。母亲说，既然爷爷住不惯，那就让他走吧。爷爷走后，母亲又说，爷爷都这么大年纪了，他一个人住在山上怎么行，要回去就一起回去算了。就这样，我们一家人从山上的老家搬到镇上的新家住了一夜之后，又跟着爷爷搬回了山上的老家，镇上的新家只改做了父亲的木工房。

现在，我们家仍住在山上，山上也只有我们家。

（本文图片摄影 孔宁康）

石门诗章

石门坎的黄昏

姚 辉

我肯定在某本卷角的旧书上看见过这缕夕光
它辽阔 宁静 照彻苗女银饰上的光景

山峦让遐想透迤 而更多的鸟声属于未来
此刻 石门坎的黄昏已再次变得幽深……

谁将苗女春草般的口音刻写在绢帛与纸页之上
还有衣襟上的纹饰 传说前的歌吟

梦想也是一种文字 比岩穴中的寂静更为古老
还有嵌于骨肉中的企盼 以及雨意 风声

从人群中走过的人总能记住四季艰难的履迹
从人群中远去的人总在修正自己坚硬的身影

我反复设想你 100 多年前所面对的那种天色
它斑斓的美 该怎样沉入旷远的灵魂

也许有人仍将站在我难以抵达的高处
他的手势舒缓 仿佛眼前这片漫长的黄昏

石门坎

南 鸥

像一块石头落在时间外面
你依山而立，山重水复的性格直逼苍穹
柏格理是一位高鼻梁的传教士
他在断崖之上刻下一串奇异的符号
我们苗族的兄弟，从此打开了
文字的扉页

海外天国，云的那一边
圣地，中国石门坎被刻成世代的传说
那刀耕火种的声音，日渐消失
蛮彝地带，与那地球的另一边
在一块石头上激烈碰撞
火星四溅

恍若隔世，那些英文字符
成天在大山里像包谷林一样倔强地生长
那些山民，不知道汉字的脸
他们的舌尖却弹出柏格理的方言
而唱诗班的油灯，从此照亮
那些漆黑的大山

石门坎（外一首）

哑木

每次，我从这个县城中心去到石门乡心里，都先有三分不愿意。不仅是140公里的山路崎岖，更因为我实在打不开，那道紧闭的石门。也就无法窥见，百年前那个不远万里，漂洋过海而来的人是如何，在这块荒蛮之地让一个民族，相信了上帝。哦，上帝，他还创制了仿若花纹的文字，让那些，蒙昧了许久的心灵，窥见了天光。为了让更多的人，在神的庇护下，心里活得亮堂。他四处创办教会，学校。可石门，百年以来为什么，又紧闭至今？每次，我站在这个外国佬的墓前，心里有一道石门，缓缓打开里面，走出来的人，仿佛上帝。也像那个外国佬

天 光

最后一抹天光，透过乌云穿过乌蒙山，最后照着古老而厚重的石门。

天光犹如钥匙，所照之处石门为之洞开。门内有人就着天光，如得神示创下花朵般的文字，文字所到之处，一个民族内心的

石门，也为之洞开。

洞开的石门，留不住神要唤回去的人天光泄露之时，天空也随之撕裂漂洋过海而来的人，离开自我回到老故乡，百年不归。

今日今时，我远道而来天光明亮，烛照我身我眯眼看去，乌蒙山一片茫茫仿佛百年以来，一直未曾变样

石房子

郁人

石房子的呼吸是一颗颗来自大山深处的石头心吞吐日月星辰，永恒不改

谁的期许经历千年万年，禅定如此安息的终将安息醒来的终将醒来只是一场际遇已让你我分不开



曹臻一的诗

□曹臻一 诗
孔宁康 摄

大雨

那天大雨，你走后
我站在芳园南街上
像落难的孙悟空
对每辆开过的出租车
都大喊：师傅

情敌

昨晚 我的手指割伤了
剩下的创可贴，还有一张
已经用来给刀包扎好了
没有看见你们在一起
我感觉很孤单，所以
我是一个很好的情敌

其间，我遇见过的云都已经飘散

去年的时候
每当我感到伤心
就会买一张机票想去一个地方
最终买了四次
没有一次真的动身
去了机场
今天，我又买了一张
从那个地方回来的机票
我就要尽力的睡去了，说这些
只是因为我不知最近的雨何时会下

过一会我就要走进风中

我已经和一面墙，呆了很久
这让我觉得，在很多的时候
它是我的宠物。已经记不住
我遇见过的喜鹊，有过几只
只是在想，不应该去否定
一阵风的即将到来，就去风中
如已经知道的那样
我们既然可以来到这个世上，都是因为没打算活着离开。

冷洗劫了你的一些时间

过了一会儿，你把帽子压低，
从夜色中走了出来，按下十七层的电梯
你知道你房间的窗户向南
一直的事情总会有一些，被允许数量很少
今天是大寒，刚打开电视听到罗丝说去天上
你熟悉这个电影，愿意的话
过一个儿还会听见她说，杰克，抱紧我
你顺着窗户看出去，保持着沉默

超级月亮

已经是 8 月 11 日的凌晨
2014 年最大最圆的月亮
此时应该挂在你的天空上
这样难得的情景
一年都不会有机会见到
据说每经历 14 次的圆缺后
才会出现这么一次

如果我这里现在没有下雨
此时，我们就可以远隔千里的一起看着它
其实我的身上也有两个月亮
它们也是又圆又亮的
你有机会看见其中的一个
就有机会看见了另外的一个

原来忧伤是会让胸部变小的

已经在某个时刻
我强烈迅速
无所不在
毫无疑问地爱上了你

爱就像是一颗子弹穿透了生命

没有人能看出我的忧伤
我想我的忧伤在白天就像是一个好人干净的笑脸
你不知道
你笑起来的时候
我所有的忧伤都在你的脸上
你并不知道

喜欢上了一个动作
写字，不停地写字
记住十个字之中
必然有你

双手合什，分开
我用拥抱你的动作
拥抱了自己

哥哥，
原来忧伤是会让胸部变小的

我不相信月光了

自从楼下的那堵墙做我的宠物后
吃小曲奇饼干，我都喜欢看窗外
说了你们也不会明白的，月光在
心里太熟练，一个人走路才虚无
而明天还有好多事，所以呢晚安

小别

属于今夜的睡眠还没有来
让我想到扫地这件事情你做的比我要好

要有一个与心理应当的爱好

好像在某些时候
写了某些诗。
好像这个下午不说话
只看着窗外
看路上走过的人都在感觉天气很冷





潘梅的诗

□ 潘梅诗 / 唐福德 摄

必须给你美好

告诉冬后的每一个黄昏
晚霞要足够绚烂与温柔
最好用它盛大的光辉
照亮你归来的路途

而我
要成为你必经之路上

那间茅草盖起来的小小木屋
以草木的沉默
掩藏身体里水的轻柔

对于
这静美的景象
你大可保持长久的迟钝

然而我想
你必会感动于某一个瞬间
当晚风掀起石凳上的树叶
“就仿佛爱的人来到身边”



一晃两个秋

一晃两个秋
黑颈鹤来了又走
姐姐
你为何不像黑颈鹤那样
每年依照着节令归来

你把我遗落在人间
读为数不多的书籍
写些自己都不懂的文字
还时常被外物诱惑

姐姐
如果你再不来
我就放逐自己
在风吹草低时
成为猎人的羔羊

给陌生人的信（第一封）

昨晚查完宿舍已近凌晨
清冷的风灌进门窗
我去关门 我又没有关门
我折回来披大衣 我又没有披大衣
我拎着几个包出走
空旷的操场上只有我的脚步声
我打开车灯 我又关闭车灯
我回到值班室
发现睡着几百人的宿舍无比安静
像盛大的孤独一样从容

给陌生人的信（第二封）

很喜欢这样的早晨
下坡
孩子们沿着路两侧走
没有十字路口
没有红绿灯
只有脚步间极具弹性的跨度
时而回归自己
时而将自己逼向远方

给陌生人的信（第三封）

转个弯就到了校门口
一位父亲抱下身后的孩子
“嘿！少年，好好读书、好好写字”
他背着小书包摇晃着走进校门
许多花朵透过阳光愉快地在天空中开放
我注意到一个男人嘴角溢出的满足
但我不能告诉你
昨晚雪是怎样融化的

给陌生人的信（第四封）

天气冷
整个下午我都在纠结
洗与不洗的问题
洗掉大眼睛、弯眉毛
红嘴唇和小乳房
我感觉身体空荡荡
不洗
羞涩的手指又熟练地
拨开多余的部分
喔，对不起！
我确定我有小邪恶
在和漂亮小姨聊爱的时候
我们都一致认为
该把心仪的男人吃掉

本栏责任编辑：周亚松



高原银杏

□ 肖良宪

传说中，它有千岁之久。因为高龄，在海拔 2400 多米的山颠，它成了树之长者，一代又一代村民对之敬若神灵。虽说高处不胜寒，然而，在那个叫二堡村的地方，一棵银杏树，却用它顽强的生命力诠释了对这块土地的深沉爱恋。这种情怀，无声地打动着我们。

发现银杏树是一种偶然。起因是贵州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套《行走贵州》的记游性丛书，委托毕节地区文联《高原》编辑部主任、作家彭澎撰写威宁部分的文章。从 2006 年初起，彭澎就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说这些年很少到过威宁，手里虽有一些资料，但没有亲身感受，怕写不好，要到威宁蹲上十天半月。由于他时间忙，上半年终未成行。直到七月初，彭澎才又打电话说出版社催得急，书名都已初定了，名为《威宁·草海·黑颈鹤》。又说全书虽只“万多字，但要配上精美的图片，大约有十多万字的容量，尤其是此前已有很多人写过草海、石门坎、百草坪、中水古汉墓遗址”等方面的文章，如今要从记游的角度来写，而且高度浓缩，感到压力挺大，若写不好，无颜面对威宁父老乡亲。当然，我知道这是

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都会有的想法。

于是，我们便陪彭澎去了盐仓，原本只想去看看百草坪和向天坟，但镇里几个领导说二堡村的银杏树值得一看。既然要全面反映威宁，总得多挖点东西出来吧，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便顾不上吃中午饭，在饱揽了百草坪绝美的夏日风光后便匆忙赶往二堡村。走完平坦洁净的柏油路，拐进了 326 国道边的便道路，吉普车便开始像一个醉汉，在夏天的酷热里一路摇晃，而我们则好像坐在摇篮里，幸好公路两边嫩嫩的苞谷林和已近成熟的洋芋丛里散发出的芳香而清爽的气息不时飘洒进车窗里，没感到丝毫的困顿，车子便在一间石砌的平房前停下来了。一个六十开外的老汉正坐在门前吸旱烟，镇里开车的蔡师下去后和他打了个招呼，并介绍说我们要去看银杏树。老汉叫罗家才，是村里原党支部书记。听说有作家来写银杏树，老罗很高兴，领着我们又过了几户人家房前，一棵大树便孤傲地立在我们面前。

在银杏树下环顾，二堡院子



几十户人家仿佛装在一个小盆子里，四周的山上铺满了只有这个季节才有的绿波。银杏树盘踞在村庄后的一块地埂上，一圈刚砌不久的堡坎围护着树根，老罗说还是上面给了点钱才砌的。由于岁数大了，树身上长出了许多或圆或扁的疙瘩，它们倒挂在树身上和一层层斑驳的苔藓一起把五尺来长的树身点缀得无比沧桑，树身往上，银杏树便伞状般四散开了，分成若干个银杏家族，树枝上长满了细密的扇形的叶片。由于五月份遭受低温气候，原来的叶子全冻坏了，现在长的全是新叶。老罗说整棵树高十五米左右，树冠12米左右。问他量过没有，他说没量过，但在村里长大的人自打从娘胎出来，就看着这棵树长大，估计八九不离十，可树根要6个成人才围得拢却一点不假。

以前我仅知道银杏树是一种药材，但没有见过。查看词典后得知，银杏为落叶乔木，雌雄异株，又叫公孙树，是我国特产。这就很特别，一般果树都是雌雄同株，三五年就结果，而银杏树之所以又叫公孙树，意为爷爷栽的树要孙子成人后才结果，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享福。是何人栽下这样一棵在方圆百里绝无仅有的银杏树，其气度和胸怀真是令人景仰。

问到这棵银杏树的来历，老罗和村里人很自豪地对我们说，这棵树有三四千年的树龄了，比

山东的银杏之王还年长。树根下面原来有个深坑，里面可容纳十多人，村里年轻姑娘们在结婚前一天都要一个人在洞里点上红蜡烛呆一个晚上，据说这样嫁出去后就可以和夫君白头偕老，早生贵子。许多人家则拜祭银杏树给娃儿取名字，取些长生、长青之类的名字。而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在银杏树下烧香许愿则成了村里人的习俗。据说当年红军走过这里时，杨成武将军曾为银杏树题过一首词，但却没有流传下来，老罗说这是最为遗憾的一件事。也许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大炼钢铁还是“文革”期间，周围的很多树都被砍光了，而只有这棵银杏树丝毫未损。到如今，保护银杏树的习惯就这样一代代传了下来。而银杏树，也没有让村里人失望，它几乎年年结果，据说多时有300多公斤。村里人用它来治妇科、咳嗽、夜尿等一些小病，几乎用不着找医生。老罗还说他曾用银杏炖猪脚治过弱视，至于银杏是否真有此神效，我不得而知。但在二堡院子几十户人家的心目中，银杏树无疑是一棵灵性之树，在与之朝夕相伴的漫漫岁月中，一种生存的信念通过银杏树植根于这里的每一个人心中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堡院子周围都没有水源，雨季吃的是天上水，每年冬春季节都缺水。据村里人说，遇上干

旱之年，山头的庄稼和树叶都晒焦了，而长在地埂上的银杏树按理说无法涵养和吸收水分。但无论多旱，该发芽时它依旧发芽，该开花时它自开花。老罗说，如果是人年龄越大则越易衰老，抵抗力也越差，有几年我们都担心这银杏树怕是到头了，后来在组织村里人挖善启希望小学的地基时，才发现地下全是树的根须，贴在地上一闻，满是银杏的味道，足足200米远呀，它的根都伸过来了，难怪它死不了。这种为了生存而扎根土地的生命力，真是让人料想不到。毫无疑问，这棵孤寂地耸立高原厚土之上的银杏树由于它的年代久远，在村里人的心中便有如神祉。这里的人们在娶妻生子延续香火的同时，亦把对它的膜拜一代代传承了。至于它是否真有几千年的历史，肯定有待考证。在查阅了有关资料和请教了对古树名木颇有研究的一些专家后，银杏树的生存环境和分布也清晰起来。这种树地理分布跨度比较大，主要生存于海拔2000米以下的亚热带气候区，在我国古代的地质资源普查中，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地方，都没有发现银杏树的自然分布区。这就是说，二堡村的这棵银杏树不是威宁高原乡土树种，它是“舶来品”。

那么，二堡村的这棵古老的银杏树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就不

得不说起奢香古驿道（又叫五尺道）。应该说在明朝初年，地处黔西北的乌蒙山区还是化外之地，是明朝中央政府可望而不可治的地方。得益于女政治家奢香夫人的雄韬伟略和远见卓识，才使这块热土上的各族人民有所归属，融进大明王朝统一的版图。而后奢香夫人的受诬陷，进京面圣告御状等一系列事件，也许是促成奢香夫人决心修建五尺驿道的深层次原因。透过历史的烟尘，不难想象，在600多年前既不通驿路且虎狼出没的磅礴乌蒙山脉间，满怀愤懑和委屈却又心中装着一方子民的奢香夫人，用一个女人的柔弱之躯历经了怎样的艰难困苦，才到达南京的？她是否在口干舌燥忍饥挨饿中一边前行一边想着怎样开通五尺道？就在她大获龙恩领命回来后，五尺道的修建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最先一段是从毕节修到贵阳的修文，后又修从毕节到云南昭通这一段，这段路毕节出去一直到四川的永宁（今叙永县），威宁方向延伸到昭通。从奢香夫人在位时修起，其后又由其子接着修。五尺道的开通，促进了云、贵、川三省的开发。由于奢香夫人的杰出贡献，其时在大明王朝的各土司中，奢香位居各宣慰之上，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今天也有人曾高度评价说奢香夫人是“中国西部大开发的先锋”。在威宁

境内，从县城往东北至今还有头塘、二堡、三寨、四堡等地名，这些都是几百年前开通古驿道时所取的驿道名。如今，古驿道已被现代的公路所代替了，但在威宁山间，那一块块磨得光亮的石板还在时隐时现地见证着历史，尽管这一段段破碎的驿道如今是那么冷清，但谁也抹不去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有过的重要作用。

老罗说二堡村若干代人以前叫二堡街，街两边全是铺面，过往商人众多，异常繁华。可以想象，因为有了驿道，宣慰大人的各种请示报告及地方社情民意便通过驿官得得的马蹄声和一路不停的吆喝声源源不断地传递到京城，大明王朝对于边地的各种指示批复也畅通无阻地传达下来，而民间的交流往来也在这驿路两边不断地延伸拓展开来，中原先进的文化、科技等也如涓涓细流沿着驿道无声地浸润着这块土地。那么，这棵被村里人说成已几千年树龄的银杏树也许便是当时开发交流的一种信物，被人从外地引种到威宁高原。如此说来，它即使称不上千岁，至少也有600多岁了。是谁在二堡这个地方引种了银杏树，如今已无从考证，或许种树之人，当时只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本没指望它长多大，活多少年，没想它竟对这块土地不遗不弃，情有独钟。从科学的

角度来分析，当初种银杏树的人除了种下这一棵（或许很多棵）雌树外，肯定还种下了一棵（或许很多棵）雄树。因为从果实来看，这棵银杏树只能是雌树，它虽然每年都结果，但由于没有胚芽，它不可能发芽繁殖。没有了雄性伴侣，注定了这棵银杏树只能从此孤独，尽管大地赠予它的是高寒的气候和干旱的土地，但在600多年的风雨沧桑中，它的根，早已融入这片土地，和一代又一代的二堡村人相依为命了。

后来得和，这棵银杏已收录入贵州名木古树保护名录里，在贵州目前已发现并记录的银杏树中名列前茅。孤独而寂寞地修炼了几百年后，终于从几乎被人们遗忘的山野小村走进名木古树排行榜，这是值得庆幸的。离开二堡村后，我一直无法忘记老罗说过的一句话，他说退休后他每天都要围着银杏树转几圈，看它一眼，守着它，就觉得日子有了盼头。我想我们应该感谢遥远的奢香夫人和那引来树种之人，尽管几百年来这棵银杏树不曾开口说话，但它却伴随着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从蛮荒走向了文明。同时，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二堡村人，有他们的守护，这银杏树扎根高原的信念和生生不息的生命又何止千年！

（本文图片摄影：孔宁康）



灼甫草场游记

□金 超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第三次去灼甫草场，有了这样的感受。

以前去过灼甫草场两次，两次去景致截然不同，心境却都一样。第一次是秋季，秋高气爽，

万里晴空，然而“自古逢秋悲寂寥”，衰草连天，满目萧条，让人提不起兴趣，匆匆一游便萌生归意；第二次是春季，虽然已有绿意，终究草浅林稀，灼甫草场就像一位身着补丁服装的绰约

女子，不胜娇羞，没有生机与活力……

诗人画家笔下的美丽灼甫草场哪里去了？我非常失望。

端午节，有雪山镇的友人相邀到灼甫草场一游，说要杀羊招



待。因前两次对灼甫草场印象不佳，所以开始有些犹豫，但盛情难却，终究还是答应下来。

阳光明媚，蓝天如洗。越野车在通向灼甫草场的柏油路上如同脱缰的野马，任意驰骋。夏季走进灼甫草场，想不到与前两次相比，面目全非——草场铺青迭翠，树木葱葱茏茏，绵延不绝的绿色沿着波状起伏的山峦一直漫向天际，与蓝天白云相连，整个草场就是一片滚滚绿海。站在

高处远眺满眼青翠，白色的羊群在明媚的阳光下悠闲漫步着，安静闲适地啃食着青草，如同珍珠白玉镶嵌在碧毡绿毯上，让人游目骋怀，心花怒放。头顶明净的蓝天，脚踏着柔软的草地，思绪随连绵不绝的云海悠悠飘向远方……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菜根谭》里说：“何者所感，只要随起随灭，廓起无碍，便与太虚同体。”大意是说无论哪种情绪，只要有生有灭，不要

郁积于心，便是与那辽阔高远的天穹融为一体了。那一刻，我好像真的与天穹和草场融为一体。

正是游览草场的最佳时机，我庆幸来对了！

一直想去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游，只是至今也未能成行。不过，灼甫草场就是大草原浓缩的情影，有山坡有平地，有荆棘有芳草，一汪清泉，几树野花，数声鸟鸣，灼甫草场的魅力与大草原没有两样。去不了大草原，能到灼甫草

以前去过灼甫草场两次，两次去景致截然不同，心境却都一样。第一次是秋季，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然而“自古逢秋悲寂寥”，衰草连天，满目萧条，让人提不起兴趣，匆匆一游便萌生归意；第二次是春季，虽然已有绿意，终究草浅林稀，灼甫草场就象一位身着补丁服装的绰约女子，不胜娇羞，没有生机与活力……

场一游也算是还了旧愿。

如能骑着一匹乌蒙骏马奔驰在这广袤雄浑的草场上，该是怎样的开心？我一边踱着一边寻思。

威宁盛产乌蒙马，乌蒙马在历史上是小有名气的。它腿长腰短，驰骋山区，身轻足捷。史料记载，贵州高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曾经是封建王朝实施茶马互市的重要通道。宋朝在今川黔交界地区设置买马场，产于黔西北罗氏鬼国的马，常销往泸州、叙永等地，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元朝在水西设置牧马场，水西曾是全国十四大牧马场之一，“水西马”、“乌蒙马”都是当时的名马。现在威宁许多乡镇，由于修通了公路，乌蒙马便渐渐退出了运输舞台，饲养越来越少，因此要在灼甫草场附近找一匹乌蒙骏马并非易事。

正在突发奇想，忽然狂风大



作，乌云翻滚，天色黯淡，一派山雨欲来之势。

“回去了吧，要下雨了。”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有人开始动摇。

“羊肉已下锅，一会儿功夫就好，吃完再走。”雪山的友人再三挽留。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别之不敬，走之不恭，不忍拂逆主人一番盛情，我坚持留了下来。

摇下车窗玻璃，霏霏细雨中，烟雾朦朦胧胧，沐浴着柔和湿润的微风，带着泥土清香的空气醉人心扉。雨下得不长，一会儿功夫便雨过天晴。一道亮丽的彩虹出现在草场上空，我们欢呼雀跃，为难得一见的美景而兴奋激动。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有风有雨的路上才会有奇美风光！

在草地上铺好油布，友人便将热气腾腾的本地羊肉端上来。

威宁盛产黑山羊，《威宁县志》记载，最有名的是四堡羊，切开有大理石一般的纹状，清炖不酽汤，小炒无膻气，堪称美味佳肴。灼甫山羊也不错，肉质细嫩多脂，入口便化，与四堡山羊不相上下。野外就餐吃的是一种心情。草地上有雨水，只能蹲着就餐，一杯当地的苞谷酒在手，相互对酌。灼甫羊肉味道很美，让人顿生“有如此下酒物，一斗不为多也”之叹。在县城里呆久了，终日生活在满是车辆和人群的喧嚣中，心情桎梏在钢筋水泥的现代丛林里，难得一乐。“苦心中常得悦心之趣”，有此良机开怀畅饮，非常痛快。酒酣耳热，日薄西山，于是告别友人上车返城，盛筵难再，盛情难言，回首依依！

踏上归途，残阳如血，草场一片殷红，仿佛晚霞映照下的沧海，天边吹来阵阵清风，随风起伏的牧草像红色的波浪似的，欢

快调皮地追逐着。大概是由于酒的作用，坐在车上，我思维如天马行空，格外活跃，东坡先生清旷豪放、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的《定风波》一词忽然划过脑海：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吟罢全词，我仿佛看到东坡先生竹杖芒鞋，搏击风雨，从容前行的豪迈情景，我体会到他无喜无悲、荣辱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我要学习他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无惧无畏的超然情怀。

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第三次去灼甫草场，我还有这样的感受。

（本文图片摄影：唐福德）

本栏责任编辑：唐福德



绽放在生活里的爱情花朵

——威宁彝族婚俗散记

□ 罗 勇



彝寨分布在山里，绿树掩映，地畦环绕，细长的山路像一缕缕飘带，连接了村，连接了寨，连接了彝家人彼此的心。心与心相连，创造了彝族不朽的历史，心与心相通铸就了彝族辉煌的文

化，心与心相融，谱写了彝家儿女醉人的爱情乐章。

彝家人的爱情，像野花，散落在山路上、地垄间、村落旁，点缀在劳动、聚会、休闲的时光里，绽放在平平淡淡的生活里。



四季常开，幽香四溢，沁人心脾，把庸常的生活装点得多姿多彩。

彝家青年男女，在生活里的某个场合，发现了心仪的人儿，心里种下了爱情的种子，在月夜清风里萌芽，在小桥流水边滋润，

在赶场天或者是赛马场上抽枝，在表情达意的酒礼歌里成长，爱情的花骨朵儿已经含苞待放，可离绽放的花期还有一段距离呢。

这段距离就是按部就班完成婚俗的日子，两个人的爱情，必

须遵循双方父母的意愿、辈分、支系等约定俗成的规矩。彝族古老的婚俗中，同一支系不能通婚，父母反对不能结婚，父母的意愿占据了一门婚事的主导地位，与其他民族不能通婚，认为和异族通婚是对祖先和民族最彻底的背叛。相反，近亲的姑表之间通婚一度十分盛行，彝族夫妻双方没有叫对方的父母为“爸爸”“妈妈”的习惯，大多以姑舅相称，可能和近亲通婚有一定关系。

这些封建思想的习俗，上演过许多棒打鸳鸯的悲剧，曾使无数含苞待放的爱情花蕾，还没盛开就生生凋谢了。好在随着社会的进步，彝家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婚俗也随之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些桎梏情感和心灵自由的条条框框逐渐被封存入历史。今天，彝家儿女们恋爱是自由的，婚姻是自主的，婚俗作为民族文化或者说民族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乡间彝寨里还被人们传承，禁锢人性自由的部分被剔除了，剩下崇尚爱情和传统美德的精华，像雨露甘霖，将彝家儿女的爱情之花，滋养得愈发的美丽动人了！

一对彝族青年男女之间产生了爱情，要走进婚姻的殿堂，必须经过订婚、烧鸡吃、送期程（彩礼）、嫁娶几个步骤。

无论男女双方是否私定终身，订婚都是走进婚姻殿堂的必

经之路。彝族的婚俗里，私定终身得不到认可，要经过订婚仪式，恋爱关系才能公诸于众，这是对“媒妁之言”的继承。订婚之前，必须有媒人上女方家提亲，媒人由男方敲定，人选圈定熟悉男方家情况、与女方家关系良好的人。请媒人，代表男方对女方的诚意和对女方家人的尊重，不能掉以轻心。男方打好酒，亲自到选中的媒人家中，请求为其做媒，如果选中的人愿意收下男方的酒，就表明愿意出马做媒，不收酒则表示没有把握成人之美，男方得另请高明。媒人应下男方，会选择吉日（一般是农历双月双日），带领男青年，带上两瓶酒和其他礼品到女方家提亲。彝族是崇尚酒的民族，酒文化贯穿了整个彝族的发展史，婚俗自然离不开酒，酒是敲门砖，酒是问路石，“成不成，酒两瓶”，婚姻未动酒先行是彝家人代代相传的订婚规矩。如果女方家收下男方的酒并在当晚的餐桌上与客人共饮男方家的酒，这门亲事就十拿九稳了，如果收下酒当晚不喝，这事还有待商榷，男方已被列为重点考察对象，尚需继续努力。女方家什么都不收，人依然是热情的，饭要吃酒照喝，把男方当客人招待，吃过饭后沟是沟桥是桥，互不相干，各走各的路。喝了男方的酒，男方还要送些钱物给女方，女方以精心绣制的鞋垫或者手帕

回赠，彼此拥有了信物，一门亲事基本敲定。

烧鸡吃是迈进婚姻殿堂的第二步，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订婚局限于男女双方的家人中得到认可，烧鸡吃是对双方整个家族和所有社会关系公开婚事的仪式。相传，远古的时候，彝族先民每办一件大事，都要“烧鸡吃”，用鸡翅骨占卜吉凶，称作“鸡卦”，鸡卦成为成就大事的信誓凭证，将“烧鸡吃”引入婚俗之中，足见彝家人对婚姻的重视。现在，“烧鸡吃”已经没有了“烧鸡”的过程，订婚之后，男方家选定吉日，由媒人带领男方及其家长，仍然带上双瓶酒，和订婚不同的是，男方还要预备好衣服布料之类。女方家请来家族里德高望重的老人、亲戚和近邻，杀公鸡母鸡各一只，热情款待所有到场的客人。到场的都是证婚人，酒桌上双方家长交换意见，辈分高的人要说一些教导男女双方忠于爱情、勤俭质朴、尊老爱幼的话。一桩婚事，就此正式公开。“不开亲是两家人，开了亲是一家人”是彝家人遵循的传统。从此两家人融为一体，彼此的亲戚朋友因为这门亲事又都成了亲戚朋友，大事小事相互往来，遇到困难互相帮助，曾经在某个场合吵过嘴红过脸的事自此烟消云散，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

和其他民族一样，彝族也有

送彩礼的婚俗，叫“送期程”。男方家请精通经文和礼规的“布摩”推算出结婚的日子，写在红纸上，准备好一定数量的现金和许多礼物，在媒人的带领下去女方家送彩礼。这一次，女方家更加热情，至亲的人都要来作陪，



女方家还要请一位熟悉礼数的人，专门为客人斟酒，代表女方和男方媒人做进一步的沟通，将男女双方的意愿表达清楚，尽量平衡双方的分歧，统一意见，达成共识。酒过三巡，媒人把用红头绳扎好的彩礼钱和结婚日程贴

放进托酒盘里，慎重交给女方父母，把男方家准备好的丰厚礼品送给女方的至亲长辈，酒是必备的，另有衣服布料等物，表示男方家对女方亲朋好友的敬意。收到礼物的人家要杀鸡宰羊，热情款待男方家送礼的人，这个过程，

通常要持续几天，家族大的人家，会持续十几天。

嫁娶是彝族婚俗的最后一道环节，也是最为隆重的环节。尤其是男方家，喜庆的婚宴要大办三天，杀鸡宰羊，张灯结彩，唢呐声声，鞭炮阵阵，热热闹闹的





气氛让彝家山寨彻夜不眠。出嫁对于女方家却是一件悲戚的事，彝族中流传着一句这样的趣语：“说起出嫁你就哭，说起接（娶）媳妇你就笑。”同一桩婚事，在嫁出去和娶进来之间，有本质的区别。

出嫁的日子一天天近了，即将出嫁的姑娘临近婚期的半月前就开始哭嫁，一脸愁容，茶饭不思，以酒礼歌的曲调，边哭边唱，诉说父母含辛茹苦养育自己的艰辛，兄弟姐妹手足般的亲情，亲戚朋友无微不至的关爱……一切生活的过往皆入歌来。歌词都是姑娘内心的所思所想，曲调忧伤，质朴动人，充满了对亲人的感恩和对过去生活的无限留恋，生离的悲怆，在飘渺的唱腔里荡漾。

婚期第一天叫“待姑娘”，这是姑娘在娘家享受最高礼遇的一天，父母好吃好喝的招待女儿，亲戚朋友们为姑娘清理嫁妆，姑娘的姐妹们寸步不离的和她厮守在一起，陪她哭陪她笑，陪她唱深情哀婉的哭嫁歌。第二天，女方家邀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当总管，待人接物、安顿客人、摆布婚宴等事务，全权由总管打理。谁是姑娘的长辈至亲，谁是姑娘的姑妈舅舅，总管必须了如指掌，入席的时候根据亲疏远近和辈分高低按先后顺序进行安排，辈分高的、至亲的坐首轮，坐上席，这是至关重要的，男方女方都一

样。体现的是主人家为人处事之道，稍有疏忽，会成为彝寨里的笑谈，主人家人前人后就抬不起头，总管的威信也会一落千丈。

新郎的迎亲队伍还没到，新娘家在门口的必经之路上用树枝搭好三道篱笆门，意为金门、银门、铜门，当迎亲的队伍走进金门时，新娘的姐妹们便拦住以酒礼歌的形式与迎亲队伍的小伙子们问答，女方提问男方答，问题或机智幽默，或刁钻古怪，全凭姑娘们的兴致。小伙子们唱得好答得妙，博得姑娘们的欢心，就可以顺利通过三道门，若是姑娘们不满意，就会用事先准备好的冷水泼小伙子们，或者用炭灰涂黑他们的脸，还要用树枝打他们，小伙子们不气不恼，任凭姑娘们自由发挥，他们知道，这是姑娘们为他们打掉了身上的邪气，谁多挨了打，是给姑娘留下了好印象，那是荣幸呢。迎亲的队伍一般由二三十人组成，媒人领队，新郎的弟弟（必须是弟弟辈的人）紧随其后，牵着给新娘备好的马，马上驼着半个猪头，一坛土酒，还有盖头等其他物品。猪头是拜祭新娘祖先的，酒是敬献亲朋好友的，盖头自然是新娘子的了。

新娘家最热闹的时刻，从晚宴后开始。那时，堂屋两边摆好凳子，酒礼歌对唱即将开始。唱歌的人分两排坐，一边代表新娘，一边代表新郎，对唱《克武克左》

（酒礼歌名）。新娘方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和对未来生活的紧张和茫然，新郎方的歌词充满迎娶新娘的诚意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在如泣如诉的歌声里，新娘的哥哥或者弟弟将痛哭涕流的新娘背出闺房，绕火塘转三圈，背出堂屋，一直背到大门外。在这里，新娘要举行“许姑”（彝语）仪式，正式与娘家的生活和自己无忧无虑的少女时光作别，踏上新的生活道路。此时，新娘的哭声更加悲切，她的姐们边唱劝嫁的酒礼歌边把一床崭新的披毡披到新娘身上，新娘不愿意，推来让去好半天，但最终还是披上了，表示新娘接受了新的生活，正式出嫁了。

大门外的空地上，燃起熊熊的篝火，火光映红了天空，新娘和客人们团团围坐在篝火旁，她的眼泪还没干，客人的酒礼歌已经唱响，劝嫁的、宽慰的、惜别的、祝福的、诉说新娘身世的、感激父母养育之恩的、歌颂劳动和赞颂祖先的。歌词以叙事方式，佐以手手相传的“转转酒”，边歌边跳“撒麻舞”，歌声此起彼伏，古朴深沉的唱腔漂浮着朴实无华的唱词扑面而来，带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像晶莹剔透的星星，在深邃的夜空里闪烁。

人们在歌声里等待“发亲”时刻的到来，发亲的时间是“布

摩”推算出来的。时间一到，新娘的哥哥或弟弟抱新娘上马，马交给新郎的弟弟牵着，迎亲的小伙子们背上新娘的嫁妆走前面，新娘的马走在中间，娘家的送亲队伍走在后面（送亲的人数为双数，一般由二三十人组成），浩浩荡荡的上路了。

接下来，好戏在新郎家上演。新郎家算好“进亲”（新娘到来的时间）时刻，在家门口用不剥皮的五倍子树搭一座“迎亲门”，新娘到了迎亲门，“布摩”站在门里，为新娘念一段经文，然后杀一只公鸡从门上方扔出去，意为将一路上附在新娘身上的邪气驱之门外，保佑新娘平安幸福，新娘这才可以通过迎亲门。此时，鞭炮轰响，唢呐齐鸣，人声鼎沸，喜气飘荡在村子上空。在热闹的气氛里，新娘的哥哥或弟弟把新娘抱下马，揭了盖头，由新郎家事先物色好的彝族妇女（条件是只结过一次婚，且夫妻和谐，儿女双全的妇女）牵了新娘，跨过置于门槛之外的马鞍，踩碎一只倒扣的碗、一枚鸡蛋、一把小木勺，进入新郎家的堂屋。

彝族的婚俗里没有拜天地拜父母的仪式，新郎新娘只拜供奉家神的神龛。进入洞房后，婆婆立刻端来一碗稀饭，女性长辈们齐聚洞房，劝新娘吃稀饭，吃过稀饭，就表示端了婆家碗，吃过婆家饭，成为婆家人了。新娘要

向长辈们分赠自己一针一线做出来的布鞋或鞋垫，这是对新郎长辈的敬意，也是新娘看家本领的自我展示，新娘在新环境里的地位和人缘，从这时起就开始奠定

了。从娘家带来的一箱一箱的核桃、熟鸡蛋、葵花籽，是新娘为同般等辈、孩子和辈分更小的人预备的，这些东西轻易得不到，要抢才能到手，“抢鸡蛋”的仪



式就开始了，这是姑娘小伙子们的最爱，相当于其他民族的“闹洞房”，抢的人越多，抢的场面越热闹，主人家越高兴。

第二天，送亲的队伍要在新

郎家“耍”一天，新郎家杀鸡宰羊招待送亲的人。这一天，送亲的姑娘们成为了主角，走到哪里都会有一群小伙子脚跟脚的追随着表现自己，说笑话、献殷勤、

表演赛马或者“扭扁担”、唱酒礼歌。有那彼此心动了的人儿，眼神越过人群，在虚空中纠结，爱情的种子就萌芽了。

第三天早上，总管将送亲的人和新郎新娘及新郎的父母至亲等人请到堂屋里就坐，新娘的哥哥或弟弟代表新娘的家人向每人敬一杯酒，双方的至亲长辈说一些祝福和教诲的话，新娘新郎的优缺点在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时都要说出来，一对新人当众表一下好好过日子的决心。新郎家“打发”（赠送）一些钱给送亲的人，送亲的队伍就上路了，新郎家的亲戚朋友一起送到家门口，新郎给送亲的人每人敬上一杯酒，叫“上马酒”，辈分比新娘高或同辈中年龄比新娘大的人，这时会把新郎家打发的钱退还新郎，回赠他们助一对新人一臂之力的心意。喝空的酒杯，都被喝酒人摔碎在地上，不是发脾气闹情绪，这是他们的衷心祝福，叫“打口嘴”，祝福新娘新郎在今后的日子里不吵不闹，合家幸福，白头偕老。

热热闹闹的婚礼就圆满结束了，淹没在接踵而至的平淡岁月中，在人们的视线里，一朵盛开的爱情之花慢慢凋谢了。在一对新人的心里，那花儿却永远绽放，成为他们一生抹不去的最美的记忆！

（本文图片摄影 孔宁康）



打亲

□ 闻志源

在彝家人的婚礼中，最热闹、最刺激、最精彩的礼俗，不是熊熊燃烧的“红篝火”，不是手手相传的“转转酒”，也不是且歌且蹈的“撒麻舞”，而是竹条呼啸，披毡翻飞的打亲。接亲的当天，女方家从寨子里请来一群身手敏捷反应迅速的姑娘，每人手头发一根结实的竹条子，并在手上抹好了黑黢黢的锅烟子，单等接亲的小伙来了之后抽打。接亲的小伙也晓得，这一顿饱打是避免不了的。所以，凡是男方家请来接

亲的人，每人都要提前做好一个大披毡，去女方家接亲的时候就披在身上抵御抽打。

我第一次目睹打亲，是表姐出嫁的时候。表姐出嫁的时候，我才十一二岁，总管见我还小，就安排我和几个表兄弟“扎路口”。“扎路口”也就是去村口放哨，一旦看到接亲队来了，就跑回来告知总管，以便安排姑娘们作好打亲准备。

那天最先看到接亲队来的是小表弟。接亲队来的时候，西下



在彝家人的婚礼中，最热闹、最刺激、最精彩的礼俗，不是熊熊燃烧的“红篝火”，不是手手相传的“转转酒”，也不是且歌且蹈的“撒麻舞”，而是竹条呼啸，披毡翻飞的打亲。



的太阳只有两个人头高了，我跟表兄弟们正玩得起劲，小表弟突然惊叫起来，你们看，接亲队来了！我们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支队伍正向这边开来，走在最前面的是媒人，后面跟着两个接亲姑娘和一帮接亲小伙子。我兴奋的说，是来接大表姐的。大伙一听便叫起来，接亲的来了，接亲的来了。我们边喊边争先恐后往回跑，慌无的脚步声和嘶哑的叫喊声在寨子里响成一片。等跑到表姐家时，大伙都累得快喘不过气来了，总管去不急，拔出含在嘴里的烟杆，手搭凉棚踮起脚尖朝对面的小丫口望了望，见丫口上冒出一个，又冒出一个人头。总管才放挡住阳光的手对大伙说，真的来毳了！快快快，快准备迎客。帮忙的人都慌乱起来，一个个忙着抹桌子、摆凳子、抓茶叶、倒开水。打亲的姑娘手里捏着竹条子在门口摆开阵势，排成左右两排把住大门，大门只开一扇，小门关着，屋里又是一群拿着竹条的姑娘死死把门堵住。总管见我和几个表兄弟挤在姑娘们的身后看热闹，便赶鸡似的挥着两手叫我们赶快闪开，说怕打起来的时候把我们脚杆踩断掉。我和几个表兄弟都被总管的话吓住了，只好爬到门口的地坎上伸着脖子朝门口张望。

起初，我总以为打亲是一来就开打，其实不是。接亲队一来，

姑娘们就拦在门口对歌，对歌对的是酒礼歌。双方你来我往对了几首，打亲的姑娘就说，话都讲不清，等条子帮你说。姑娘就举起竹条子朝接亲小伙子的脚肚脚弯弯抽去，裤子穿得薄点的小伙子挨下一条子就啊地跳了起来，到处躲。不难猜，他们的脚肚肚肯定火烧火燎的疼。如果接亲的太会说话，迎亲的姑娘答不上口，姑娘们就会说，你的嘴巴太甜了，等条子帮我说。管你接亲的会说不会说，反正都要挨打的。打是打得凶，但打不伤，打亲就是越打越亲，图个喜。打亲免不了抹花脸，泼水。姑娘黑魆魆的手头握着细长细长的竹条子，身后的水桶也是满满的。有的姑娘觉得自己的手不够黑，使劲往锅底上搓。锅灰不够抹，就备些黑墨水和稀煤以待派上用场。

打亲一般从媒人开始。在媒人的指引下，两个小伙子，一个的脊背上躺着一坛子酒，另外一个扛起猪头。他们亮着胆勇敢地走到前面。酒是用来祭奠主人家神的，猪头是用来敬奉大舅和大舅娘的。迎亲姑娘堵住大门刁难接亲队，双方都有一个巧舌如簧的接话人，说的是四言八句。一问一答像唱歌。当时我不晓得是什么意思，反正就是一问一答。姑娘们提着条子把接亲队围成一圈，她们不上前，站在一边嘻嘻哈哈笑。几个姑娘交头接耳小声

嘀咕，突然她们齐喊，媒人是条狗，这头吃了那头守。不知是谁尖细着嗓子喊，先打媒人，哪个叫他嘴巴甜的。大舅家门口乱成了一锅沸腾的粥。来喝喜酒的客人和帮忙人站得有点远。有的把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前看，有的手头提着一个勺子站在厨房门口，有的嘴里叼着一只烟，使劲鼓掌，有的喊加油，有的又跳又吼。反正每个人的脸都是笑的，嘴巴是张开的。接亲队虽然做好防备，打亲姑娘人多势众，逮到一个接亲的就抹，并且是三五个姑娘按上去抹，连接亲的两个姑娘也不放过，被抹得花眯花眼的不成人样了。接亲的护着背酒的和扛猪头的冲向大门，挤进堂屋将背上的猪头取下来供在神龛下的条桌上，赶紧打开一瓶酒奠了。进堂屋奠了酒敬了神的免得一遭——抹花脸，抽打和泼水。还没进堂屋的就难了，想进来就得先过打亲姑娘这关。两个接亲姑娘被接亲队伍连推带挤拥进堂屋。后头的小伙子挤不进门，把头缩进披毡里。打亲姑娘蜂拥而上，揪住他们的胳膊，拽着他们的手和衣服往外拖。他们想往里挤，守门的姑娘朝外推。小伙子们站不稳，脚没法坚实着地，整个人像一捆干包谷草轻飘飘的就出来了。十几双手按在他们头上脸上抹，小伙子们抱头鼠窜，姑娘们重新擦上锅灰追着他满院子的跑。抽打



下来的竹条子雨点一样密集，他们顾不上脚也顾不了头，一盆盆冷水迎面泼来，个个成了落汤鸡。打亲是不准生气的，接亲的小伙子可以跟打亲的姑娘互抹，但不准用条子和树枝还击。我看到那些打亲姑娘的白脸很快变成了花脸和黑脸，有的败下阵来不敢抹也敢打了，抱着头坐地上。接亲

小伙子倒像是抹起了兴趣，越抹越起劲，他们将主人家炭坑里的稀煤直接抓起来往姑娘脸上糊去。顿时传来一声姑娘的尖叫，那是稀煤从脖子上淌进背心的声音。接亲队冲破了姑娘们的防线，猛冲进屋，有的小伙子，人是挤进去了，披毡还骑在小门上。

打亲过后，总管要吩咐人端

水给接亲的客人们洗手洗脸。主人要双手恭恭敬敬把酒送到客人手中，接亲的小伙子要站起来弓着腰，伸出双手去接。敬完酒打亲算是结束了。这是一种礼节，一种祝福，一种亲情。

（本文图片摄影 孔宁康）

本栏责任编辑：马学文

回族开斋节

□ 刘仕明



伊斯兰教规定伊历每年九月为“斋月”，是穆斯林履行“斋功”的月份，成年穆斯林都要“封斋”，又称为“把斋”，即每天黎明前到黄昏不吃不喝。斋月满后的十月一日，即为开斋节



伊斯兰教规定伊历每年九月为“斋月”，是穆斯林履行“斋功”的月份，成年穆斯林都要“封斋”，又称为“把斋”，即每天黎明前到黄昏不吃不喝。斋月满后的十月一日，即为开斋节，意为穆斯林封一月斋后，庆祝斋功胜利完成。因伊历与我国农历记时法不尽一致，回民节日记时以伊历为准，故斋日在我国农历中，按每三年往后推一月而循环变化。如1985年至1987年为5月，1988年至1990年为4月，照此类推，封斋的始终以“见月”为准，封斋满月发现新月后，次日即为“开斋节”，通常在农历初二或初三。

开斋节在全体穆斯林中均引起重视，在威宁回族中，是最隆重的节日。节日活动的基本场所是清真寺。按教规，这一天里每个穆斯林必须完成两件事，一是交付一定数额的斋税，二是举行开斋节的拜功。以经典规定为宗旨，主要活动项目是：一、会礼。清晨，沐浴净身，穿着民族盛装汇聚于清真寺内，由执寺阿訇于前领拜，集体统一履行拜功。二、讲经。执寺阿訇或其他阿訇向众穆民宣讲伊斯兰教教义，宣讲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等。三、传香

油。节日前夕，各家准备开斋香油，斋日带到寺内，互相传送，互道“色俩目”问候。四、交纳开斋税。除少数贫困户外，均按家庭成员的多少，人均出半升小麦价的货币，施济本民族贫困者、求学者、办学者或修建清真寺。五、寺务事宜。由乡老及其有关人员宣讲和安排。六、各姓氏家族分别到坟山给亡人上坟。六项活动完毕，节日即告结束。

（本文摄影：孔宁康）

